

# 晚明江南文人的遊記書寫—以王士性、徐霞客為例

## 目次

摘 要 .....	1
第一章 緒論 .....	2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研究概況.....	5
第三節 研究目的 .....	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章節大要 .....	18
一、素材選擇 .....	18
二、章節安排.....	20
第二章 晚明社會變動與旅遊書寫 .....	23
第一節 晚明社會風氣的轉變 .....	23
一、商品經濟的繁榮 .....	23
二、消費觀念的改變 .....	26
第二節 文人觀念的轉變 .....	37
一、政治與科舉考試的束縛.....	37
二、文人與商賈之間的互動.....	39
三、小品文筆下的文人心態.....	45
第三節 晚明旅遊風氣興盛的社會因素 .....	48
一、水陸交通發達.....	49
二、旅遊資訊的傳播 .....	49
第四節 旅遊觀念的演化.....	53

一、旅遊的界定.....	53
二、晚明之前的旅遊型態.....	54
三、明代遊觀的改變.....	59
第五節 晚明文人的旅遊概況.....	70
一、旅遊地點的選擇.....	71
二、旅遊的舒適性、娛樂性以及消費性.....	76
三、晚明遊記書寫的多元面向.....	77
第六節 小結.....	86
第三章 王士性《廣志繹》中的人文地理書寫.....	88
第一節 王士性其人.....	88
一、生平背景.....	88
二、王士性的「遊道」.....	90
三、王士性的「遊蹤」.....	94
第二節 地理與人文之間的相互關係.....	98
第三節 《廣志繹》的人地關係論述.....	101
一、自然環境影響人民生活方式的記載.....	102
二、依自然環境劃分生活區域.....	105
第四節 《廣志繹》的人地關係論述—民情風俗.....	107
一、特殊民情風俗的紀錄.....	107
二、婦女社會生活的描寫.....	109
三、紀錄西南文化.....	113
第五節 小結.....	117

第四章《徐霞客遊記》對社會的關懷書寫 .....	118
第一節 徐霞客及其實學思想 .....	118
一、徐霞客的生平 .....	119
二、實學思想的淵源 .....	119
三、交遊關係 .....	122
四、友人紀錄及評價 .....	125
第二節 徐霞客的遊蹤 .....	132
一、早期的名山之遊 .....	132
二、晚期的西南之遊 .....	135
第三節 徐霞客遊記的社會史實書寫 .....	139
一、官民之爭 .....	139
二、土司制度的弊端 .....	142
三、社會民情書寫 .....	144
第四節 小結 .....	149
第五章 結論 .....	150
附錄一 .....	152
參考書目 .....	162



## 摘 要

晚明時期，由於社會經濟力的發展，原本的務農社會轉變為以商業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樣的一個時空背景之下，文人的心態開始轉變。晚明文人所追求的是個人的美感經驗以及生活品味，因此，「旅遊」成了晚明文人最重要的休閒活動之一。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旅遊家的大量出現，也促成了遊記書寫的興起。故本論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建構起：在晚明旅遊鼎盛的風氣之下，旅遊家非常多，所成就的小品遊記也很多，從這些小品遊記的觀察中，筆者注意到遊記寫作的不同風格，以王士性和徐霞客為例，他們是以「紀實」的手法來寫遊記，從遊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別於晚明小品遊記中的性靈書寫（如公安三袁、鍾譚），王士性與徐霞客不再只是以抒情為主，景物為輔的寫作手法，而是將視角延伸到地理、山川景物、社會民情、民生的記載。

本文以王士性、徐霞客二人為討論對象，以二人的遊記文本為主，探討晚明時期遊記書寫的多元面向。除了公安派遊記的性靈書寫、竟陵派幽深孤峭的靜謐意象書寫外，王士性與徐霞客二人所呈現出來的遊記寫作面向，是更為多元化的，除了書寫個人的情感之外，更增加了以考察、紀實的元素，使得遊記的寫作面向更為多元，除了具有文學性之外，亦可視為是地理書籍的遊記作品。本論文希冀藉著對於遊記的探討，以釐清晚明文人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遊記究竟呈現出怎樣的多元視角。

關鍵字：晚明、江南、文人、遊記書寫、王士性、徐霞客、廣志繹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旅遊，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時，所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舉凡社會風氣、交通的便捷、經濟的發展、甚至是人類心態上的轉變，都可構成旅遊風氣興盛的因素。以台灣而言，旅遊活動已進入了消費行爲的模式，甚至已成爲時下最流行的活動之一，再加上旅遊書籍、網路的傳播、交通狀況的改善，或是在工作繁忙之餘，透過旅遊行爲來平衡生活步調，以期達到生理與心理上的紓壓。在這些客觀條件的助益之下，旅遊在現今的台灣社會中，已蔚爲一股風潮，這樣的旅遊風氣，對於旅人來說，究竟抱以何種心態而遊？是爲了紓壓？爲了訪奇？抑或是爲了滿足心理與精神上的需求，種種跡象顯示，旅遊不再純然是騷人墨客解悶、仕宦貶謫的排解方式，已是一種消費行爲。

當時間拉回 16 世紀，中國正處於明朝末年之際，此時期的政治、經濟、風氣、生活各方面，與當今台灣有許多雷同之處，同樣也是旅遊風氣極盛的時期，對於晚明文人來說，旅遊扮演著何種重要的角色？是風氣使然，或是滿足自我的消費行爲，從旅遊風氣的興盛現象來看，可爲晚明社會「多元性」與「現代性」的特徵，做一恰當的詮釋。由於明代社會的普及教育與科舉考試的發展、書籍的出版傳播的廣度，以及文學類型的多元發展，呈現出「大眾文學化」的

現象<sup>1</sup>。在此「大眾文學化」的社會氛圍之下，文人的旅遊與遊記的寫作，也同樣呈現出多元且大眾化的趨向。有鑒於此，晚明遊記的多元面向，無論是性靈筆調的遊記書寫，或是考察記實型的遊記，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

自古以來，人類總想掙脫生活環境的束縛，力圖拓展自身的視野，擴大本身的活動範圍和生存空間，或是遭受洪水、大火、旱災等天然災害時的危害，自然而然產生遷徙的活動，廣義來說，這已經構成了「旅遊」的簡單要義<sup>2</sup>。大體而言，古代的「旅遊」概念與我們現今所認知的「消費性旅遊」有所差異。現今的消費性旅遊意指人們離開自己的住所，到別處觀光遊覽，並能夠在物質或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滿足，這是我們現今對於旅遊一詞所下的最廣泛的定義。

從魏晉南北朝為開始，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劇烈的社會生活，啟發出了不同的人性自覺，也有了旅遊意識。魏晉時期的文人旅遊是為全身避禍而放情於山林之間，並非是自主性的遊山玩水。

到了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代表著中國的遊記文學邁向成熟的階段，柳宗元遊出了文人的不得志之情，寓情於山水之中，「遊」是一種遠離、逃避，是感傷之遊。

---

<sup>1</sup> 許建崑師〈文學大眾化與大眾文學化—重構明代文學史論述的主軸〉，南華大學文學系編《傳播、交流與融合—明代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出版，2005年），頁332-345。

<sup>2</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頁1。

然而，旅遊對晚明旅人來說，是一種消費行爲，或是探索新世界、異文化，還是在不得志之時，尋求山水以慰藉心靈？自古以來，旅遊本是文人雅士、騷人墨客的休閒娛樂、排憂解悶的方式之一，是不得志之遊，或是文人雅士的漫漫之遊，「遊」代表著走出書齋，與大自然做一親密的結合，只是，晚明文人將「遊」的境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造成文人皆投入旅遊的風潮。在這股風氣之下，性靈漫遊已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閒適活動之一。再加上實學思潮以及經世致用的風氣使然，考察壯遊的遊歷形式，也在這股旅遊風潮之中，可見端倪。

由此我們可知：晚明文人皆可以是旅行家，人人也可以自著一本遊記，旅遊活動已無法和晚明的文人雅士脫離，遊記的書寫同樣也呈現出多元的面向，「多元性」的價值觀瀰漫著整個社會，簡單來說：「在上層士紳、大地主、富有商人的眼中，明代後期是個文化繁榮、新思想不斷湧現和充滿著歡愉的時代<sup>3</sup>。」這是一個兼容並蓄的時代，對於遊記的寫作來說：除了抒情式的遊記書寫外，兼論地理、民俗風情的遊記，也於此時大放異彩。由此可知，此時期考察式的遊歷方式，和以實學為依歸的遊記寫作，是晚明遊記中，最為突出也值得一探究竟的部份。

---

<sup>3</sup>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1月），頁169。

## 第二節 研究概況

早期明代文學研究者，專注在專題史或是文類的探討之上，近年來，學術界不少先進致力於明代社會史的研究，對於明代的研究已從過去政治史、法律史、文學史、詩論、小說……等的領域，漸漸轉為注重社會、經濟、文化，甚至是物質生活上的研究，也可看出，對於明代社會的研究範疇極為廣大，舉凡社會變遷、商業發展、文人心態、文學作品……等，皆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

《二十世紀明代文學研究》書中提及：20世紀初，文學從文史哲不分的雜文學獨立出來，使其成為獨立的學科。在1949年後，注重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對文學的影響，文學研究的視野又更為廣闊，認為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文化現象。且用於探討文學的理論也逐漸呈現多元化的視野，如：文學與生活、社會學、文化學、美學、宗教……等，都被嘗試作為解釋文學現象的理論工具。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用於詮釋文學的研究方法也就日益多元化<sup>4</sup>。由此看來，對於明代文學的研究，從原本僅對於文本的解析上，進而發展成與社會文化、商業經濟……等接軌，運用不同的視野對文本進行剖析，使得文學研究呈現出多元視角。

在明代文學研究之上，文學研究的視野漸與社會文化接軌，例如從小說文本中看明代社會的狀況：楊永漢《虛構與史實：從話本小說『三言』看明代社會》、尹恭弘《金瓶梅與晚明文化》、林麗月〈從「杜騙新書」看晚明婦女生

---

<sup>4</sup> 季羨林主編《明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頁9-10。

活的側面〉、劉良明《市井民風：《二拍》與民俗文化》。這些都是以小說討論文本，來看明代的社會生活。小說的內容反映了庶民生活，從小說文本中對明代的社會可窺知一二。因此，明代社會文化的現象，確實可與文學接軌，作一個全面性的探討。

除了從小說的討論來看社會的遞嬗改變之外，明代的戲曲也是值得重視的一環，戲曲的發展顯示了庶民文化的高度發展，以戲曲為研究的專書有：程芸《湯顯祖與晚明戲曲的嬗變》、王永健《湯顯祖與明清傳奇研究》、吳秀華《明末清初小說戲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王璦玲《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陳慶煌《西廂記的戲曲藝術》、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等專著，從這些研究戲曲的專書來看，顯示出戲曲的發展在明代時期已經受到高度的重視，從戲曲評點、性別創作、藝術呈現的角度來剖析，皆可觀察到對於戲曲的研究，並不亞於明代小說，一樣受到高度的關注。

再者，以晚明小品文為主題做討論的有：曹淑娟先生的《晚明性靈小品研究》，以小品文來分析文人的處事態度，以及探討晚明文人親近山水、遊覽山水的歷程，初步說明了山水樂趣在晚明文人的生活中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再者，如陳萬益先生《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吳承學先生的《晚明小品研究》，論及晚明文人旅遊山水、小品文遊記的特色。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透過對旅遊小品的析論，寫小品遊記的旅遊概況。或是從美學角度來探討小品文的旅遊美學，如：陳忠和先生的〈晚明山水小品中「遊貴有言」的審美表現理念〉、〈晚明山水小品「以我

觀物」的審美感應模式），試圖從晚明文人的山水小品文中來看文人的審美價值，以及生命體驗，另一篇〈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是探討文人從事遨遊與臥遊時心態上的不同，不同的旅遊方式顯現出文人心中不同的價值觀點。

專以「明代社會」為論點的專書有：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書中從生活、經濟、社會、思想、心態諸多層面的角度切入，探析此一轉型的社會。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略述明代商業的發展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將明代分為四個階段：冬（1368-1450）、春（1450-1550）、夏（1550-1642）、秋（1642-1644），以季節來象徵明代的興盛與沒落。

再如以晚明時期為討論對象的有：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以多元的視角結構，來看社會變遷的問題，完整呈現「變」在晚明社會的特質。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敘述明代後期文人的心態轉變與社會風尚的關係，文人心態的轉變使他們徘徊於入仕與世俗之間，轉而以追求生活情趣為目標的生活態度。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此書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江南士人群體的心態，價值觀念，以江南為研究中心，顯示出江南在晚明時期具有重要的經濟與文風之地。錢杭所著《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將關注的時間界定在十七世紀，並且從江南的政治地位談起，來論述在十七世紀時江南社會的歷史定位，以及文人生活的情況。

進一步探討晚明旅遊之風氣的研究則有，龔鵬程先生的〈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sup>5</sup>，主要探討晚明文人的旅遊觀，遊已非是一種不得志、感傷之遊，

---

<sup>5</sup> 龔鵬程《晚明思潮》，〈遊人記遊—晚明小品遊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說明晚明文人的遊大異於前朝文人的遊，晚明文人遊出了自己本身的價值，肯定了晚明文人為遊而遊的閒適心態。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sup>6</sup>則是以明代文人的山水生活主題為主，分為山居、攬勝、舟遊、恬適四類生活樣式來看文人的閒適生活，是從社會文化現象來論述。另外，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sup>7</sup>主要探討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的特點，是以社會現象的角度來看晚明的旅遊活動，跳脫了從小品文的角度來討論旅遊，而是從相關書籍的印行、旅遊交通、食宿商品化、導遊、及旅遊套裝行程的出現……等現象反映出來的旅遊概況。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選擇長江三角洲為討論中心，是因其經濟文化與水平同處一個層面，有密切的地緣關係，從旅遊學的角度，運用現代旅遊理論及歷史學、地理學的相關研究方法，對長江三角洲的旅遊活動進行多層面、多視角的探討<sup>8</sup>。其它有關旅遊研究明代旅遊的作品有：滕新才〈明朝中後期旅遊熱初探〉<sup>9</sup>、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地理學的關係〉<sup>10</sup>，以明人遊記為焦點，對晚明的旅遊風氣、文人旅遊觀點、旅遊理論做了分析。陳建勤〈明清時期的江南文人遊風〉<sup>11</sup>、〈論「遊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sup>12</sup>、〈風尚·環境·文士—明清江南遊風熾盛原因初探〉<sup>13</sup>，以江南地區為討論中心，探討明清時期江南遊風之盛的原因。或是在論述社會生活史、文化史的方面的文章，也有討

<sup>6</sup> 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101-129。

<sup>7</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熊秉真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225-255。

<sup>8</sup> 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9月）頁5。

<sup>9</sup> 滕新才〈明朝中後期旅遊熱初探〉，《北方論叢》（1997年），第3期，頁17-21。

<sup>10</sup>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5年）頁72-78。

<sup>11</sup> 陳建勤〈明清江南地區的文人遊風〉，《旅遊科學》，（2000年）第4期，頁43-46。

<sup>12</sup> 陳建勤〈論「遊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旅遊學刊》，（2000年），第4期，頁64-68。

<sup>13</sup> 陳建勤〈風尚·環境·文士—明清江南遊風熾盛原因初探〉，《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第28卷，頁15-19。

論明代旅遊活動的有：皋于厚〈明清小說風俗描寫的人文意蘊〉<sup>14</sup>。

除了上述單篇論文外，以旅遊、遊記為專著的有：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章必功《中國旅遊史》、沈祖祥《旅遊文化學導論》，也都涉及明代旅遊的討論。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詳論《徐霞客遊記》兼綜文學與地學的特點。又如賈鴻雁《中國遊記文獻研究》，也論及明代時期的遊記文獻價值。

以旅遊、遊記、小品文為題的碩博士論文為數不少，由此可見得旅遊文學的議題討論也是多元性的，茲作表格呈現除下：

論文名稱	著者	年份	學校系所	碩/博	指導教授
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	陳萬益	66	台大歷史所	博	張敬 王夢鷗
晚明性靈小品研究	曹淑娟	76	台大中文所	博	葉慶炳
明人的旅遊生活	張嘉昕	88	文化史學所	碩	吳智和
王季重歷遊書寫研究	黃慧音	90	南華文學所	碩	曹淑娟
袁中道溪遊生活研究—以《遊居柿錄》為例	黃雅雯	92	淡江中文所	碩	黃明理 曾守正
張岱小品中的旅遊休閒	曾淑娟	93	彰師大國文所	碩	蔣美華
晚明文人旅遊生活研究	蘇美璇	93	南華文學所	碩	李正治
晚明山水小品美學研究	陳忠和	94	高師大中研所	博	江聰平

<sup>14</sup> 皋于厚〈明清小說風俗描寫的人文意蘊〉《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4期，頁220-227。

袁中郎山水遊記研究	洪正君	95	南華文學所	碩	釋依空
性靈與山水的邂逅—袁中郎遊記小品研究	簡郁昕	95	師大國文系 在職進修班	碩	潘麗珠
論張岱遊記中人文精神之體現	張志帆	95	文化中文所	碩	嚴紀華
晚明旅遊小品文研究	王怡文	96	市北師中文所	碩	馮永敏
晚明袁宏道山水遊記小品語言藝術研究	陳千代	96	彰師大國文所	碩	耿志堅

由列表資料可見，對於晚明的小品文、遊記、旅遊議題的討論，呈現出多元的現象，無論是從語言藝術、美學、思想，或是文本的爬梳中，甚至是以旅遊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析論遊記，皆可呈現出不同的討論空間。傳統的文人著述，與生活、文化等新議題的探討，有融合為一的現象。

從以上探討遊記的文獻資料可知：對於明代文學的研究，漸與社會文化的領域接軌，開始從文本中來討論社會現象，甚至是物質生活的表現，顯示出研究方向的改變，以及從多元、跨領域的角度來談論晚明這個時代。在探討明代遊記興盛的同時，對於王士性與徐霞客的討論更是不容忽視，此二人在明代的遊記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在談論明代旅遊風氣之時，不得不將此二人重新定位，做完整且全面性的討論，亦是本論文的主旨所在。

王士性與徐霞客的研究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對於徐霞客的研究目前在大陸已是一股潮流，其中一直持續出版研究的是：江陰市人民政府徐霞客研究會所出版的《徐霞客研究》，至今 2009 年為止，目前已出版至第 15 輯，此書出版迄今已有 10 周年之久，是最為積極的單位。目前研究徐霞客之集大成為：呂錫生先生所編著的《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無錫太湖文史研究中心編纂，全書分為

上下兩篇，目前台灣仍未見此書，但無錫圖書館則提供了線上資料庫可供閱讀。大陸學者方面從事徐霞客的研究頗多，甚至已成了一股「徐學」之風潮<sup>15</sup>，如：朱鈞侃、潘鳳英、顧永芝著《徐霞客評傳》、朱惠榮先生所著《徐霞客與徐霞客游記》、朱鈞侃、倪紹祥主編《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周寧霞著《徐霞客論稿》、鄭祖安、蔣明宏主編《徐霞客與山水文化》……等，以上這些著作多是探討徐霞客其人及其在自然地理上的貢獻，多是持著徐霞客是「千古奇人」、「時勢造英雄」之觀點，筆者以為，若是能將徐霞客重新定位為僅是位旅行家的這個角度來探討，或許能夠給與徐霞客最原本真實的面貌。

台灣對於徐霞客的研究熱潮雖不若大陸，近年來已有一些的學者注意，相關的期刊論文有：方麗娜〈徐霞客遊記之文學特色研究〉<sup>16</sup>、王文進〈中國自然山水文學的三部曲--以南朝「山水詩」到「徐霞客遊記」的觀察〉<sup>17</sup>、蕭之華〈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談徐宏祖及其「徐霞客遊記」〉<sup>18</sup>、蕭璠〈徐霞客旅遊途中所見到的環境破壞〉<sup>19</sup>，顯示台灣對於徐霞客的研究已有些許成績出現。

碩士論文方面目前有五篇，分別是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梁秀鴻所著《徐霞客遊記之文學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呂麗粉《徐霞客遊記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陳淑卿《徐霞客遊記研究—以文獻觀察為重點》以及南華大學文學所張百裕的《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及其敘事表現研究》、臺北市立教

<sup>15</sup> 「徐學」一詞語出《千古奇人—徐霞客》〈徐霞客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國際紀念活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6。

<sup>16</sup> 方麗娜〈徐霞客遊記之文學特色研究〉，《臺南師院學報》第26期（1993年6月），頁139-158。

<sup>17</sup> 王文進〈中國自然山水文學的三部曲—以南朝「山水詩」到「徐霞客遊記」的觀察〉，《中外文學》，第26卷6期，1997年11月，頁75-82。

<sup>18</sup> 蕭之華〈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談徐宏祖及其「徐霞客遊記」〉，《文藝月刊》第246期（1989年12月），頁66-72。

<sup>19</sup> 蕭璠〈徐霞客旅遊途中所見到的環境破壞〉，《歷史月刊》第22期（1989年11月），頁106-110。

育大學祝一麗《徐霞客遊記與遊記散文比較研究》，由這五篇論文看來，可以窺見對於徐霞客的研究是很廣闊的，諸如：文獻研究、山水美學、敘事、散文比較，藉著多元化的討論來試圖突顯徐霞客的價值，而非只是一味的將徐霞客冠上民族英雄之名，而忽略了其最原始的根本價值。

在中國大陸方面的學位論文則有：孫艷梅《旅游地學視野下的徐霞客研究》、楊林軍《徐霞客與麗江地方文化研究》、張晉光《徐霞客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成就考論》、初征《《徐霞客游記》中的地理文化意蘊》、曹姝《論徐霞客寺廟審美觀及其現實意義》。在中國大陸對於徐霞客的研究雖已成為潮流，但以碩博士論文的數量來看，仍稍嫌不足，對於徐霞客的研究成果多是以單篇論文或專著為主。

而對於王士性的研究則是遠不及徐霞客的活絡，但近年來已慢慢開始重視王士性對於人文地理學上的貢獻，即便如此，在專著及單篇論文的數量仍不及徐霞客來的多，目前大陸的專著書僅有一本：《王士性論稿》。周振鶴先生編校的《王士性地理書三種》，是目前研究王士性與其遊記最完整的資料，書中收錄王士性的《五嶽遊草》、《廣遊志》、《廣志釋》、及《王恆叔近稿》。

單篇論文方面，范宜如先生撰寫〈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釋》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sup>20</sup>、〈王士性紀遊書寫初探：以《廣志釋》、《五嶽遊草》為討論對象〉<sup>21</sup>，此兩篇單篇論文是台灣目前的研究成果，而大陸方面單篇論文的內容多半是注重在王士性對於人文地理學的貢獻，顯示後人對於王士性

<sup>20</sup>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釋》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師大國文學報》（2007年12月），第42期，頁121-151。

<sup>21</sup> 范宜如〈王士性紀遊書寫初探：以《廣志釋》、《五嶽遊草》為討論對象〉，《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8年7月），頁301-317。

與徐霞客的重視程度大有不同。

在大陸方面關於王士性的論文有：張勇〈理論與經驗透出的文化傳統—王士性與徐霞客旅行的比較研究〉<sup>22</sup>、敖紅〈淺論王士性的旅遊審美觀〉<sup>23</sup>、楊森、陳賚福〈王士性對自然地理學的貢獻〉<sup>24</sup>、李躍軍〈淺論王士性的旅遊觀〉<sup>25</sup>、覃彰〈王士性對滇雲史地的考究〉<sup>26</sup>、周振鶴〈王士性的地理學思想及其影響〉<sup>27</sup>、徐建春〈王士性研究三題〉<sup>28</sup>、馮歲平〈《徐霞客游記》記述的王士性〉<sup>29</sup>。從這些討論王士性的論文看來，可以知道研究的焦點著重於王士性的旅遊觀、地理思想，近年來已慢慢開始重視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學上的貢獻，也有學者將之與徐霞客作一比較，企圖建構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學上的地位。

---

<sup>22</sup> 張勇〈理論與經驗透出的文化傳統—王士性與徐霞客旅行的比較研究〉，《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4年9月）。

<sup>23</sup> 敖紅〈淺論王士性的旅遊審美觀〉，《內蒙古大學人文學院旅遊學系》第9期（2004年）。

<sup>24</sup> 楊森、陳賚福〈王士性對自然地理學的貢獻〉，《台州師專學報》第17卷第4期（1995年9月）。

<sup>25</sup> 李躍軍〈淺論王士性的旅遊觀〉，《台州師專學報》，第21卷第4期（1998年8月）。

<sup>26</sup> 覃彰〈王士性對滇雲史地的考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6卷第6期（2004年11月）。

<sup>27</sup> 王士性〈王士性的地理學思想及其影響〉，《東南文化》第2期（1994年）。

<sup>28</sup> 徐建春〈王士性研究三題〉，《浙江學刊》第4期（1994年）。

<sup>29</sup> 馮歲平〈《徐霞客遊記》記述的王士性〉，《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期（1998年）。

###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旅遊」一詞在中國古籍中最早是出現於南北朝時，梁朝詩人沈約在〈悲哉行〉的詩中寫道：「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到了唐代，隨著旅遊活動的蓬勃發展，「旅遊」一詞開始被大量運用，如：白居易的「江海漂漂共旅遊，一尊相勸散窮愁」。由此見得，旅遊這一詞充分的反映出了中國旅遊的歷史悠久。而龔鵬程先生曾提到對於遊的看法是：「凡是人處在壓抑、閉塞之環境中，則真實的旅遊或夢中旅遊，一樣均可提供人超越現況的解放感，人即是因為需要獲得解放，才外出旅遊、探險<sup>30</sup>。」旅遊代表著一種精神上的寄託與解放，我們可以知道：「旅遊」可使心境轉換、有一種超越現實的解放感，以達到愉悅的心情<sup>31</sup>。

故欲探討晚明江南文人的旅遊之風，必先從晚明的社會風氣談起，文中談到的「晚明」一般界定是以萬曆後到明代滅亡前的這段時間<sup>32</sup>。事實上這段時間是晚明產生劇烈變動的一個時期，許多外在因素影響了文人的心態，商業繁榮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奢靡風氣也漸漸地瀰漫整個社會，多元性的發展使得晚明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風貌，旅遊風氣也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條件之下所發展出來的。

---

<sup>30</sup> 龔鵬程《遊的精神文化史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頁149。

<sup>31</sup> 根據《中國旅遊文化大辭典》中對「旅遊」的定義為：「旅遊，即旅行遊覽活動。以遊覽為主要目的的旅行，是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為了滿足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某種需求，以遊覽、娛樂為主要目的」，因此，旅遊一詞帶著遊覽、旅行的意味。

<sup>32</sup> 萬曆時期至明代滅亡這一段時間共歷經了70年左右（1573-1644），歷經四位皇帝，萬曆神宗（1573-1620）、泰昌光宗（1620-1620）、天啓神宗（1621-1627）、崇禎思宗（1628-1644）。歷史分期的問題向來都是很模糊的，晚明的時間概念並無明確的一個時間斷限，陳萬益先生於《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中寫道：「晚明的確切範圍，一般說法並不一致，但多指萬曆以後。」（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5月），頁41。

再者，由於江南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得天時地理之便，氣候良好，資源豐富。除此之外，江南的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極為便利，北有長江，南有錢塘江，內有太湖，加上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形成河流縱橫、密布的水網。在商業經濟方面，則呈現出多元性商品的發展，這是在地理、歷史諸多的原因綜合下所出現的現象<sup>33</sup>。如此之外，唐宋以來，由於文化、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江南已成人文薈萃之地，眾多文人聚集於江南一帶，形成了一股文風。由此看來，在經濟、交通、地理、文風的眾多優勢之下，江南地區的旅遊風氣也愈益繁盛，史稱：「吳人好遊，以有遊地有遊具有遊友也。遊地則山水園亭多於他郡。遊具則名酒嘉肴、畫船、簫鼓咄嗟而辦。遊友所謂清客也<sup>34</sup>。」此段話可看出，江南文人的好遊，以及對於旅遊這件事情的重視，在物質生活不虞匱乏的條件之下，開始追求精神生活上的雅興，江南在地理環境的先天優勢條件下，則是促成了旅遊風氣興盛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曹淑娟先生在《晚明性靈小品研究》曾說：「親近山水景物為晚明文人生活的重要內容，在其不同場合，不同文類的撰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們對此一高尚的紀錄。山水遊記最為普遍，在各家文集中皆可尋見；庭園記或者記園內因自然地形加以整治的景觀，或者寫園外借以為背景的山水之勝，都透露了造園者與撰文者的意向；另如在朋友往返的書信、山水畫捲的題跋、書序、日記等不同應用場合的文字中，都可發現晚明人透露其愛賞山水的心態，或記錄其遊

<sup>33</sup> 陳江《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頁27-33。

<sup>34</sup> 清·陳夢雷，〈職方典五·蘇州府部〉，《古今圖書集成》，（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第12冊，卷676，頁6171。

覽山水的經驗歷程<sup>35</sup>。」晚明人好遊歷之風，在此已表達的很清楚，短短一個時代中，有那麼多樣的記遊文字，呈現出不同的旅遊風貌，甚至有以旅遊為職志王士性、徐霞客……等人，呈現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風潮。

在這樣的旅遊風氣之下，遊記的寫作也成了文人的風雅韻事，甚至企圖從遊記中表現自我的生活情趣。於是，遊記書寫面向的多元性，在此一時代也可窺知一二。因此，本文擬從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歷過程及其書寫內容，旁及同時代其他文人的遊記，來討論「記實型遊記」的寫作面向。企圖突顯出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記面向，在這樣的時代氣氛，漸漸以實學為導向的社會風氣，同樣也表現在遊記的寫作之上，當遊記不再只是走馬看花的抒情寫作時，所呈現出的是：「山水為主，以己為賓」，以身許山水的境界<sup>36</sup>。筆者將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歷形式歸之為「壯遊」，是屬於一種長距離、長時間性的旅遊，且是刻苦、非享樂式的遊歷方式，其遊記內容也不是以自我的心情、景物審美為主，而是類近於地理志的書寫方式，科學考察旅遊的出現具有時代性的意義，象徵了晚明的旅遊觀建立起了一個新氣象，是以實用為依歸的旅遊觀念。

透過本論文對王士性與徐霞客遊記的深入探討，將其遊記一一爬梳，重新建構出：遊記不再僅歸於傳統的文學範疇之中，同樣可與地理學、方志、人文、民俗作一接軌。如此一來，遊記的內容也趨向多元性的寫作，涉及範圍之廣，跳脫傳統抒情的性靈書寫，呈現客觀的紀實與歸納，以重新建構晚明遊記的多元價值，在重視實事求是的社會風氣之下，除了在醫藥、科技、農業……等實用專書的出現，遊記同樣也呈現出「經世致用」的風格，這是此時代文人志士

<sup>35</sup>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7月），頁220

<sup>36</sup>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5年）。頁74

求知的精神，也造就了王士性與徐霞客的實學遊記，代表著晚明的旅遊觀念正式走向一個新紀元。承上所述，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 (一) 從時代因素、外圍環境的影響，觀察晚明江南旅遊風氣的時代氛圍。
- (二) 探討傳統文學型的遊記寫作，與記實型遊記寫作面向的差異之處。
- (三) 從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記文本爬梳，勾勒出遊記的內容除了抒情的筆調之外，也可以記實的手法，寫出人文與地理的相互關係，以歸納分析的角度呈現所見所聞，是晚明遊記寫作的最大價值所在。
- (四) 透過本論文的討論，試圖重新建構晚明遊記的寫作多面向，是繼承、創新、再造，甚至是時代接受氛圍。

##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章節大要

### 一、素材選擇

本論文將研究的時間範圍界定在晚明時期（1573-1644），「晚明」時期一般的界定是以萬曆後到明代滅亡的這段時間，而將空間範圍制定於江南地區，先將晚明的旅遊風氣置於時間和空間的脈絡中來檢視，以重新建構當時旅遊風氣的面貌。旅遊風氣形成的原因，涉及範圍廣大，本文試圖從商業的繁榮、水陸交通的發達、文人心態的改變、旅遊資訊的傳播、商用類書、路程書的出版……等，這幾方面來審視旅遊風氣的興盛。在文獻的運用上則以文人的筆記小品、別集為主，如：何良俊、謝肇淛、顧起元、張瀚、朱國禎、王季重、李流芳、李日華……等人的筆記小品中，以建構社會風氣的轉變及旅遊活動的興盛因素。晚明文人將旅遊視為重要之事，習慣將遊歷的感受以文字表現出來，故從書信、序跋、記遊……等的記載中，皆可窺知晚明文人的旅遊生活。

再者，藉著小品遊記的書寫形式，勾勒出晚明文人漫遊的狀況，藉以凸顯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歷精神，同樣是晚明旅行家，但所關懷的事物不同，所寫下的遊記必定與小品文家的性靈漫遊有所不同。因此在資料的運用之上，本文以王士性和徐霞客的遊記為主，從遊記的爬梳當中，探討二人遊記所關懷的焦點，民情風俗的記載、人文與地理之間的相互影響……等，皆是另一種遊記的表現形式。同時，將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記與晚明文人的性靈遊記做比較，如公安三袁、竟陵派鍾惺與譚元春的遊記，皆是本文必須討論的部份。

另以徐霞客和王士性二人的遊記，來探討晚明旅遊觀念的轉變，從「性靈漫遊」到「考察壯遊」的這個過程，代表著在遊記的書寫方式上，所關注的焦點已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記已開始記載「遊蹤」，且是鉅細靡遺將所走的路程、當地的地理環境、人文風俗……等清楚的記載下來，所謂遊記已不再是主觀式地將美景加入自己情感讚嘆一番，而是以一種客觀的角度來記錄所遊歷的一切事物，這種遊蹤的記載在晚明文人的遊記來說，是少見的，且是以王士性與徐霞客二人的遊蹤式遊記書寫最為詳盡<sup>37</sup>。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文本研究為主，輔以歷史考述方法，收集明人文集、與明代相關的社會文化史料、方志……等文獻資料，再以下列的研究方法做全面性的討論：

- 一、文獻探討：收集晚明時期的歷史文獻，以政治、商業經濟、社會文化、小品文集的文獻資料為主，以釐清整個晚明時期的社會狀況，試圖解釋晚明旅遊活動的興起之因。
- 二、歷史地理考述：考究晚明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狀況與文化現象，針對晚明時期的歷史脈絡加以了解，以及對江南地區的地理文化考述，以歸結出江南地區旅遊風氣繁盛的歷史與地理因素。
- 三、旅遊心理學：探究旅遊者的心理層面，為何在晚明時期文人的旅遊現

---

<sup>37</sup> 記行式的遊記書寫真正具備了記行日記的寫作方式，首推唐人李翱的〈東南錄〉，這篇記行體的遊記是唐憲宗元和三年（808），李翱接受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楊于之邀，自長安至廣州的記行日記。他紀錄了作者歷時半年，途經今陝西、河南、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等六省的行程，此篇文章文字極其簡潔，作者行文的重點是遊蹤。參照：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頁128。李翱〈東南錄〉寫道：「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乙丑，與韓泰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滇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全唐文》（卷638）。此篇遊蹤式的遊記雖僅是用簡短的文字記載時間、地點、以及所見到的景物，不作繁筆細摹，其中靈應山之遊賞，韶石之觀覽，全都是一筆帶過。

象增多，是社會因素的影響，或是對旅遊的自覺？還是對生活美感的追求，抑或是消費性社會所帶來的消費行為，這些都可從晚明文人的心理因素來探討。

四、分析歸納：以王士性和徐霞客的遊記為主，分析二人的遊記寫作內容，與其他性靈小品遊記的寫作風格有何不同，歸納出晚明遊記寫作的多元面向，除了對性靈遊記的關注外，紀實型遊記的寫作同樣也是值得被注意的一種寫作形式。

## 二、章節安排

綜前所論，本論文在研究架構上，共分為六章，簡要論述如下：

第一章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略論晚明江南旅遊風氣的形成，以及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希望藉著本論文對王士性與徐霞客遊記的討論，能重新建構晚明遊記的價值與寫作趨向。

第二章「晚明社會的特質」，先就晚明社會的背景進行討論，先論述社會風氣的轉變，從原先的儉樸風氣如何過渡到奢靡之風漸長，在物質生活不虞匱乏之後，轉而追求的將是精神生活上的寄託。次為論述晚明文人心態上的轉變，在科舉考試漸不為所重之時，棄儒就賈之風漸盛，與商人的往來頻繁，文人也可從事詩書畫的買賣以糊口。再者，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之下，呈現出了一個衣食無缺的繁榮景象，享樂式的風氣瀰漫整個社會，追求的是感官與生活上的滿足。因此，旅遊即成為當時文人重要的休閒活動，旅遊觀念的轉變也由原本的「玩物喪志」的認知轉變成高尚之事。諸如種種的因素，影響到了旅遊活動的興起。其後，在一片旅遊風潮之中，列舉王士性與徐霞客二人為例，以此二人

的遊記文本為討論對象，藉以探討晚明遊記中不同的書寫面向：公安的性靈遊記書寫，以抒情為主，以真、俗、趣筆調勾勒出熱鬧的遊玩，追求個人的生活情趣，享受生命，多描寫市民文化遊玩的情趣。竟陵派所書寫的遊記則是強調以意境為主，強調意象的幽深，特意營造出孤峭的感覺，與公安派帶有市民文化色彩的遊記寫法不同，兩者形成了一靜一動的強烈對比。最後將王士性與徐霞客的寫作關懷焦點作一論述，以文學性的筆調寫下遊記，其內容又兼論地理與人文，實是中國遊記文學史上一個新的書寫面向。

第三章「王士性《廣志繹》中的人文地理書寫」，人文地理的概念在中國地理學上是較不被重視的一環，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清楚的分析了人文與地理的概念，《廣志繹》一書是王士性在遊歷過後所寫下的心得，將所見所聞歸納之後提升到理論的層面。本章先論述王士性的遊道與遊蹤，王士性將遊的層次分為神遊、天遊、人遊。次論述《廣志繹》中所涉及的民俗風情，如自然環境影響人文生活、婦女的社會地位描寫、特殊民情的紀錄、以及對於西南文化探奇的著墨。諸如此類關於人文地理書寫，是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最主要呈現的人地關係的論述。

第四章「《徐霞客遊記》對社會的關懷書寫」，以《徐霞客遊記》為討論中心，先談徐霞客實學思想的成因，與東林黨人的交往進而間接影響了經世致用思想的闡發，在一片經世致用的聲浪中，《徐霞客遊記》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在時代的潮流之下所出現的一部文學與地學並蓄的作品，同時代兼有李時珍、宋應星等人，相互輝映。次談論徐霞客的遊蹤以及探其精神，最後論述在《徐霞客遊記》中對社會的關懷書寫，以社會史實和民情風俗為討論重點，從《徐霞客遊記》的寫作面向我們可以得知：徐霞客並非以抒情的筆調來寫遊記，而

是以紀實、客觀的手法呈現遊蹤，這是與晚明性靈小品遊記的寫作面向，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亦可得知在這社會的氛圍之下，遊記的寫作所呈現的是一個多元化的視角，而非只是單一的抒情性靈寫作。

第五章「結論」，綜合前四章所言，將晚明遊記寫作的不同面向做一完整的討論，希冀藉著王士性與徐霞客的壯遊精神，以及遊記實學的寫作趨向，建構遊記所呈現出來的多元視角。

## 第二章 晚明社會變動與旅遊書寫

探討晚明旅遊風氣如何興起之前，必須從晚明的時空背景談起。在急遽變動的晚明社會裡，諸多的外在因素影響了文人的旅遊熱潮。此時，山水遊記成爲文學創作的時髦主體<sup>1</sup>。到底是什麼原因影響文人的心態、活動極大。故在探討晚明旅遊風氣之前，必欲先從商業發展、政治的趨向、文人觀念的轉變等各方面來作探討，以分析晚明文人的好遊之風。

### 第一節 晚明社會風氣的轉變

探討晚明的社會風氣，必先從商品經濟的繁榮來討論，商業的繁榮帶給晚明社會什麼樣的衝擊與改變？次論從儉樸到奢靡的社會風氣，從服飾、乘轎……等現象來探討，企圖勾勒出晚明的風氣氛圍。

#### 一、商品經濟的繁榮

晚明呈現出一個多元發展的社會，與商業的繁榮有很大的關係，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從事商業的利潤高於農業，故有許多紳宦與具有功名身份的生員、舉人……等，改變了過去視商賈爲賤業的看法，紛紛從事工商業<sup>2</sup>。黃省曾

(1496-1546) 在《吳風錄》說：「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sup>3</sup>。」江南士人

<sup>1</sup> 陳書良、鄭憲春《中國小品文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17。

<sup>2</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爲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熊秉真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226。

<sup>3</sup>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集部733，頁6a。

參與生產事業，與商人的身分相混的情況已很明顯。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封建社會逐漸沒落<sup>4</sup>，取而代之的是分工越細的商業活動，如：絲織業是營利最為豐厚的行業<sup>5</sup>。于慎行（1545-1608）在《穀山筆塵》說道：「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而好殖，以故富庶<sup>6</sup>。」吳人以絲織業為業，即使是士大夫之家，也是從事此行業，其風俗是勤儉而愛好從商，故其地繁榮富庶。

何良俊（1506-1573）《四友齋叢說》中提到了「去農經商」的狀況：

余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為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不堪命，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蠶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sup>7</sup>。

何良俊這段文字說明了：對於務農之事，已不若正德以前受到重視，去農的風

<sup>4</sup> 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台北：聖環圖書，1994年6月），頁4-5。

<sup>5</sup> 江南城市是絲織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因此從明代中葉起，江南地區出現不少的絲織業市鎮，逐漸脫離農業而獨立起來，如蘇州的盛澤鎮，據弘治元年（1488年）編纂的《吳江縣志》所記載，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村落，而當嘉靖四十年（1561年）時則「居民百家」，到了明則僅網斯牙行約有千百餘家，在馮夢龍《醒世恆言》中〈施潤澤灘闕遇友〉說到：「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個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績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參照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台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9月）頁96。

<sup>6</sup>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相鑒〉，頁39。

<sup>7</sup> 明·何良俊，〈史九〉，《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卷13，頁111-112。

氣頗盛。在正德年間以前，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之業無有他志。而到嘉靖、隆慶年間之時，賦稅日增，故民不堪命，需要更多的金錢來維持生活所需，於是漸漸去農就商，希望快速賺得大量的金錢以應付所需。昔日的當官人家不多，但於今捨棄農作而為官者比以前多十倍餘。又如正德以前從商者少，而後去農改業為工商者，比從前多三倍餘。去農之風在嘉靖、隆慶時已很明顯，在商業的衝擊之下，傳統的務農行業獲利微薄，因此紛紛投向商賈行業。這也使得商人地位大為提升、金錢價值觀逐漸改變，以實際利益為導向的生活需求已是時勢所趨，棄儒就賈的風氣瀰漫整個社會。

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為晚明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轉變，在這一個變動的過程中，社會呈現出多元的發展，價值觀已不復以往的保守，「商人士大夫化」以及「文藝商品化」的現象，衝擊了固有的封建社會。因此，亦儒亦商的士大夫成為新起的社會階層，經商必須四方奔波，遊歷的過程使商賈增加對外在世界的了解與認識。從晚明士大夫為一些「亦儒亦商」者所撰的傳記中，可以看到傳記作者將這些人的客商活動用「遊」字來定義，強調他們「遊」的經歷，或稱之為「遠遊」或是「博遊」<sup>8</sup>，可見士大夫一旦從事商業活動就必需遊歷四方，如此正擴大了士大夫的視野，進而改變與豐富了士大夫的旅遊觀，也促進了旅遊風氣<sup>9</sup>。

除了上述因經商之需而四處奔走的「商旅」外，在經濟的高度發展之下，消費性社會促成了時尚的觀念<sup>10</sup>。文人旅遊風氣的興盛亦是消費社會的潮流之

<sup>8</sup> 濱島敦俊教授曾舉出兩個例子說明晚明士大夫從事客商活動的情形，一是倪謙(1415-1479)在《倪文僖公集》中記述一個江南崑山縣人沈文玉出遊的情形，另一是祝允明(1461-1527)位在《懷星堂集》記載吳縣人湯文守的經歷。兩者的客商活動都被稱為「遊」。參見濱島敦俊，〈土地開發與客商活動--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資活動一〉，《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 103-104。

<sup>9</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頁 226-227。

<sup>10</sup> 有關於消費性社會一詞語出巫仁恕先生於《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與士大夫》一書的第一章

一，士大夫好遊，連大眾平民百姓也都積極參與此一盛事，旅遊活動從本來「未業」之事躍升一變而為「能高」之事，這背後所代表的是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也呈現出了當時人民享樂的心態，華衣、美食、遊覽名勝儼然成為品味生活高低的標準，旅遊是晚明人最重要的生活雅興。

## 二、消費觀念的改變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一套「禁奢政策」，希望整個社會趨於安定，以革除前代所遺留下來的僭越之習，他認為元之所以失其政是因「貴賤無等，僭禮敗度」之弊，法制若無法規範人民所為，則民心必趨於放蕩無度，為避免踏上前朝之鑑，於是明太祖下達了「禁奢令」。在「禁奢令」下的社會，慾望的滿足、消費的方式必以社會地位為條件<sup>11</sup>。他們認為只要人人遵守禮制所定的分位，「尊卑貴賤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安其生，則社會秩序井然，天下因此治平，並頒佈《教民榜文》，以教化的力量來維繫社會善良風氣，在社會經濟上採取「重本抑末」的政策，限制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安定的農村經濟環境<sup>12</sup>。明朝初年朱元璋所制定的法治乃是遵循《禮記》的精神「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sup>13</sup>。」由最基本的服飾、名分的定位來制定人民的位階，以維持社會秩序。

社會風氣的變化，最明顯的即是對於物質消費的追求，從食衣住行的消費

---

〈消費社會的形成〉（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7年），巫仁恕先生指出晚明之所以形成消費社會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市場購物的頻率增高。二、奢侈品成為日常用品。三、奢侈消費的普及化。四、流行時尚的行程。五、身分等級制度的崩解。六、奢侈觀念的新思維。以上幾點的改變，促成了晚明走向一個消費性的社會。

<sup>11</sup> 林麗月〈明代禁奢令初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1994年6月），頁57。

<sup>12</sup>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明清與近代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頁138。

<sup>13</sup> 《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頁865。

模式可看出人民生活的經濟能力，趙寬（1457-1505）詳細紀錄了當時江南地區尚奢的情況：

吳俗尚侈，古則然也。而今為尤甚。凡居室、服御、器用之物，婚姻喪葬之禮，交接、餽餽、問遺、饗飧、燕享之事，競為繁麗。飛甍連雲，穹窿巍峨，而土木藻繪之飾無紀極也。輿杭、觴豆、巾烏之類，錦貝玉石、雕鏤刻畫不遺餘巧也<sup>14</sup>。

趙寬提及：吳地的風俗自古以來即尚奢，凡是居室、餽贈禮物、飲食、宴會……等之事，皆講究排場。可見當對於日常生活的品質越來越要求之時，也意味著貴賤之別在眾人眼中已不是那麼重要，於是開始追求生活上的舒適與品味。當貴賤之別已被破壞之時，後人往往會以悖禮犯義的眼光來檢視當時的社會，甚至冠上奢靡之說，筆者認為：「奢靡」是相對於「儉樸」而言，是在兩相比較之下而得出的結果，將晚明的社會風氣視為「奢靡」，似乎有欠妥當，經濟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在高度商業化、多元化的社會，對於物質的需求與生活品味的提升是必然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說：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並非是奢靡的表現，而是經濟發展之下的一個必然現象。

商業的繁榮的確帶來了生活的多樣化，在奢靡的風氣之下，則需要有為奢靡生活而服務的行業，至明代中後期時，商業的繁榮更是促進了居民謀生的機會王士性（1547—1598）在《廣志繹》中記載了杭州旅遊的風俗：

遊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已為遊地，則細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

<sup>14</sup> 明·趙寬，〈素軒記〉，收入《弘治吳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頁619。

司時禁之，固以為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sup>15</sup>

西湖已是遊覽勝地，因此提供了當地小販一些商機，但王士性也提到：官方若是加以制止的話，則會使當地小民失去賺錢的機會。

顧公燮曾說「奢靡」與「生存」有相輔相成的關係：

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於絕，此天地間損益流通，不可轉移之局也。<sup>16</sup>

此乃顧公燮在《消夏閑記摘抄》中論蘇俗奢靡的一段話，他認為奢靡未必是負面的社會風氣，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是促成商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一）服飾的改變

從服飾的穿著上可一目了然知其地位，也是可以使人清楚判斷貧富和身份。衣服是民生必需品之一，辨其身份貴賤最簡單的方式即是從「服飾」上的不同來判斷。自漢初制訂的服色禮儀中，以不同服飾區別上下尊卑，這種方式一直是維繫社會等級制度的重要內容，服飾是身分與地位的象徵，上位者爲了要「明貴賤，辨等威」，故在服飾制定出差異性，以期做到貴賤有級，服位有等<sup>17</sup>。因此在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甫一個月，便「詔復衣冠如唐制」因爲他認為元朝

<sup>15</sup> 明·王士性〈廣志釋·江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卷4，頁325。

<sup>16</sup> 顧公燮〈蘇俗奢靡〉，《消夏閑記摘抄》收入《涵芬樓秘笈》第二輯，（北京：北京圖書，2000年），上冊，頁674。

<sup>17</sup> 林麗月〈明代中後期的服飾文化及其消費心態〉，《經濟史、都市文化與消費文化：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頁467。

「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是廢棄禮教的行爲，甚至他認爲元朝的服飾制度就是「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侈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sup>18</sup>。」由於服飾上的僭越，造成了平民百姓與公卿不易分辨，貴賤無等，社會階級不易區分出來，此是元朝執政之失敗的原因之一。因此，明代的服飾在成化以前是呈現一種「不論貧富，皆尊國制」的守禮狀況，服飾的特點是「服不錦綺」、「服布素」、「衣無綺紈之飾」，多穿自制廉價的土布衣服<sup>19</sup>。明初對於服飾的規定，一則是爲了區分身份，另一方面也有提倡節儉、反對奢華之意。可知其在明太祖所制定的法律之下，呈現出風俗淳美、儉樸的社會氣象。

由平民百姓服飾穿著上的不同，可窺知整個社會風氣的變化，服飾所代表的是一種時尚與品味，當社會經濟處於富裕之時，追求的是物質生活上的滿足。因此我們可以說：中晚明時期的平民百姓在消費心態上，已逐漸意識到服飾可代表身份，故欲藉此彰顯身份，以打破舊有的社會等級<sup>20</sup>。

大致而言，正統至正德年間（1436-1521）是明代社會經濟日趨繁榮、風俗由儉轉奢的關鍵時期。經過了六十多年的休息，社會經成長迅速，在商品經濟的發展衝擊下，加上政治綱紀已不如明初嚴整，於是，貴賤有別、民風淳樸的社會，已開始出現了僭越的現象<sup>21</sup>，當商品經濟發展到顛峰之時，人心與物力之間的平衡，即被物質需求所取代，消費型態因而改變。以服飾的改變來說，張

<sup>18</sup> 《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1962年），「洪武三年八月庚申」條

<sup>19</sup>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第4期，（1994年）頁53。

<sup>20</sup> 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新史學》第10卷3期，（1999年9月）頁55。

<sup>21</sup>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頁139。

瀚（1510-1593）在《松窗夢語》中提及：

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代變風移，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龍鳳服飾，惟皇后、王妃始得為服；命婦禮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銀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紵絲綾羅，六品以下用綾羅緞絹；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是皆僭擬無涯，逾國家之禁者也<sup>22</sup>。

張瀚此段話清楚地說明：明初洪武之時律令嚴明，士人、婦女的服飾皆有定制，以官位四品、五品、六品的位階來制定服飾，如以翡翠珠寶、龍鳳鑲繡的服飾，只有皇后、王妃能穿著。但隨著世風、經濟的變化，人們已逾越明初時的禁令，男子穿綾羅錦綺；女子以金珠為首飾，服飾上的僭越現象代表著消費生產力的提高，以及人心與物質平衡上的轉變，法令的制定已經無法約束日益繁榮的經濟生產力。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中論及婦女服飾的變化速度：

留都婦女衣服，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髮之飾，履綦之工，無不變易<sup>23</sup>。

此段話說明在南京地區婦女服飾的變化，顧起元認為：在三十年前，約是隆慶年間，服飾是十餘年才改變一次，如今是不到兩、三年的時間就有所變化，至於首飾、衣袖、花樣與顏色……等無不變易。當時服飾的流行中心在江南地區，

<sup>22</sup> 明·張瀚〈風俗紀〉，《松窗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卷7，頁123。

<sup>23</sup> 明·顧起元〈服飾〉，《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月）卷9，頁293。

蘇州松江一帶是國內著名的棉紡織中心，有著「衣被天下」的稱號。張瀚也提到蘇州成爲服飾流行中心的狀況：

至於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於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而之儉也。蓋人情自儉而趨於奢也易，自奢而返之儉也難。今以浮靡之後而欲回樸茂之初，胡可得也<sup>24</sup>。

張瀚分析民間風俗多以江南侈於江北，江南喜好奢華、異服，也造就了蘇州地區手工業的發達，所製之服向來華麗新奇，所以才成爲了當時的時裝中心，文末張瀚分析說：這也反映出「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的事實。若要再回到最樸實的民風，已是不可得之事。也可以看出，奢侈風氣助長了經濟的發展，從正面來看，由於消費模式的改變，在商品經濟流通的快速之下，百工興起，各得其所，奢靡未嘗是負面不好的社會風氣，是在高度商業的發展之下，所呈現出的社會現象。

由晚明服飾變化頻繁的現象來看，充分地反映出了社會的消費現象，這代表著：一是顯示地位，以昂貴的服飾來展現其富有和經濟地位；二是展現流行，以不斷更換款式來顯示金錢消費流通的快速，像是「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這樣的情況，都顯示出了晚明人追求物質享受與品味的心態，不論在經濟能力上是否擔負得起，追求流行、時髦的消費心態是此時期最主要的時代風尚。

---

<sup>24</sup> 明·張瀚〈百工紀〉，《松窗夢語》，卷4，頁70。

## （二）交通工具的演進

在交通工具的變化上，也顯現出了明人開始注重自身的享受。明朝制度有言，京官三品以上乘轎，其他官員可乘馬，士大夫在使用輿馬交通工具上起初是遵制而行的。但到了明代中後期開始已發生了變化<sup>25</sup>。謝肇淛（1567-1624）在《五雜俎》曾說道：

國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人共雇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登第，其時朗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sup>26</sup>。

謝肇淛此段話記載明代進士由步行至乘驢、騎馬，最後演變至以乘轎為常。在弘治、正德年間僅有二三人共同僱用一馬匹，之後皆以乘馬為習。在萬曆年間謝肇淛登第之時，朝中進士皆乘馬，遇大風雨時則乘轎，之後乘馬者逐漸變少，而乘轎者趨多，謝肇淛認為這是人情所趨，且在京師大城市中有許多轎夫以此維生，難以禁止乘轎風氣的興盛，無法禁止，也不必禁止。何良俊也曾記載士大夫從步行到乘轎的變化：

明初鄉官離任回家，只是步行，成化間，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隆萬時不僅舉人乘轎，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矣<sup>27</sup>。

<sup>25</sup>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頁 56。

<sup>26</sup> 明·謝肇淛〈事部二〉，《五雜俎》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130，卷 14，頁 629。

<sup>27</sup> 明·何良俊〈正俗二〉，《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卷 35，頁 320。

從步行到騎馬；從騎馬到乘轎，士大夫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逐漸地開始尋求便利性與享受，這裡也指出在弘治、正德年間，士大夫皆是以乘轎為交通工具的景象，萬曆後期，京師的現象是「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sup>28</sup>。」王士性云：

古者婦人用安車，其後以輿轎代之，男子雖將相不過乘車騎馬而已，無轎制。陶淵明病足，乃以意用籃輿，命門生子弟舁之。王荊公告老金陵，子姪勸用肩輿，荊公謂，自古王公貴人無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人轎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豈其遺耶？<sup>29</sup>

王士性舉前賢之例來對照當今杭州乘轎風氣之盛行，陶淵明足病，尚且乘坐竹轎；王安石告老還鄉之時，子姪勸他乘坐肩輿，王安石卻認為「不以人代畜」，此是一種人道精神的表現，卻也反映出傳統封建社會中的儒家思想。而到了晚明之時，婦人女子卻以輿轎為代步工具，此是風氣使然，當時南方乘轎的現象很普遍，朱國禎（1558-1632）說：「南中無大小，皆乘轎，惟有四人、兩人之分<sup>30</sup>。」騎馬乘轎的現象始於士大夫，之後影響到了平民階層，甚至連商人、優伶也都開始乘坐轎子，如此的僭越現象，明初的輿馬規定在此已無法發揮功能，乘轎原先是三品官的特權，但至明末已是平民百姓的普遍交通工具，此現象除了顯示出了晚明整個社會的劇烈變動外，也顛覆了傳統以來為官者富的觀念，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可享有特權與財富，特權在此時期似乎已不復存在了。

<sup>28</sup> 明·顧起元〈輿馬〉，《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月）卷7，頁231。

<sup>29</sup> 明·王士性〈廣志釋·江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卷4，頁325。

<sup>30</sup> 明·朱國禎〈人輿〉，《湧幢小品》，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7年），卷15，頁18。

### （三）房舍、飲食的改異

除了服飾與交通工具外，在房舍上的變化也是由簡單實用到競相華麗，由草舍而瓦屋；由無廳而有廳；由矮小而高廣；由三間五架而多間多架；由樸實而重檐獸背<sup>31</sup>。飲食更是開始講求量多，且質更分外注重，何良俊曾述說了他的親身見聞：

余小時見人家請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宴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sup>32</sup>

何良俊以自己為例，述說自己小時候所見到的筵席，多是幾道菜餚而已，只有在宴請賓客時會有蝦蟹海鮮等物，但一年中也不過兩三次。而今卻是大費周章地講究精緻美食，動輒十多道佳餚，海產山產盡出，或是尋找稀有真品，講究排場。飲食上的多樣化與精緻化，以士大夫家為甚，其花費往往是「富家一席，貧家三年」，也反映出了貧富之間的差距。

經濟力的富庶帶來了社會風氣的改變，侈靡相高的風氣反映了庶民消費型態的轉變。故「先富後奢」，先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之後，才能滿足物欲上的需求，奢侈之風形成之後，又助長了經濟的發展；如此循環不已，但卻也衝擊了原本明初「重農抑商」、「貴賤有等」的社會秩序，因此，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上對於財富的觀念，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已不再是只有仕宦功名，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則財富的多寡即日益重要<sup>33</sup>，因此明末「棄儒就賈」的現象也就日

<sup>31</sup>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頁 54。

<sup>32</sup> 明·何良俊〈正俗一〉，《四友齋叢說》，卷 34，頁 314。

<sup>33</sup>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頁 154。

趨增多。

總而言之，晚明社會消費風氣的變遷是商品經濟發展之下的產物，明代消費風俗的特徵體現出一種新的消費型態，也替傳統的農業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更衝擊了原有的社會等級制度<sup>34</sup>。用「多元性」一詞來探討晚明社會是得宜的，在「變」的過程中，晚明社會走出了一條與前朝截然不同的道路，無論是價值觀、消費觀或是在審美情趣上，都與明初洪武年間明太祖「重農抑商」的傳統社會已有所不同。大體來說，社會風尚的變遷是由縉紳士大夫發其端，大約起於縉紳之家，而婢妾效之，浸假而及於親戚，以逮鄰里<sup>35</sup>。縉紳士大夫是城市居民中享有特權的階級，對城市有著主導的作用，平民百姓群起效尤也就不足為奇了<sup>36</sup>。這樣的一個社會風尚，晚明文人以及庶民在社會風氣的驅使之下，消費觀念的改變也開始影響了其人生價值觀。的確，社會風氣的改變最直接影響的就是庶民的生活，也伴隨著人心的改變，開始追求利益、生活以享樂為優先，文人的出路也不僅限於科舉考試，只要有能力、經商賣藝，皆可為生。晚明是個「多元性」的社會，除了社會風氣外、文人的心態與思想、傳統的重農抑商、資本主義的萌芽……等，都顯現出了與前朝迥異的現象。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之下，對於「旅遊」的觀念隨著社會型態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看待，旅遊的觀點至此已展現出不同的風貌，社會評價也由負面轉而正面，在物質生活以不虞匱乏之際，開始追求的是另外一層次的精神寄託，因此旅遊成了晚明文人的享樂活動之一。將晚明文人置於社會型態的轉變脈絡

<sup>34</sup>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頁 63。

<sup>35</sup> 清·葉夢珠〈內裝〉，《閩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卷8，頁180。

<sup>36</sup>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輯，頁206。

中來檢視，可得知社會風氣的轉變如何影響文人的心態，以及從文人心態的轉變上來看「旅遊」在晚明社會中如何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貌。

## 第二節 文人觀念的轉變

綜合前節所言，晚明社會風氣的轉變，從原本儉樸的民風到消費社會的形成，加上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社會型態開始由傳統的農村轉型為商業化，帶來了商品經濟的繁榮，整個社會氣象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活在這時代的晚明文人，追求的已經不是傳統的科舉考試，百工興起使得科舉不再是唯一的選擇，賣字畫、出版業、經商……等，都可以讓生活無虞。晚明時代的多樣化，使得文人心態開始有了轉變，將文人心態的轉變置於此多元的社會中來檢視，晚明文人的心態究竟呈現出一個怎樣的風貌？是值得玩味的問題。

### 一、政治與科舉考試的束縛

晚明文人的心態，和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是密切相關的，明末政治的腐敗黑暗，統治階層內部不斷的激烈競爭，國事日非，加上外族內侵，邊患日深，內外交困，因此許多文人對當前社會感到失望，這個時代籠罩著一種無法解脫的紛圍<sup>37</sup>。晚明文人和魏晉人有相似的特質，一樣都是文人覺醒的時代，同樣承受來自政治的壓迫，在思想上的轉變皆是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魏晉清談的風氣以及晚明心學的興起，使得文人皆尊重人的個性和情感，強調自然人性，反對封建禮教的束縛。若說魏晉之情是從情到理的一個轉折，那麼晚明文人之情則是從情到欲的一個變化，但二者由於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魏晉之情是產生於封建社會的初期，主體是處於社會上層的貴族階級。晚明之情產生於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時期，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主體是市民

<sup>37</sup>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頁387。

階層。再加上哲學基礎的不同，魏晉是玄學，後者是心學，共同決定了魏晉和晚明這兩種情場的不同<sup>38</sup>。

隋唐科舉制度確立後，「學而優則仕」成爲士人實現自身價值的終極目標，文章是科舉入仕的手段，也是立功立名的輔助，不論是從物質利益還是在儒家思想的文化認同上，通過科舉功名入仕一直是士人追求的人生目標<sup>39</sup>。傳統士人被要求做到「立德」、「立功」、「立言」這三者終極目標，士人的作品總是「以詩言志，以文載道」，最終目的仍是輔佐朝廷。然而，到了明代中晚期時，雖然與魏晉人一樣，皆處於政治黑暗期，其心境已有所不同，追求功名的熱潮已非當時趨勢，加上當時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所存在的弊端，讓許多菁英文人無法入仕，明代八股取士對於文人的心態影響極大。晚明的風氣是個性的放縱，八股恰好是束縛個性與思想的一種文體。明人拿起八股文便裝出聖人道貌岸然的腔調，放下八股又露出放縱態肆的文人習氣，往往處於極端的矛盾。晚明文人對於八股心態是相當複雜的，他們既厭惡、輕蔑八股，八股文又是功名利祿的唯一路途，卻也不得不無奈的走上科舉之路<sup>40</sup>。政治的黑暗、政局動盪，更使許多文人與官場絕緣，即使有幸入仕，政治理想也難以實現，甚至被迫邊緣化，科舉考試也是艱辛的歷程與折磨，王世貞（1526-1590）記載說：「士人陳風岐屢試不第，發憤苦讀，竟積勞嘔血死，時甫二十八<sup>41</sup>。」王世貞敘述士人陳風岐爲了要考取功名，苦讀進而積勞致死的事情，時年才二十八歲。因而很多文人最終放棄了科舉之路，轉而尋求其他的發展，對於科舉考試也開始呈現出一種

<sup>38</sup> 李杰〈兩種文藝情場—魏晉之情與晚明之情〉，《北方論叢》第3期（2005年），頁24。

<sup>39</sup> 徐林《明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頁163。

<sup>40</sup> 吳承學 李光摩〈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文學遺產》第6期（1997年）頁73-74。

<sup>41</sup> 明·王世貞〈贈中憲大夫太僕少卿桐岡陳公暨配太公人林氏合葬墓誌銘〉，《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卷90，頁4233。

「游離心態」<sup>42</sup>。

## 二、文人與商賈之間的互動

自秦漢以來，歷代統治者爲了維護社會安定，且達到政治穩定的目的，對於經商活動都有所限制，商人自古以來即是四民之末，所謂「士農工商」，商人在百工之中位於末位，是屬於社會的最低階層，主要是中國自古以來即是重農抑商的社會型態。余英時先生曾說：明清儒者對「治生」、「人欲」、「私」都逐漸產生了不同的理解，他們對商人的態度因此也有所改變，而且在 16 世紀以後的商業發展也逼使儒家不得不重新評估商人的社會地位<sup>43</sup>。因此，傳統固有的社會體系，在 16 世紀之時已有了改變。

到了明代中後期開始，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傳統以來以農業爲主體的經濟已在生活結構上被打破，社會分工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人們對於商業的認識已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sup>44</sup>。商品經濟的繁榮帶來了社會的變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明代的社會分工進一步地擴大，商品經濟的日趨繁榮，晚明這一時代的商業發展已超越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朝代<sup>45</sup>。唐力行先生《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書中提及：

---

<sup>42</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及明代士風變化時說：「正（德）、嘉（靖）以上，淳樸未滿；隆（慶）、萬（曆）以後，運趨未造，風氣日偷，道學多侈談卓老（李贄），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陳繼儒），矯言幽尚。或清談誕放，學晉宋而不成；或綺語浮華，沿齊梁而加甚。著書既易，人竟操觚，小品日增，卮言疊煽。」這段話固然反映出《四庫》館臣對於晚明士風與文風因蔑而略有偏頗的態度，但卻明白的指出了晚明的社會風氣，正德、嘉靖之時呈現出淳樸的風氣，到了隆慶、萬曆時文人的心態有了重大的轉變，多談禪宗而務清談，小品日增，士風變化極大。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377。

<sup>43</sup>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455。

<sup>44</sup> 邱紹雄《中國商賈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30。

<sup>45</sup> 邱紹雄《中國商賈小說史》頁 71。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是社會經濟綜合發展到一定階段和一定歷史環境下發生的社會現象，16世紀後世界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刺激了商品生產的發展、江南市鎮的興起、充當貨幣的貴金屬白銀廣泛流通、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等等社會經濟新因素的綜合發展，使資本主義萌芽得以發生；而社會經濟新因素得以發展，無不體現了商人是「這個世界發生變革的起點」。<sup>46</sup>

由唐力行先生這段話看來，可以得知：當整個東西方社會進入16世紀，東西文化的交流、物質生活上的需求似乎已成為趨勢，因此整個社會進入商業化也是必然，商人的出現也是這社會發展下的產物。整個晚明資本主義的萌芽，相對的也帶來了一些價值觀上的轉變與衝擊。商業的發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社會上崇商的心理也逐漸出現，這種觀念的改變，是中晚明商品經濟發達之後，影響社會結構最為巨大的轉折。「棄儒就賈」的風氣因而出現，社會對於商人已有所不同看待<sup>47</sup>。

王陽明認為士可以為商，商可為士，儒賈合流的情況非常多，商人不再是末業，他提出了「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觀點：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

<sup>46</sup>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26。

<sup>47</sup>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03。

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sup>48</sup>。

王陽明認為「工商皆本」，士農工商之四民，是在同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只要求其盡心，無論是何種職業，皆可做到有益於生人之道。因此他提出了「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觀點，不再視商人為賤業。

商品的蓬勃發展吸引了士人，物質慾望開始流竄於各階層，卜正民說：「商業以超乎很多士紳所可能體會到的具體形式，湧入士紳文化習俗的圈子<sup>49</sup>。」歸有光認為：「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又說：「雖士大夫家，皆以商賈遊於四方<sup>50</sup>。」顯示出商人不再被認為是末業，士商相混的情況越益明顯。

陳大康先生在《明代商賈與世風》一書中說：

商賈與儒生之間關係的變化，也是考察明代商賈發展歷程時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這二者社會地位的一升一降，不僅顯示出商賈勢力的暴長，也表明了封建的傳統觀念正遭到了猛烈衝擊。明後葉棄儒經商浪潮的出現，是賈儒關係變化的結果之一，連迂腐的書生也捧起算盤去做生意，那麼商業意識對整個社會滲透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sup>51</sup>。

---

<sup>48</sup> 明·王守仁，〈外集七 節庵方公墓表〉，《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上冊，卷25，頁940。

<sup>49</sup>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1月）頁140。

<sup>50</sup> 歸有光〈白菴程翁八十壽序〉，《震川先生集》，（台北：源流文化公司印行，1983年），卷13，頁319。

<sup>51</sup> 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141。

由這段話明顯的可看出：人們不再將科舉考試視為人生的唯一出路，轉而走上經商之路，希望能過通過經商達到人生的理想，因此越來越多人棄儒從商，賺錢致富在這一時期已是主要的目標，既然經商能夠快速又便捷，自然再也不會有人想要再以科舉考試漫長的方式來改變生活條件了，再加上大環境需要商人，因此轉而經商的人當然不在少數。士商之間互相滲透，棄儒就賈。商業繁榮為士人提供了更多謀生途徑的選擇，士商的互動、商人地位的提高，也逐漸的改變著士人的傳統觀念。士人不再諱言利，只要取之有道，利是應該得到的<sup>52</sup>。李贄提出了他的看法：

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官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sup>53</sup>。

李贄認為商人經商風險頗大，且常受辱於官吏，責任重大，但其地位卻是四民之末，他提出了肯定商賈的觀點，以為經商不再是鄙陋之事。陳大康先生又說：

既然書生說出的聖賢大道已敵不過金銀的流通，他們長年累月的朝吟暮誦也比不上掏出銀子的爽利便捷，那麼讀書人社會地位的急遽下降便是不可避免的了。<sup>54</sup>

這樣的一個事實，顯示著整個晚明的社會價值觀已經走上了「實務性」，現實層面的問題才是人們所關心的，整個大環境就是如此，因此「棄儒就賈」再也不

<sup>52</sup>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頁162。

<sup>53</sup> 明·李贄〈焚書〉，《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第1冊，卷2，頁45。

<sup>54</sup> 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頁149。

是末端之事。這是城市商業化後所帶來的衝擊，也顯示著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社會中，傳統的封建制度已經漸漸走向衰敗、滅亡，呈現出來的則是另外一種新的面貌與氣象，足以見得，經濟的發展是可以左右社會的價值觀念與人心。汪道昆（1525-1593）在《太函集》中提到儒賈合流的現象：「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宏儒<sup>55</sup>。」儒賈合流的現象代表著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也大大提升了商人的地位，「四民異業而同道」在此時已是一個社會大眾的共識。

傳統士人一向鄙視商人，為何在明朝有了士商合流？除了歸咎社會風氣由淳樸變為奢靡，導致文人心態的轉變外，最重要的原因還有政治的問題，仕途的險惡，使得文人對為官不再抱以信心。明代的「納監」問題，而有俊秀弟子這個稱號的出現，而使得讀書人氣餒心寒<sup>56</sup>，在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記載：

景泰以後，胥監（國子監）始有納馬之列，既改為輸粟。初不過青衿援例耳，既而白身亦許加倍輸納，名曰「俊秀子弟」，於是辟雍遂被銅臭之目。且其所冀，不過一命為榮，無有留意帖括者。於是士子叱為異類，

<sup>55</sup> 明·汪道昆〈誥贈奉直太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閩氏合葬墓誌銘〉，《太函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5年）集部117，卷55，頁652。

<sup>56</sup> 「納監」問題衝擊了明代的科舉制度，也使得讀書人因為納監而對科舉制度不再抱以期望。原先讀書人之所以能傲視商賈是因為唯有他們才能通過科舉而步入仕途。除了考取進士外舉人亦可以選官，秀才雖還不能當官，但也有被選送國子監就讀的資格，出監以後也能當官。但是明朝從景泰年間開始，政府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竟然實行了名曰「納監」的政策，亦即只要向政府繳納一筆錢糧，就可以進國子監讀書，出監後就可以當官，這條政策實行之初還有個限制，即只有秀才才可以納監，但是秀才畢竟無多餘的錢財，最後這個限制也被取消了。新的政策就是：不管是什麼人，只要加倍繳納錢糧，即可錄取太學生，這些人還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俊秀弟子」，本來，即使是秀才要按照正常途徑進入國子監也非容易之事，但如今連一字不識之白丁，只要能掏出大把銀子，都可輕鬆入監，納監制度方便了富家子弟，卻打擊了讀書人的志氣。以上「納監」問題請參照：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146-148。

居家則官長凌忽之，與齊民不甚別矣。惟成化丙午，羅文肅（圭峰）累試有司不錄，遂以俊秀入貲，舉順天解元，次年登進士，為庶常，顯重於詞林，其年且逾不惑久矣。於是士人始有刮目此輩者<sup>57</sup>。

過去只有讀書人才能當官，如今「納監」問題已是和科舉並行的一種制度，現實層面使得文人自身的價值大為貶值，他們又何苦去走無把握且又辛苦的道路，既然可用「納監」此一方法當官，只要充實了自己的財富，何苦沒有官當呢？因而紛紛捨棄了傳統的為官之道，轉而經商之路。

文人與商賈之間的關係，原本是兩條平行線，但是在中晚明這個時期卻產生合流的現象，歸因於社會環境的變化，改變了原有的價值觀念外，除此之外，讀書人無法在科舉考試上取得優勢，商賈不必寒窗苦讀也能為官，諸多的不平等待遇減低了文人讀書的熱忱。綜上所論，最主要的還是中晚明這個時期已走上一條顛覆傳統之路，不論是在思想還是社會發展之上，都大大的影響了文人的心態。

除了士商的互動之外，另外一個得到發展的行業就是詩、文、書、畫的買賣，以及出版業的盛行，在明代中後期，士人以賣詩文為生已是很平常之事，祝允明（1460-1526）、唐寅（1470-1524）、徐渭（1521-1593）、屠隆（1543-1605）皆以此為生，為他人寫墓誌銘、壽序、文序、碑銘、傳記，以及為商人弟子授課、為書商寫書評等等，也是士人以文墨糊口來過生活的另外一種方式，士人書寫墓誌銘或壽序的顧客不僅侷限於商人階層，但是有經濟實力又愛賣弄風雅的商人確實是最好的買主，而且，商人願意與士人結交，有的慷慨解囊，贊助

---

<sup>57</sup> 明·沈德符〈納粟民生高第〉，《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卷15，頁405。

士人著作出版<sup>58</sup>。因此，歸有光即承認吳之士大夫都喜於與徽商往來，歸有光（1506-1571）、王世貞（1526-1590）、陳繼儒（1558-1639）、錢謙益（1582-1664）都曾替徽商、洞庭商寫過褒美之辭的墓誌銘。名人以商士為經濟後盾，可以依舊風雅、賦詩度曲；商人由名士捧場，奸貪說成義廉，俗物成雅士，一文一商，相得益彰，由此看來，商人與文士之間的關係，可謂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利益之上<sup>59</sup>。

### 三、小品文筆下的文人心態

中晚明時期，小品文的大量出現，很多文章已經脫離了之前「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使命感，轉而透過放浪山水之間，品評生活來寫文章，這即是晚明小品文的產生，文章內容多半寫生活隨筆之事，如謝肇淛（1567-1624）寫出了文人閒適的生活理想：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疏松修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談笑，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淒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淅瀝作聲，亦殊有致<sup>60</sup>。……

謝肇淛認為文人的閒適之情是從日常生活中體會而得，住在臨水負山之處，不談日常衣食住行之瑣事，與良友品茗談天，隨心所欲，或是在淒風苦雨之夜，

<sup>58</sup> 徐林《明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頁123。

<sup>59</sup>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頁282-283。

<sup>60</sup> 明·謝肇淛〈事部一〉，《五雜俎》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5年）卷13，頁4203。

擁寒燈夜讀，聽著窗外芭蕉錯落有致的淅瀝聲，體現出晚明文人愜意生活的一面。或是李日華（1565-1635）在《六研齋筆記三筆》說：

潔一室，橫榻陳幾其中，爐香茗甌，蕭然不雜他物。但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我身。清靈之氣集，則世界惡濁之氣，亦從此中漸漸消去。<sup>61</sup>

李日華認為閒適的生活是可以獨自冥想萬物，清靈之氣集於一身，則惡濁之氣皆可退去，與自然幻化為一體。謝肇淛與李日華這兩段話充分道出了他們所追求的一種恬淡、自然的生活情趣，這些小品文反映出了當時文人的心態，晚明士人們普遍表現出對自我個性與情感價值的重新體認，晚明文人的人生觀價值在於追求物質和精神的享樂。傳統知識分子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功業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已不吸引人，許多人把滿足個人的生活慾望和精神需求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人們所追求和欣賞的是如何及時行樂，傳統那種安貧樂道的清苦生活方式並不為人們所欣賞<sup>62</sup>。

袁宏道（1568-1610）說：人生有五種「真樂」，理想的生活要「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sup>63</sup>。」對於人生中聲色的慾望追求，袁宏道是抱以肯定的態度。張岱（1597-1679）也說他少年時的愛好事物：

---

<sup>61</sup> 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三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5年），卷4，頁681。

<sup>62</sup>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頁383—384。

<sup>63</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龔惟長先生》，《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頁205。

少為紈袴子弟，極好繁華，好雅舍，好美婢，好嬾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sup>64</sup>

張岱所說的好事，皆是以耳目聲色之慾，好繁華、雅舍、美食……肯定人情欲望之追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觀。這樣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與傳統的知識分子立言修身的理想追求已大去甚遠，除了心學的直接影響之外，社會的奢靡風氣日盛，從朝廷至民間，無不如此，「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禮教已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追求「性靈」時代的來臨，小品文寫的是文人的愜意生活，享樂的人生態度，無不情真、雅興。「閒適」、「情真」是晚明人所重視的，晚明小品主要表現出文人閒適的生活理想，尋求精神上的享受，從而可知晚明文人心態上的變化，其精神受到當時思想風氣的影響，他們的文化品格多少都有心學的影子。王陽明心學崛起於明中葉，盛行於晚明，對於文人的心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晚明社會人欲橫流的風氣，與程朱理學的衰落有直接關係<sup>65</sup>。

由本節的討論可知：由於科舉考試的制度、社會風氣的改變、從淳樸到奢華，這一連串的改變，在這個變動的社會中，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生活，社會風尚從簡到奢，在物質生活不虞匱乏的晚明社會中，文人開始追求另一層次的精神寄託，及時行樂成了此時期最重要的人生觀，因此，旅遊在此時成了休閒活動的主流，文人對於旅遊開始有了不同的看待，也留下了不少的遊記，更是發展出了不同形式的旅遊方式。

<sup>64</sup> 明·張岱〈自為墓誌銘〉，《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1985年），卷5，頁199。

<sup>65</sup>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頁381。

### 第三節 晚明旅遊風氣興盛的社會因素

在遊歷的過程中，旅遊者因身軀和心靈的位移，離開現實生活中既定的、習慣的、熟悉的情境，以其心理意識與語言結構去觀照另一空間中變易的、陌生的、新鮮的情境，體現實用性或審美性的功能<sup>66</sup>。晚明文人的旅遊，也多半帶著「領會山水」的心態，除了落實「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傳統精神，晚明文人在諸多有利的社會條件之下，走出書齋而實際體會山水之美。譚元春（1586-1637）曾自述說：「有志布襪青鞋，將讀萬卷書，將行萬里路，從他日之所好<sup>67</sup>。」顯示著在社會風氣的改變之下，文人旅遊觀念的轉變也是促成旅遊風氣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明代中後期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之下，呈現出了一個衣食無缺的繁榮景象。在這不虞匱乏的消費社會裡，滿足人們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更進而的是去追求精神上的寄託。享樂式的風氣瀰漫了整個社會，追求的是感官與生活上的滿足。因此，旅遊成了當時文人重要的休閒活動，旅遊興起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士大夫有感政治黑暗，無意仕途而尋求旅遊以慰藉心靈，或是因科舉考試競爭激烈而將興趣轉移到旅遊之上，晚明旅遊風氣的興起主要還是在於社會經濟、交通資訊以及思想上的觀念轉折<sup>68</sup>，以下就這幾點原因討論之。

<sup>66</sup>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興大中文學報》，36期（2006年3月），頁4。

<sup>67</sup> 明·譚元春著 陳杏珍標校〈奏記蔡清憲公前後箋札〉，《譚元春集·鵲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27，頁755。

<sup>68</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熊月之與熊秉真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5月），頁226。

## 一、水陸交通發達

晚明出版了許多商業路程書，此類書籍對水陸路程的記載十分詳細，為商旅活動提供了方便性，反映交通事業的快速發展，也說明了地理科學的發達，人們已從長期的旅遊活動中形成了書面資料。宋應星（1587-1666）在《天工開物》中提到說：「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官商，衡遊薊北。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sup>69</sup>。」這段話表明出了晚明交通的發達情況，只有交通的發達運輸，才有可能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良好的條件。水陸交通情況的發達也記載在一些商用類書中，如黃汴所編纂的《一統路程圖記》，列出全國交通路線一百五十三條，以兩京為中心向四周延伸。陶承慶於萬曆間編纂的《華夷風物商程一覽》亦以兩京為中心，列出全國路線一百四十四條，該書顧名思義不僅列舉水陸路程，還配以物產、民情、風俗，分上下二欄刊刻，刻於萬曆三十五年的《士民捷用分類學府全編·類聚三台萬用正宗》的〈天下水陸路程〉計二十八條，細列兩京至各地水陸路程，也詳記各布政司至所屬府縣水陸路線。

這些商書所列全國水陸路程上百條，貫穿大江南北，四通八達，是人們在長期經驗累積中摸索出來最佳、最便捷、最安全的路線<sup>70</sup>。交通的普遍性加上商書的出版，提供旅遊活動一個良好的條件，文人可借助這類的書籍來獲得旅遊的資訊，也增進了旅遊時的便利性，進而促成旅遊風氣興起重要的條件之一。

## 二、旅遊資訊的傳播

當旅遊一事不再只是為官者的專利，而形成人人可遊的潮流之時，旅遊大眾化現象瀰漫著整個社會，遊記文體的大量出現對於士人的生活影響極大，他

<sup>69</sup> 明·宋應星 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頁43。

<sup>70</sup> 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121-122。

們可以因為看了某篇遊記的描述之後，決定起身去尋訪山川美景，萬曆以後遊記的數量增多，文集中除了遊記之外，還有許多旅遊詩，甚至記遊山水圖的風景描繪也促使了士人躍躍欲試的心態。如王思任（1575-1646）就曾因為讀了張肅之〈台遊草〉後，毅然決然要起身尋幽訪勝，他說：

台蕩之勝，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頃子侄輩向累稍謝，偶讀駕部張肅之〈台遊草〉，遂投袂而起，屐及於室皇，裝及於寢門之外，舟及於五雲之滸，敕一書記、一童子、一庖、一管辦，二粗力人行矣。會鄰友鈕睿孺來船，一言即解冠橫臥，予壯其無隔宿之謀、牽衣之態也，共行之<sup>71</sup>。

王思任原先對天台、雁蕩名勝之地本來就極有興趣，常於夜夢中想念。而真正前往的原因是讀了張肅之所寫〈台遊草〉，決定起行，如此一來，〈台遊草〉就不僅僅是一本遊記而已，它還可以說是一種旅遊導覽手冊，刺激了人們想去旅遊的神經<sup>72</sup>。而當時所流行的山水畫冊，也同樣有著旅遊導覽的功能。何良俊即認為名山遊記只是文字，不若圖文並茂的山水畫來的精采：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摹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像，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嫌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煙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sup>73</sup>。

<sup>71</sup> 明·王思任〈紀遊〉，《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45。

<sup>72</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頁229。

<sup>73</sup> 何良俊〈畫一〉，《四友齋叢說》，卷 28，頁 257。

何良俊認為山水遊記即使文筆高妙精闢，善於描摹景色，若想從字裡行間看到山水美景的真面目，卻是不可而得，因此他認為從圖畫的描繪當中，山水之深幽、煙雲吞吐，皆可一目了然，神遊其中，這樣的體會是從文字遊記中所不能得的。何良俊接著又說：

正恐筋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臥遊之意也<sup>74</sup>。

因為自身的體力疲態，不能遍覽名山各地，但若懸掛山水畫於廳堂中，即可神遊其間，也就是「臥遊」，亦是文人的樂趣之一。故這些山水詩畫也算是旅遊的導覽手冊，提供了人們在遊覽景點時的一種視覺印象，頗似現代風景畫冊或明信片，讓士大夫在旅遊時會注意某些景觀<sup>75</sup>。此外，像是黃汴在《一統路程圖記》中詳細記載了雁蕩山的路程與沿途的景觀，猶如一本專業的旅遊書：

雁蕩山，今樂清縣東九十里。山高四十里，巔有湖，惟雁宿焉，人莫能至，因名。雁蕩峰巒峭拔，千態萬狀，泉有大、小龍湫，自巔而傾，隨風變態，雖旱不息，天下峰巒未有奇於此者，天台尤奇。石梁橋，新昌縣去七十里<sup>76</sup>。

文中分析了雁蕩山的地勢，在樂清縣東九十里，山高四十里，雁蕩山勢挺拔而千姿萬態，還對雁蕩山做了評價：「天下峰巒未有奇於此者」。由此可見，這類

<sup>74</sup> 何良俊〈畫一〉，《四友齋叢說》，卷 28，頁 255。

<sup>75</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頁 229。

<sup>76</sup> 黃汴著 楊正泰校注，《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1 月），附錄二《一統路程圖記》卷七〈江南水路〉，〈浙江至天台山、雁蕩山水、陸路〉，頁 279。

的路程書不僅是客商所必備的地圖，對於士大夫旅遊者來說，可能因此看了這段話後而決定尋訪，在實用層面來說更是很方便的旅遊導覽手冊。

## 第四節 旅遊觀念的演化

上一節談論到因為晚明社會風氣的急遽變化進而促成了旅遊風氣的漸起，交通的便利以及旅遊資訊的傳播，再加以社會風氣由儉而奢的轉變，如此諸多的原因也影響了世人對於旅遊觀點的改變，故本節將詳談「旅遊」這一觀念的轉變，從魏晉南北朝山水意識的覺醒，到唐代柳宗元山水遊記的成熟，進而到明代所興起的旅遊熱潮，旅遊意識不斷地改變，原本旅遊是失意藉以澆愁的慰藉，但卻在明代中後期成了一種休閒活動，這一脈絡的觀念轉折，將是本節所討論的重點。

### 一、旅遊的界定

若是根據字源來考察的話，許慎在《說文解字》說遊的本義是「旌旗之流也」，而段玉裁注：「旗之遊如水之流，故得稱流也。」旌旗隨風飄動，如水流無拘無束，後來則引申為出遊之遊。在先秦時，游常指水中活動，如《詩經·邶風·谷風》說：「泳之游之」。《爾雅·釋詁》篇說：「游，戲也。」表示游是有戲樂的重要意義。

宋代的朱熹在注釋《周易》時寫到：「旅者，客居之名，羈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居它方，謂之旅。」從朱熹所下的定義中我們可以得知，其實在遙遠的那個時代，人們就已經知道旅行是指人們離開自己的定居地，到異地他鄉遊覽觀光，並能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滿足的活動，到了南北朝時，梁朝詩人沈約在題為〈悲哉行〉的詩中寫道：「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這是中國

最早出現「旅遊」一詞。在「旅行」和「旅遊」二詞的定義之上是有所區別的，旅行的重點在於「行」，遊覽並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旅遊的重點是在「遊」，遊覽觀光風景是其主要的目的<sup>77</sup>。

## 二、晚明之前的旅遊型態

遠古時期，人們眼中的世界不過是飄渺的「四方之海」和「五方之山」，到了戰國時期人們的視野開始擴大，鄒衍提出了大九洲的構想，認為全世界有九大洲，每一大洲有九個小洲，九大洲外有大瀛海環繞著，被稱作「赤縣神州」的中國僅是九小洲其中一個。這種大世界觀的產生，使得世界地理觀已有所不同。春秋戰國時期，對旅行的分類已經很清楚，旅指的是商旅；征指的是軍旅；歸指婚旅；巡是天子之旅；遷指遷徙之旅；又將遊獵、遊學、遊覽等活動總稱為「遊」，這是對於「旅遊」做分類的一個發展之始<sup>78</sup>。因此，我們從這段話可以得知，「遊」可以廣泛定義為：從固定的居所之地，遷徙至另一地，無論目的為何，移居的動作構成了早先人們對「遊」的認知。

先秦以來，文人遠行的情況不在少數，如孔子曾周遊列國，孟子也曾到過齊、魯、宋、鄒等國，不過，孔子與孟子這種性質的四處奔走，其目的不是為了觀光，而是為了向各國君主宣揚其政治理念，這樣的遊歷是有其目的性的。在秦漢兩代的旅遊活動也算不上真正有意識進行旅行玩樂，多半仍不以遊玩為主，最為突出的是帝王巡遊、使者遠行或是學者周遊考察。這樣的遊歷雖冠上旅遊之名，但實質上是為了目的而行，並非是遊覽沿途的風光。

---

<sup>77</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頁2。

<sup>78</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頁13-14。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人性覺醒的時代，山水意識也在政治的逼迫之下間接而生，將山水的審美意識帶進了另一個新的世紀。魏晉是遊記文學正式誕生的一個朝代，遊記文學所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以人的自由存在與審美解放為基礎，以自由優美的文學形式為表現方式。從發生論的角度來看，遊記文學的誕生有賴於人與自然的解放和雙方審美關係的建立，有賴於人文覺醒的時代精神對山水審美意識的孕育。

由於山水審美觀意識的覺醒，開始從事旅遊活動的文人也隨著變多，從參與的主題來看，魏晉時期的旅遊可分為三類：即文人之遊、佛徒之遊、道士之遊。許多襟懷高曠的文人多有山水之癖，如：謝靈運與謝靈運並稱為二大山水詩人，合稱大小謝，以及謝安、孫綽、鮑照、吳均……等人，這些文人多半是為了逃避政治現實環境的困厄，而寄託縱情於山水之間，「身在山林，心存魏闕」是此時期文人的心情寫照，雖然冀望著山水美景能夠弭平心中苦處，但是卻無法真正對當前的環境釋懷。以己為主，山水為客，縱然寄身於當前美景之中，無法忘懷的依舊是心中的抑鬱。佛徒之遊則是因地制宜的關係，佛門弟子本愛深山幽谷、廣漠長川是真正適合修煉心性的地方。如支道林、釋道安、竺法朗、釋慧遠……等，多是酷遊山水的僧人。文人與僧人的交往也蔚然成風，如支道林與謝安、慧遠與謝靈運，一來一往的交遊也間接促成了山水詩的興起。道徒之遊如葛洪、陶宏景、陸修靜，道徒希望在奇山幽川中找到靈丹妙藥，更希望遊山遇仙，故多選擇在雲霧繚繞、幽深的山林遊覽隱居。將自然作為超脫塵俗的人生歸宿<sup>79</sup>。

酈道元《水經注》的出現有時代性的意義，就其創作主旨和科學精神而言，

<sup>79</sup> 梅新林 俞樟樺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4年12月）頁35-36。

它是一部地理著作；就創作歷程與情感表現而言，是一部地志遊記、若從創作手法和藝術成就來看，則是一部文學遊記。我們可以說：《水經注》的出現完成了兩個意義深遠的重大轉變，第一個即由地志著作向地志遊記的轉化，第二個是由地志遊記向文學遊記的轉化<sup>80</sup>。由於酈道元不滿於先秦地理著作，甚至於對魏晉南北朝以前的地理著作都表示了他的批評意見。他在《水經注·序》中指出：

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sup>81</sup>。

由這段酈道元所作的自序中可知：酈道元對於整個地理觀的轉變很大，縱使前朝已有地理專書的出現，但多半是虛構之作，酈道元對這些地理專書做了一番的評價。酈道元選擇《水經》一書來為其作注，補足了《水經》諸多的不足，因此《水經注》的誕生，所代表的乃是中國的地理學又往前邁進了一步，從想像的虛構空間跳脫出來，而進入了「以水證地」的一個寫實地理學的新時代。酈道元在《水經注序》中更提出了他的研究和著述方法：「脈其支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sup>82</sup>。」由這段話可看出酈道元無疑是中國地理學上第一位寫實地理學家。作為遊記文學的一個先驅，《水經注》對於後世遊記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水經注》的寫作方式突破了之前只用詩賦來描寫山

<sup>80</sup> 梅新林 俞樟樺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頁 59。

<sup>81</sup> 北魏·酈道元撰 陳橋驛點校〈水經注序〉，《水經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頁 13。案：此版本乃是陳橋驛先生根據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本進行編校，書中提到：「此本子係上海涵芬樓從武英殿原本影印而來，因此，在所有不同版本的殿本中，無疑是最好的本子。」

<sup>82</sup> 北魏·酈道元撰 陳橋驛點校，〈水經注序〉，《水經注》，頁 13。

水的形式，用類近於遊蹤的書寫方式來描摹山水、民情風俗、史地辯證，巨細靡遺的記載每條河道的流向，已具備了文學遊記的寫作特色。

南北朝時期的人性頓悟，加上社會變動甚大，政治、遊仙、隱逸、審美等原因促成了文人廣泛的旅遊活動<sup>83</sup>，這一個覺醒時代帶來了新的山水審美意識，不論是因為在政治的逼迫之下而走向山林，抑或是自我意識的寄身林中，在這一個新審美觀的觸發之下，由單純的遊賞山水而走向摹寫山水，由遊而記的一個過程更是確立了遊記文學的產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旅遊是一啓發點，也奠定了後來的記行、抒情、寫景、述志遊記文學形式。

經過南北朝時期的分裂動亂，隋唐時代終於又實現了國家的統一，隋代國祚極短，其文學發展也有限，能流傳下來的更少。因此，中國遊記始於魏晉南北朝之時，而在唐朝終於走向成熟之路，這有賴於唐朝古文運動的成功，擺脫了六朝之駢麗的文體，開創了一個可以獨立寫景、抒情、言志的散文系統，使得遊記文學走向一個更活潑的形式<sup>84</sup>。唐初遊記，基本上是承續魏晉餘緒，形式上並無太大的改變，所以從初唐到盛唐，遊記文學總體來說創作成就並不高，真正走向成熟階段是在中唐時期古文運動拉開序幕之時。文人旅遊是唐代極盛一時的社會風尚，究其原因，不外是經濟繁榮、交通便利、社會安定，也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遊記之作，社會因素為旅遊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唐代國勢氣

<sup>83</sup> 賈鴻雁《中國遊記文獻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7 月），頁 47。

<sup>84</sup> 遊記文學是伴隨著整個文學的發展而發展的，如魏晉遊記文學由文學的自覺走向文體的獨立，唐代的遊記文學則是由文學改革的推動而達於語體的成熟。魏晉時期，許多文人遊客都有了自覺的遊記創作意識，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對於作者來說，不管是哪一種文體，只要運用得當，都可以寫出佳作。然而，劉宋以來與文筆之辯、聲律之論相呼應，散文駢偶化的傾向越演越烈，因此抒情寫景的文章最後也是駢偶化，就限制了遊記文學在敘行寫景、表達情意上的自由度，因此，遊記文學必須在文體獨立的基礎上進而走向語體的成熟，需要一種以古代文體分類中的「記」為主體，靈活表達遊記內容，形式自由的優美語體，而古文運動正好為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梅新林 俞樟樺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頁 67-69。

象恢宏強大，疆域遼闊，給了旅遊者一個廣闊的空間，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之渙、皮日休、高適、岑參……等，都曾經遊歷過。

以李白來說，綜觀李白的一生，幾乎是四方漫遊的一生，李白以旅遊為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重要手段，是旅遊給了他豐富的閱歷與見識，可見得李白對於旅遊的執著。到了中唐，柳宗元所寫下的《永州八記》則是代表著遊記文學正式走向成熟化。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時，長居永州數十年，在永州開始了頻繁的旅遊活動，《永州八記》是柳宗元的心情寫照，利用情景交融的筆法，往往在描寫山水木石、鳥獸蟲魚的同時，也將自己的橫遭貶謫、飽受壓抑的境況反應出來。柳宗元在寫景時不免將自己抑鬱失意的心情投射在淒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中，情與景合一<sup>85</sup>。即使身在自然境界之中，仍未能釋懷，文中寫石潭的幽淒，但也是寫心境的幽憤，字裡行間無一字一句寫心情，但卻可以處處感受到其憂悶之心情，借景喻情將他的心情表露在情景之中。柳宗元的山水遊記雖是以山水為甫，己身為主，但是對於遊記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是有著劃時代的開創意義。

宋代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個關鍵階段，經濟的繁榮與市民的興起，旅遊業的迅速發展，商品經濟也較前朝活躍，文人旅遊是宋代旅遊的主體，數量眾多，也表現出適意漫遊、家國傷痛、景物致理這幾種類型。

元代旅遊活動的類型較為特殊，由於元朝是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這樣的一個條件奠定了大好的地域條件。元代經由海路或是陸路與世界各國交往很頻繁，並出現了許多國際旅行者，但由於元朝統治者的高壓政策、封閉的視野，使得這一時期的國內旅遊活動受到壓抑，不似前朝如此活躍。

---

<sup>85</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頁116。

明初國內的旅遊活動仍不頻繁，但對於海外的聯繫，明王朝連連派遣使者出使，鄭和下西洋就是個極佳的例子，也形成了出使旅遊的一個高峰<sup>86</sup>。明中葉後，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社會風氣帶動了旅遊潮的熱絡，這時期的出遊，在文人的心境上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別在於：他們不再是爲了「目的性」而出遊，大部分是以個人爲考量，隨性走走看看、或是純粹以客觀的心情去遊山玩水，所要滿足的是個人心理上的欲望，去國懷鄉而遊、借景傷情之遊、身世漂泊之嘆、出使遠方之遊，在此已不復存在，享樂式的遊玩，在中晚明時期已成爲時下的重要休閒活動。

### 三、明代遊觀的改變

文人學士遊樂於山水之間是明代一種突出的社會風尚，以文人的旅遊觀念而言，在明初與明末有很大不同的看法，明初仍是傳統務農的社會，對於山水旅遊之事自然不會重視。到了明代後期因爲政治因素，使士大夫漸漸疏於政壇，樂於從山水中尋找慰藉<sup>87</sup>，再加上商業的繁榮改變了原有的生活型態，於是娛樂性質的活動也越趨重要，因此旅遊在晚明達到一個高峰。因此，

#### （一）旅遊是末務之事

旅遊在明代初、中期時還不被當成是正經之事，一方面是因爲明初的社會仍處於農業社會階段，人民生活仍以溫飽爲首要之事，對於遊山玩水享樂奢侈之事自然不會注重，金幼孜（1367-1431）談到交遊天下時，仍秉持著：「古之君子，所以取友於天下，非徒事遊覽登臨之樂，蓋將以充其志而成其學也<sup>88</sup>。」金幼

<sup>86</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頁 185-212。

<sup>87</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頁 217。

<sup>88</sup> 明·金幼孜〈贈郭鼎貞南歸詩序〉《金文靖公集》，收入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台北：

孜認為君子交遊於天下是爲了要擴充自身的學問與知識，並不是爲了遊覽之事而遊。甚至到了明代中期時，旅遊仍不普遍，視爲不正經事，湛若水即是看不起旅遊活動的文人，他認爲：遊有三等，即形遊、神遊與天遊，他以旅遊山水的形遊爲下等，而以神遊爲上等，以道學的天遊爲上上<sup>89</sup>。湛若水（1466-1560）嘗言：

「遊有不同乎？」曰：「有形遊、有神遊、有天遊」曰：「何謂形遊？」曰：「形遊者，步趨之間，如子之之楚，若干程過清遠，若干程過連州，取捷徑若干程至茶陵訪羅子鍾，乃同子鍾一泉，若干程謁衡山守蔡白石，謁兵憲潘石泉；若干程抵衡山，又若干程入衡嶽精舍，登祝融峰以息焉。此之謂形遊也。」曰：「何謂神遊？」曰：「神遊者，心思之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子之思一泉，即是到茶陵仰企石泉；白石即是到衡州；懷精舍上封即是登祝融，此之謂神遊也。」曰：「請聞天遊之蘊？」曰：「天遊者，與道同流天地萬物同體，勿忘勿助之間，無在無不在之妙，不疾不徐，渾與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化故不滯，神故不測，無入而不自得。昊天曰明，反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此之謂天遊也<sup>90</sup>。」

湛若水以爲形遊只是出去玩樂而已，並不能提升自我內心的涵養與價值，而認爲天遊才是所謂的上上者，可以與天地萬物同體；而神遊則是倏忽之間可到達目的地而不需舟車勞頓、規劃行程。在湛若水看來，神遊與天遊都比形遊來的高尚許多。湛若水的天遊與神遊不需真正到名勝地去觀賞，即能心領神會得到

---

文海出版社，1960年），卷7，頁579。

<sup>89</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爲討論中心〉，頁17。

<sup>90</sup> 明·湛若水〈送謝子振遊南岳序〉，《湛甘泉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56，卷17，頁83a-b。

滿足，但是湛若水所謂的神遊與天遊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旅遊，充其量只是偏向於「臥遊」而已，若僅能藉著神遊而達到旅遊的目的，那麼實際出去遊玩的旅遊活動也就無意義可言了。而李豫亨（？）似乎也抱持著同樣的看法，在〈還遊覽之真〉中說：

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奇之士所願遨遊，故有志遊五嶽、心希三島者，每見不酬志而死，此皆妄心之所馳逐也。君子安常處順，不行險，不履逆，作德日修，只是福地，居易俟命，只是洞天，如彭澤所謂「悠然有真趣，欲辯已忘言」。如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現前悉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藤喘息而從之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不妨登臨，又不可當面錯過<sup>91</sup>。

李豫亨提出了神遊的看法，他認為如陶淵明和蘇東坡一般，冥然兀坐，沉思其中，眼前即有妙境出現，何必要爲了遊玩而東奔西走，攀爬喘息，認為神遊是最理想的狀態。李豫亨與湛若水皆認為只要「心遊」、「神遊」即可達到旅遊的目的，這或許是由於二人所處的時代仍是明代中期，社會仍處於半封建階段，商業也未開始繁榮，在奢靡風氣未開始之前旅遊活動並不普遍，這點是可以被理解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旅遊活動的興盛是因爲社會風氣的變遷之下所帶來的產物，明代中期的人民的生活條件未達到寬裕無虞的地步，旅遊當然不被重視，甚至被視爲是「玩物喪志」之舉，自古以來只有失志貶謫的文人才有機會因遷徙而寫下抒發己志的山水遊記，自發性而享樂式的遊玩在明代中期前是不被認同的，因此湛若水與李豫亨的觀點是具有時代上的意義，這意味著明代旅遊觀念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李豫亨更以古代文士所言來印證自己的說法，

<sup>91</sup> 明·李豫亨〈還遊覽之真〉，《推篷寤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85 卷 6，頁 33a。

以心養身勝過於身體力行之遊，

孰若列子所稱壺丘子之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壺丘子之遊，其真善遊者與<sup>92</sup>。

李豫亨認為生活中自有情趣所在，是否真正出遊就不是那麼重要。出外遊玩不如自我觀心，外遊需要藉助外物而成，神遊只要心到何處，遊則所至。蔡汝楠（1516-1565）則是直言旅遊是「末務之事」：

蓋遊觀雖末務，而中有所會，皆成自得。顧近者忽而不遊，遠者阻而不及，即遊矣而徒見山水之漠然，竟止目境已矣<sup>93</sup>。

遊觀雖是末務之事，但若於心中有所悟得，則處處是真趣；如果無法心領神會，即使到了真正的山水名勝之地，實地遊覽也是枉然，無法獲得山水領會之情。

從湛若水、李豫亨、蔡汝楠對旅遊的觀念而言，他們注重的是在旅遊時能否心領神會獲得真趣，至於是不是親身遊歷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了，這種思想在當時有一定的代表性，認為一般旅遊仍非高尚之舉。

## （二）旅遊是名高之事

晚明士人的旅遊則屬於「享樂式遊玩」此類，他們很重視旅遊時的品質，

<sup>92</sup> 明·李豫亨〈還遊覽之真〉，《推篷寤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85，卷 6，頁 33b-34a。

<sup>93</sup> 明·蔡汝楠〈遊張三公權二洞記〉，《自知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97，卷 21，頁 19b。

對於景點的選擇、旅遊時的交通工具、器具、住宿，甚至於遊伴的選擇，都有精確的要求。因此晚明士人的享樂式遊玩可以說已經導向了一種商業趨向，而不再是以前那種滿懷愁緒的精神寄託式遊玩，晚明士人的遊玩既無離鄉背景之傷懷，也無寄託任何的情緒於山水之中，純粹只是去欣賞美景罷了。

看不起旅遊之事的觀念在明代中期後已開始轉變，李濂(1488-1566)在〈答王參政論遊覽山水書〉曾反駁此種說法：

謂古人遊蹤傳諸後世者，多羈旅寄寓之士，而仕宦者恆無聞焉。……吾竊以為不然。古人杖履所臨，其跡不泯者，亦惟以其人之可重言之，可傳云爾，而顯融之與漂泊固在所弗論也<sup>94</sup>。

李濂的反駁論點是具有時代上的意義，這意味著傳統的旅遊觀念已經開始轉變，自古以來，多以為有名的遊者多是流浪失意的文人，認為只有失意的文人才寫出傳諸後世的遊記。李濂認為並非只有政治上不得志的士人，其遊蹤才能流傳後世，古人的遊跡足以傳諸後世者，是因為「其人之可重言之，可傳云爾」，是其本身有值得推崇的部份，並非在於得志或是失意的差別。李濂的遊觀提升了旅遊活動的層次。

明代中期之後，世人對於旅遊的觀念已有所不同的看法，開始認為藉助旅遊可以陶冶性情、尋求書本以外的另一種人生樂趣。這樣觀念的轉變，有助長於旅遊風氣的興盛，因此人們不再將旅遊之事視為「玩物喪志」，反而坦言好遊，對於遊山玩水則是更趨之若鶩，各地的名勝景區也開始出現了人潮，張瀚在《松

<sup>94</sup> 明·李濂〈答王參政論遊覽山水書〉，《嵩渚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71，卷90，頁11b。

窗夢語》中論及遊覽西湖，遊人如織的情形：

然西湖夏月，荷葉亭亭水上，如翠蓋紅妝，豔麗無比，香芬襲人。即盛夏之候，泛舟湖畔，停泊垂陰，清風徐來，頓忘炎燠。余嘗經齊、秦之境，亦多芙蕖，安得畫舫搖曳，遊人欣賞也<sup>95</sup>。

西湖本是遊覽名勝之地，張瀚寫出了西湖遊人如織的景象，清風徐來，香氣襲人，呈現出市民之樂的情景。由於風氣的變遷，許多人在文章中毫不隱諱自己的好遊，如無錫人鄒迪光（1550-1626）在〈游吳門諸山記〉說：

余故孱弱，少所濟勝，不能遊而獨好遊。……所過佳山水，未嘗不游。蓋尚平之於五嶽，其天性然<sup>96</sup>。

鄒迪光認為自己好遊是天性使然，體弱多病使得他無法出遊，卻偏偏天性好遊，遇到山水美景，皆嚮往遊之。旅遊活動發展到後來已變成一種全民運動，此時再也不將形遊當作是下等之事了，鄒迪光提高了湛若水所謂不上檯面的「形遊」地位，從天遊、人遊、俗遊三方面來肯定了旅遊的價值<sup>97</sup>。謝肇淛在〈近遊草自序〉曾說到當時世人如何來看待旅遊：

夫世之遊者為名高也，故嘗遠耽而近遺，其所譚矢注慕，在五嶽八極、汗漫象罔之外，而跬步之丘壑，往往不能舉其筴。余少也賤，束發之四

<sup>95</sup> 張瀚〈時序紀〉，《松窗夢語》卷7，頁121。

<sup>96</sup> 明·鄒迪光〈游吳門諸山記〉，《鬱儀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58，卷36，頁9a-10a。

<sup>97</sup>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頁76。

方，所至名山大川，流賞幾遍。東至海岱，西浮洞庭，北登碣石之宮，南攬白門之寺。弔禾黍以傷悲，耽煙霞而忘返，二十年於此矣<sup>98</sup>。

謝肇淛已將旅遊看為是一件名高之事，但是他因為「遠耽而近遺」、「世人貴耳而賤目，故於山川遊歷，率遠慕千里之外，而近乃遺之目睫<sup>99</sup>。」往往在選擇景點上捨近而求遠，雖遊歷過名山大川，但對於家鄉附近的風景卻無心瀏覽。或者更有甚者是將旅遊抬到至高無上的境界，如袁宏道所言：

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遊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sup>100</sup>

由此可知，袁宏道認為天下敗興之事有三者，除了國破家亡是首要敗興之事外，遊不得其時也同樣列為「敗興之事」，可見得袁宏道將旅遊視為重要的雅興之事。黃汝亨甚至認為：「人生不五嶽遊，而五鼎食何為<sup>101</sup>。」若不從事旅遊，則人生於世所謂何事？旅遊的地位已和生活仕宦並列為大事，這反映出了不僅僅是士人對於旅遊的觀念改變了，同時也是社會風氣變遷下的影響。

王思任（1575—1646）的《遊喚》從書名即可知道他用「喚」字來顯現旅遊的重要，有「喚醒」的意味，陳繼儒曾為之作序，對《遊喚》予以高度評價<sup>102</sup>。王思任對於旅遊有自己一套的見地與欣賞，他在《遊喚》中曾感嘆說：

<sup>98</sup> 明·謝肇淛〈近遊草自序〉，《小草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75，卷 5，頁 21a。

<sup>99</sup> 明·謝肇淛〈遊金雞山棲雲菴記〉，《小草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75，卷 9，頁 23a。

<sup>100</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吳敦之〉，《袁宏道集箋校》，卷 11，頁 506。

<sup>101</sup> 明·黃汝亨《天目遊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251，頁 17b。

<sup>102</sup> 梅新林 俞樟樺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頁 249。

至於鳥性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澤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語者，今之為告語亦不過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嗟乎，遊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語人也<sup>103</sup>。

他認為鳥性因山林嵐山興而快樂自在，人心因湖光澤影而空靈透徹，這是一種物我共處，互相默契的境界，很難用言語來表達<sup>104</sup>，由此可見得王思任對於大自然的一切與本身自我是放在同一地位之上，可知旅遊對於他自身的重要性。而在其描寫自然景觀時常常使用新奇的比喻、擬人的手法，使自然景物人格化，使其也具有了人文性。

在王思任的旅遊理論中，他別有一番見解地議論了自然、人與旅遊三者之間的關係，王思任說：

天地定位，山川通氣，事畢矣，而有必生人，以充塞往來其間。則人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所任以恆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晝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sup>105</sup>。

王思任認為既然人生而有雙目，就是為了看；而生而有雙足，就是為了行走，因此他以為旅遊乃是上天所賦予人類的一種本能<sup>106</sup>。至此，王思任將旅遊提升至「人之本能」的境界，完全推翻了以往「玩物喪志」的傳統旅遊觀。他甚至

<sup>103</sup> 明·王思任〈紀遊〉，《遊喚》收入《筆記小說大觀》，頁 2411。

<sup>104</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241。

<sup>105</sup> 明·王思任〈遊喚序〉收入《筆記小說大觀》，頁 2409。

<sup>106</sup>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頁 241。

提出了旅遊類型的分類：

予嘗謂官遊不韻，士遊不服，富遊不都，窮遊不澤，老遊不前，稚遊不解，哄遊不思，孤遊不語，托遊不榮，便遊不敬，忙遊不慊，套遊不情，挂遊不樂，勢遊不甘，買遊不遠，賒遊不償，燥遊不別，趁遊不我，幫遊不目，苦遊不繼，膚遊不賞，限遊不道，浪遊不律。而予之所謂遊，則酌衷于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遊道如海，庶幾乎蠡測之矣。<sup>107</sup>

王思任按照遊客的身分、條件、習慣……等，將遊分爲二十三類，並以一字來形各自的侷限性，所謂「酌衷于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他強調唯獨自己瞭解旅遊之道理，其實也就是說他的品味出眾，與人不同。想要將自己的「雅」與大眾的「俗」做了一個區別<sup>108</sup>。

### （三）遊必有記

隨著旅遊活動的越趨興盛，「遊必有記」也是士人所重視的，他們往往將自己的旅遊經驗形諸於文字，書寫遊記將自己的旅遊心得與所見之事記錄下來。除了因為商業繁榮而帶來的生活富足而開始從事旅遊活動，還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是遊記的集成化與小品文化兩個方面的同時展開<sup>109</sup>。在明代中期，遊記專集

<sup>107</sup> 明·王思任〈紀遊〉，《王季重雜著》，（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年9月），下冊，頁646-647。

<sup>108</sup> 巫仁恕〈消費品味與身分區分—以旅遊文化為例〉，《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7年）頁204。

<sup>109</sup> 所謂「集成化」，就是以單篇遊記累積為遊記專集而問世，遊記專集與唐代以柳宗元《永州八記》為代表的組合式遊記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組合式遊記肇始於元結，完型於柳宗元，爾後綿延不絕，至晚明三袁等人尤為盛行。它往往是以數篇遊記描述描寫相近的遊覽景觀，然後組合為一個藝術整體，分合自如。而遊記專集則進一步將為數眾多的遊記匯為專集，其遊覽地點遠近不限，其遊覽時間長短不拘，因此，是對組合式遊記的進一步發展。參照梅新林、

勃然而興，不僅數量可觀，且藝術價值較高，如：喬宇（1457-1524）《晉陽遊記》、都穆（1459-1525）《遊名山記》、李濂《濟源遊記》、李元陽（1497-1580）《顛南遊記》、鄭東白《金華雜記》……等，都是遊記專集的佳作。遊記專集的出現，必須以一定的數量為前提，只有大量文人參與創作的時候，才有可能匯集成冊。此外，作家必須要有自覺的遊記創作意識和文體分類的意識。遊記的集成化顯現出了明人不只好遊，更是好遊成癡，耽於山水之樂中，不僅是旅遊而已，更要將過程記錄下來，才算是完整，足以見得明人的生活情趣唯是真趣而已。山人陳繼儒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山川之美必須要仰賴文士之筆才得以表達出來，因為山川「無口」，需藉助旅遊者書寫遊記，才能將美傳播給世人知道，他說：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而無口，借人而言<sup>110</sup>。

遊記的寫作不僅僅是遊歷者將美景記錄下來而已，深層的意義更有著傳播的功能，可滿足臥遊者的好奇心，以啟發他人前往遊歷的企圖心。可以遊記為導覽手冊而按圖索驥的找到該目的地。鄒迪光認為要以文字記錄山水景色才能夠酬謝山靈之神，他說：

夫遊亦難言矣，必濟勝有具，尤必紀勝有筆。濟勝無具，則陟巍臨深，祇涉影響；紀勝無筆，則搜奇剔異，亦落夢境……描寫擬議，使栩栩有

---

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17。

<sup>110</sup> 陳繼儒〈遊喚序〉，《晚香堂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66，卷3，頁12a。

生態，用以答山靈，而資臥遊，非真能為兩山寫照也<sup>111</sup>。

鄒迪光認為出遊必須要仔細規劃，除此之外更要隨身攜帶筆，如不能隨身攜帶筆而隨時記下所見所聞，則他日要回想起遊玩的過程則是必有所困難，能夠紀錄下過程而寫成遊記，也算是對山靈之神的一種回饋。

從遊記的數量來看，即可知道明人的旅遊之風非常興盛，且大多數都會將自己的旅遊過程記錄下來，「遊必有記」已是明人的旅遊習慣了。據學者周振鶴統計的明人文集中遊記的數量顯示，明代前中葉的遊記並不多，至嘉靖年間(1522-1566)漸漸增加，萬曆(1573-1620)以後則是大量出現<sup>112</sup>。從遊記的數量來看，我們可以說：明代的旅遊風氣直接催生了地理學的獨立，原本只是隨性的遊覽、隨筆的揮灑，卻無意間促使了地理這一門長久被冷落的學科再度受到世人的重視。

---

<sup>111</sup> 鄒迪光〈台鷹草自序〉，《始青閣稿》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 103，卷 17，頁 21b-22a。

<sup>112</sup>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頁 229。  
若以時期的特點而言，正德以前的遊記甚少，不過十來篇，而且即使有個別遊記為名者，亦無遊記之實，如弘治十八年進士科的鄭善夫 5《少穀集》6 卷十中，雖有《春雨游大石記》、《夜遊虎丘記》，類皆寫景抒情之作，無關地理。嘉靖間遊記明顯增多，約有百篇，但多為小品，數百字而已，這些遊記與一般普通以「記」為名的散文沒有太大差別。至萬曆及天啓、崇禎間，遊記的寫作甚為普遍，計有三百數十篇，有些「記」雖不以遊記為名，也有遊記之實。參照：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5 年）頁 73。

## 第五節 晚明文人的旅遊概況

在上一節中說明了晚明的整個社會風氣，從儉樸到奢靡，奢靡風氣的漸起間接促成了旅遊活動的興起，當晚明文人開始從事旅遊活動之時，也留下了不少的遊記之作，因此本節所要探討的是：晚明文人旅遊實態的呈現，晚明人極其注重旅遊時自身的享受以及感官上的追求，從遊具的講究、隨從的跟從、旅遊時的住宿……等，而且多半選擇中、近程距離的景點遊玩，從這些要點歸納起來可知：晚明文人的旅遊是屬於「享樂式」的遊玩，是一種自覺性的遊玩。其花費在旅遊活動上的費用，也算是一種身分地位上的表徵，這樣享樂式的漫遊形式以及到後來王士性、徐霞客等人長距離、刻苦式的遊歷，甚至成就了近似於地理書的遊記，晚明時期的「遊」，究竟呈現出幾種不同的風貌，則是本節欲討論的重點。

在明代後期旅遊活動興盛的風氣之中，士人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從士人階層擴展到平民大眾，有別於前朝拘謹保守的心態，魏晉文人寄情山水是因為政治因素；唐宋時期的遊歷多是因為貶謫而進行的宦遊；而明人的旅遊則是出自於自身的意願，從景點的選擇、交通工具上的安排以及住宿的地點，皆在規劃之中，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明人對於旅遊之事極為講究，是以「山水為主，己身為客」的客觀態度去欣賞山川美景，至此，旅遊已經是一件正經之事，而且是士人在身份地位上的表徵之一。

## 一、旅遊地點的選擇

旅遊景點的選擇是晚明士人必須首要決定的，從士人們所撰寫的遊記中可發現所選擇的地點多半是名山、大湖、園林……等，且都是以近距離的景點為首要選擇，對於當時經濟與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區而言，能夠從事長途旅行的士人仍屬少數，且多半是選擇交通便利、短距離的勝地為多，距離也是他們所考量因素之一，尤其是在江蘇和浙江在明清時期是江南富庶之地，商品貿易繁榮，水路交通便利，因此成為文人出遊的首選對象。程正揆（1604-1676）在〈自題臥遊卷〉中說明了江浙地區的美景之所以有名乃在於位於交通便捷之處：

山水之妙，無地不曲盡其致，但以近江河通遊人為易顯爾。吳浙間泉石土阜，鮮有奇特，不過因舟楫之便，隨意可到，兼有山寺雅僧精舍借榻，文人墨客題詠點綴，遂冒名山<sup>113</sup>。

吳浙一帶的景點並非幽絕奇特，但是因為處於水陸交通便利之處，又有寺院可供給住宿之便，而借者文人墨客題詩點綴，便可能為名勝景地。

袁宏道在〈虎丘〉一文中說：「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sup>114</sup>。」虎丘距離城中只有七八里，而且並非是深山峻嶺，因此這種短程且交通方便的景點，就成了人們旅遊時的首選之地。而袁宗道（1560～1600）在〈極樂寺記遊〉中也說：

極樂寺去橋可三里，路逕亦佳，馬行綠陰中，若張蓋。……暇日曾與黃

<sup>113</sup> 清·程正揆〈自題臥遊卷〉，《青溪遺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61，卷 24，頁 8a。

<sup>114</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虎丘〉，《袁宏道集箋校》，卷 4，頁 157。

思立諸公遊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為別<sup>115</sup>。

袁宗道認為極樂寺路徒頗近，而且路況也佳，因此是一極佳的選擇。而楊循吉在〈西山游別詩後序〉所言：

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跡者耳，至於幽僻奇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可到之山，亦鮮有能及游者焉。<sup>116</sup>

楊循吉（1456-1544）認為：遠距離的景點雖是幽僻奇絕之境，但卻無法到達，因此士人的遊覽多是選擇近距離的景點，這是交通工具的考量之一，也是因為當時士人旅遊抱著一種「隨意遨遊」的遊玩心態，因此從事長距離、艱苦式的旅遊並不多，理性的成分與感官上的享受仍是決定士人景點選擇的重要條件之一。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

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讚賞，千載不絕。豈亦有幸不幸耶？<sup>117</sup>

<sup>115</sup> 明·袁宗道〈極樂寺記遊〉，《白蘇齋類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48，卷 14，頁 14a-b。

<sup>116</sup> 明·楊循吉〈西山游別詩後序〉，《燈窗末藝》，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3，頁 336。

<sup>117</sup> 明·謝肇淛〈地部二〉，《五雜俎》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130，頁 88。

謝肇淛認為景點的遠近以及交通的方便，是決定有無遊客的關鍵處，他對其做出精闢的見解。山川美景的地理位置也需要交通條件的配合，否則即使是美景當前，也無法親臨景觀恣意遨遊。距離太過於遙遠的景點有礙於旅遊時的便利性，除了舟車勞頓之外，在僱用僕人上也有所不便。

而位在杭州的西湖更是旅遊的熱門選擇，幾乎晚明文人皆曾為西湖寫過遊記，西湖也因為遊人如織而成了商業聚集之地，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提到了西湖以觀光維生的行業是「日不止千金」現象：

遊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已為遊地，則細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sup>118</sup>。

可見西湖在當時是相當熱門的旅遊景點，周邊的細民以此為業，足可維持生計。西湖因為大眾旅遊過於興盛，因此士人們就刻意選擇遊人稀少的時節來旅遊，袁宏道在辭去吳縣知縣後漫遊吳越間，在遊覽杭州西湖時說：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sup>119</sup>

<sup>118</sup> 明·王士性〈廣志繹·江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卷4，頁326。

<sup>119</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西湖二〉，《袁宏道集箋校》，卷3，頁423。

袁宏道點出了遊覽西湖最佳的時光間在於早晨與黃昏時刻，只有文人了解西湖之美在朝日始出而夕陽未下之時，不同於一般遊人所遊的時間。張瀚也曾說提及遊覽西湖的樂趣：

然西湖夏月，荷葉亭亭水上，如蕖亭亭水上，如翠蓋紅妝，艷麗無比，香芬襲人。即盛夏之候，泛舟湖畔，停泊垂陰，清風徐來，頓忘炎燠。余嘗經齊秦之境，亦多芙蕖，安得畫舫搖曳，遊人所賞也！<sup>120</sup>

張瀚寫出了西湖夏日的一個美景，美景當前，頓時忘卻夏日的酷暑。但是即使在冬日寒風刺骨的氣候中，張岱仍獨往湖心亭看雪，感受一下稱興而遊的雅致：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sup>121</sup>

由以上士人遊覽西湖的情形可知道，晚明文人的旅遊是講究玩賞時的「雅興」，他們注重的時遊玩時的興致與心情，是真正將自己投入於美景之中。杭州之勝，以西湖為最，王士性對西湖之遊，有自己一番的獨特體驗，他說遊人只知西湖之樂，而不知其所以樂也，他認為西湖「宜晴」、「宜雨」、「宜雪」、「宜月」，不同氣候條件下的西湖，各有其風光，他說：

<sup>120</sup> 明·張瀚〈時序紀〉，《松窗夢語》，卷7，頁121。

<sup>121</sup> 明·張岱〈湖心亭看雪〉，《陶庵夢憶》（台北：開明書局，1957年），卷3，頁42。

余時把酒臨風，其喜則洋洋然，故曰宜晴。及夫白雲出岫，山雨滿樓，紅裙不來，綠衣佐酒，推蓬煙裏，忽遇孤舟，有叟披蓑，釣得艇頭，余俟酒醒，山青則歸，雨細風斜則否，故曰宜雨。抑或瑤島銀河，枯槎路迷，山樹轉處，半露樓臺，天風吹雪，墮我酒杯，偶過孤山，疑為落梅，余時四顧無人，則浮大白和雪嚙之，向逋仙墓而吊焉，故曰宜雪。若其晴空萬里，朗月照人，秋風白苧，露下滿襟，離鴻驚起，疎鐘清聽，有客酌客，無客顧影，此於湖心亭佳，而散步六橋興復不減，故曰宜月<sup>122</sup>。

這是王士性本身對西湖的體驗，他認為西湖在不同氣候之下會有不同的景象呈現與感受，這才是真正知其西湖之所以樂也。

張京元在《湖上小記十則》中的〈斷橋小記〉寫出了西湖的缺點在於距離問題：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朝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遊，時時可遊。而酒多於水，肉高於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遝，以挨簇為樂。無論意不在山水，即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遊者何曾一著眸子也。<sup>123</sup>

張京元指出了西湖之所以成為勝地乃是在於地理位置優越，但這也是西湖的缺點，因為這樣一來則「人人可遊，時時可遊」，導致整個景區人多雜遝，導致遊

<sup>122</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吳遊上·五嶽遊草〉，《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75。

<sup>123</sup> 明·張京元《湖上小記十則》收入《古今遊記叢鈔》（台北：中華書局印行，1961年）第4冊，卷18，〈浙江省〉，〈蘇堤〉，頁1。

人遊覽的重點已不在於自然景物，而是「以挨簇爲樂」的人文景觀<sup>124</sup>，酒多於水，肉高於山，其實美景已非是重點，而是在於與人同樂之趣了，這也可以看出晚明的旅遊階層已從文人階層往下延伸至大眾旅遊。

## 二、旅遊的舒適性、娛樂性以及消費性

晚明文人非常重視旅遊時的舒適性，在選擇旅遊景點上時是以中短距離爲主，並非是長距離冒險式的探險旅遊，他們很重視乘坐交通工具的舒適性，也注重旅遊時的器具，且不全都是必需品，有茶、酒等奢侈消費品<sup>125</sup>。如李日華在日記中曾記載他旅遊時攜妓的情況：

在座沈子廣、高孟益、朱完樸，歌伎梁一、歌童方二、任八。維梢菰蒲間，月色靄黪。遊者鼓吹間作，絲肉雜陳，亦有以火花煙爆佐之者<sup>126</sup>。

從他們所攜帶的隨從與歌妓的習慣看來，晚明文人極爲重視旅遊時的娛樂性以及舒適性，這與後來王士性與徐霞客二人考察、長距離的壯遊形式有很大的差別。

黃省曾也曾提及攜妓的遊況：「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虎丘尤甚，雖風雨無寂寥之日<sup>127</sup>。」攜妓旅遊的風氣在晚明已是常態。從這點看來，旅遊時的娛樂性似乎大過於旅遊景點所給與文人的感受，他們更注重的是旅遊時精

<sup>124</sup> 尹恭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評述》，（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5月），頁213。

<sup>125</sup> 巫仁恕〈消費品味與身份區分—以旅遊文化爲例〉，《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與士大夫》，頁194。

<sup>126</sup>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2月），卷4，頁247。

<sup>127</sup>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7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a。

神層面上的享受與樂趣。而旅遊的舒適性也表現在文人在交通工具上的講究，如作為旅遊之用的遊船和轎子、肩輿在晚明甚為普及，可見晚明文人重視遊具的程度大過於遊玩的興致，必須在於遊具齊全的情況之下才能進行，旅遊的舒適性決定了晚明文人是否願意前往景點的關鍵之一，張翰也曾因為遊船的不舒適而導致遊興大減：

舟制不佳，四櫓搖撼，板木皆動，舟制不佳，四櫓搖撼，板木皆動，舟中之人不能穩坐，況咿啞之聲聒耳，對面語不相聞，較他處舟航迥異。……<sup>128</sup>

交通工具的重要性似乎已決定了此次的旅程是否盡興，旅遊過程的舒適程度已大於山川美景的吸引力，這或許是晚明文人在熱於旅遊活動之餘，所重視另一種精神層面的享受。

從遊具的舒適性以及娛樂性這兩個層面看來，晚明文人的旅遊已經構成了一種消費性的旅遊模式，遊具的重視與購買，還有攜妓伴遊的遊況，這些都需要金錢上的來往與交易，這顯示出了晚明文人願意為了遊玩而願意花費金錢，代表著晚明的社會已進入了一種商業性的消費行為，屬於末端消費的旅遊活動已成了晚明文人所重視的活動。

### 三、晚明遊記書寫的多元面向

晚明文人熱愛旅遊，遊記的數量在此時期也達到一個高峰，這時期的遊記類型可分為二，一是以公安、竟陵為代表，以遊記小品為主體的「才人遊記」。所謂「才人遊記」，是一種在作者主觀才情主導下，自由書寫，不拘格套的遊

---

<sup>128</sup> 明·張翰〈西遊紀〉《松窗夢語》，卷2，頁40-41。

記作品，從內心出發，以感覺為尚，以才情為主，追求自然率真之美，如袁宏道的性靈遊記小品。另一類是以《徐霞客遊記》為主的「考察型遊記」，考察型遊記的內容並非是以個人的主觀情感為主，而是以客觀的山水景物為主要記載內容，是注重遊記內容的真實性以及遊記寫作的藝術性，二者並重，涉及地理、物產、人文、民情的記載，但還是涉及文學藝術性，並非全是地志的書寫形式<sup>129</sup>。袁氏三兄弟、譚元春、王思任……等，便是這些才人遊記的代表人物<sup>130</sup>。作為才人遊記的書寫，所注重的是人對山水景物所產生的感觸，是以模山範水為主，對於山川地形、河流走向、物產分布，就不若考察型遊記注重。我們可以說：才人遊記以「情」為遊記的書寫本體；考察型遊記則以「實」為遊記的書寫脈絡。

### （一）公安派獨抒性靈的遊記書寫

性靈遊記小品以公安袁宏道為代表，其遊記少有政治、人生抑鬱之寄託，內容多半為描寫自然風光，注重生活情趣，內心情感的性靈書寫，小品文式的遊記書寫是尚真、尚俗、尚趣的基調，因此，晚明小品遊記所呈現出的特色，多半是追求個人的生活情趣，享受生命，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曾提出自己的創作理論

大多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

<sup>129</sup> 梅新林、俞璋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38-239。

<sup>130</sup> 袁宏道的遊記主要收於《錦帆集》、《瓶花集》、《瀟碧堂集》、《華嵩遊草》，據筆者統計：袁宏道的遊記數量約為85篇，僅指於《袁宏道集箋校》中所註明之遊記，尚不包括尺牘、詩文、序跋等。其兄袁中道的遊記共計有110篇，其中包括樓台景物以及山水遊記的描寫，樓台景物多寫生活情趣、氣息居多。

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sup>131</sup>。

這是袁宏道對於文章創作的態度，他認為文章的寫作不必拘於格套形式，以性靈為主，誠如他在遊記小品中的書寫表現，寫自己獨特的遊賞方式，故作風雅之態以追求與眾不同的遊興與品味，如在〈雨後遊六橋記〉中描寫與友人遊覽高粱橋時的樂趣：

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寸餘，遊人少，翻以為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臥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為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sup>132</sup>。

對於遊記的書寫與記載，袁宏道以抒情筆調寫出遊覽的情景，呈現出一幅悠閒、追逐聲色的畫面，寫出與友人一同臥地飲酒，以面受花的遊景，情隨景遷，遊者心與之動。此般的小品遊記書寫，注重的是個人的情感與遊玩的感受，景物的記載是其次，所關懷的焦點乃是藉著旅遊來提升自我的生活情趣，真摯、任興而發，寫庶民的遊玩生活，呈現出熱鬧的氛圍，是性靈遊記小品最突出的個性。

又如〈滿井遊記〉所寫的是一種超然物外的山水之情，即使是在尋常的生活氛圍中，也能體悟到自然之美，所謂「遊」不一定要到名山勝景之地遠遊，即使是近郊的景點，也能感到愉悅之感<sup>133</sup>：

<sup>131</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敍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卷4，頁187。

<sup>132</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雨後遊六橋記〉，《袁宏道集箋校》，卷10，頁426。

<sup>133</sup> 周群著《袁宏道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202。

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靚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sup>134</sup>。

在袁宏道筆下的遊記，多半是寫悠然出遊的情景，此篇〈滿井遊記〉呈現出早春的景物特性，以「始解」、「乍明」、「新開」……等詞，寫季節變換、乍暖還寒的時序特徵，最末道出遊人雖未極多，但也常有飲酒品茗之遊客於此地遊玩，顯示滿井此景點的遊玩是比較閒情且悠然，呈現出市民生活的真實景象。

袁宏道以真、俗之筆觸來寫遊記，其遊記的內容風格是以情為主，山水的描摹為次之，甚至呈現出一種熱鬧的遊玩景象，如在〈虎丘〉一文所寫：「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岩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尤為勝<sup>135</sup>。」文中呈現出庶民遊玩的熱鬧景象，把此節日性盛大場面場景呈現在讀者眼前，流露出世俗化的情趣意象。

## （二）竟陵派幽情單緒的遊記書寫

晚明文人的遊記書寫風格多半類似於抒情寫景，直書胸臆，甚至是以一種

<sup>134</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滿井遊記〉，《袁宏道集箋校》，卷17，頁681。

<sup>135</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虎丘〉，《袁宏道集箋校》，卷4，頁157。

品味生活的方式來看待遊玩，可以說是個人審美情趣的表現，對於遊記的寫作重點，是以「情」為主體，山水景物為客體，情真與率直是遊記小品的個性與特色。又如鍾惺與譚元春幽深孤峭的書寫風格，在文字與意境上特意營造孤峭的藝術風格，試圖矯正公安派所崇尚真、俗、趣所帶來的流於粗俗、不夠含蓄的風格，特意以孤峭來反駁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鍾惺、譚元春的詩文創作理論清楚表達了「幽深孤峭」的概念，在鍾惺與譚元春之〈詩歸序〉中，可清楚看到他們的詩文主張：

夫人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於古今之間，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為之咨嗟旁皇者，此詩品也<sup>136</sup>。(譚元春)

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於一逢，求者之幸於一獲，入之欣於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sup>137</sup>。(鍾惺)

上述二論可看出鍾惺與譚元春「幽深孤峭」詩文理論，以「孤」來作為詩文創作的最上乘境界，相較於公安派所寫的直、率、真，試圖以幽深奇僻、孤往獨來的文學審美情趣，營造出一種特立獨行的氛圍，即使於世上僅有一二人欣賞，也無關要緊。

<sup>136</sup> 明·譚元春〈詩歸序〉，《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頁594。

<sup>137</sup> 明·鍾惺〈詩歸序〉，《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卷16，頁236。

〈浣花溪記〉是鍾惺的遊記代表作，遊記中以優美、流暢的文筆記述了自己遊玩浣花溪，參觀杜工部祠的經歷，文中寫到：

出成都南門，左為萬里橋。西折纖秀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鑒、如琅玕、如綠沉瓜，窈然深碧，滌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溪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溪，平望如薺……<sup>138</sup>。

遊記先描寫浣花溪的的形狀與色澤，像玉環、像圓規，水色如明鏡、像碧玉，勾勒出浣花溪幽深而靜謐的清幽之感。文末提到參觀杜工部祠而發思古之幽情，佩服杜甫為人處世的磊落胸懷，並由此想見其人<sup>139</sup>。文末寫到：「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sup>140</sup>。」藉著憑弔杜甫而道出自己的寂寞之情，表現了其人格的孤傲不群，以景物之深幽與其人格的孤傲來相互映襯。

譚元春的遊記小品同樣也表現出幽情單緒的遊記風格，在遊烏龍潭的三篇遊記中，都寫出烏龍潭深幽的感覺，這也是譚元春對於自己詩文理論的美學追求，進而表現在遊記的寫作風格之上，如在〈初遊烏龍潭記〉中描述烏龍潭「潭沉沉而已」，僅此一句即給予了烏龍潭幽深的意象，這是對烏龍潭最為精闢深刻的景象書寫。次於〈再遊烏龍潭記〉中寫烏龍潭更深沉的意象：「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靜，筏宜穩，亭閣宜明，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sup>141</sup>。」在幽深孤峭的意象中，寫出了幾分恬淡自適。接著寫烏龍潭的雨景：狂風、暴雨、

<sup>138</sup> 明·鍾惺〈浣花溪記〉，《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卷20，頁328。

<sup>139</sup> 梅新林、俞瑋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頁281。

<sup>140</sup> 明·鍾惺〈浣花溪記〉，《隱秀軒集》，卷20，頁328。

<sup>141</sup> 明·譚元春〈再遊烏龍潭記〉，《譚元春集》，頁558。

震雷、急電，與靜謐的烏龍潭有映襯對比的效果。〈三遊烏龍潭記〉所寫狂風暴雨後歸於寧靜的景象：

是時殘陽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震天，始猶紅洲邊，已而潭左方紅，已而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頰。明霞作底，五色忽復雜之。下岡尋筏，月已待我半潭<sup>142</sup>。

曉月東昇，晚霞正艷，霞光渲染了整個烏龍潭，呈現出富麗且浪漫的景象，譚元春再度描寫了烏龍潭的寂靜，在一種迷濛又奇幻的色調中結束遊記。三篇遊記，三種景象，三個旅程，這是對烏龍潭自然景色的不同感受，在譚元春的筆調之下，呈現出一種高潮迭起的意象<sup>143</sup>。通篇遊記以烏龍潭為中心，寫烏龍潭的動與靜，充分顯現出譚元春幽深的筆法描寫，遊記中無一處寫遊人旅遊的熱鬧情景，僅以景象變化的交錯筆法，寫出烏龍潭的幽情單緒，這是與公安派帶有市民文化色彩的遊記寫法有所不同，兩者形成了一靜一動的強烈對比。

### （三）王士性人文地理的遊記書寫

王士性所寫的《廣志繹》，主要探討人文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聯，「吾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無不於吾遊寄焉<sup>144</sup>。」王士性認為自然界的一切變化與人類的活動是息息相關，秉持著這個理念，《廣志繹》所寫多是人文活動的現象，分析自然與人文之間的相互因果關係。

王士性的遊記寫作主要有三個面向，一為自然景觀的描寫；一是人文地理

<sup>142</sup> 明·譚元春〈三遊烏龍潭記〉，《譚元春集》，頁 559。

<sup>143</sup> 梅新林、俞璋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頁 283-284。

<sup>144</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自序〉，《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頁 29。

的記載；一是理論的歸納，也是《廣志繹》此書的重點所在。在王士性的遊記中，人文景觀所佔的比例極大，自然景觀的書寫反而是次之，重視人文景觀的寫作方式在中國歷代以來是少見的，與公安、竟陵的小品遊記、徐霞客考察型遊記有所不同的是：王士性遊歷過後，用歸納的方式來書寫當地民情風俗，進而延伸到分析自然環境影響人類的生活習慣，他擅於把看到的景象加以歸納和分析，將自然的現象提升到觀點的層面。

透過王士性對於人文地理上的記載，再加以對照今日的地理現象，古今對照，就會使我們明白四百多年來自然環境與人文現象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王士性的旅遊不僅是純然的山水漫遊，以詳實的紀錄筆法，分析歸納地理現象，將旅遊的層次又提升到另一層面，漸漸地往實用之學邁進，也間接影響了徐霞客遊記的寫作。

#### （四）徐霞客紀實考察的遊記書寫

《徐霞客遊記》以日記體的形式來創作，雖非創新，但以長篇書寫的方式突破前人的短篇遊記書寫，既是日記，又是遊記。首重山川地形的記載，次為人文景觀。結合了「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丁文江先生稱其為「樸學之真祖」<sup>145</sup>，由此可見得，《徐霞客遊記》並非是小品遊記的寫作方式，客觀、記實、探奇是遊記的寫作重點，若以其內容來看，可視為地理學之作。總體來說，《徐霞客遊記》的出現不僅只是由個人的興趣、志向、毅力所決定，將他放在晚明的社會背景來看，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啓《農政全書》、方以智《物理小識》、以及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這些科學巨著的出現代表著實證精神的興起，雖然《徐霞客遊記》的寫作初衷並非是以成為地理著作為目的，但其遊記的內

<sup>14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282。

容、方法，都是合乎科學考察精神的。

此外，雖然可將《徐霞客遊記》視為是地理學的書寫，但其內容是介乎文人遊記與地志書寫之間，它並非像方志只記載疆域沿革而已，而是兼有文人的筆調以及文學性的書寫，以文學的語言來描寫地貌特徵，如在〈遊雁蕩山日記〉描寫雁蕩諸峰的奇絕：「危峰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之卓，如襍頭巾之欹傾。洞有口如卷幕者，潭有碧如澄靛者<sup>146</sup>。」以譬喻的手法來寫雁蕩山勢的形狀，如筍之尖削，如筆之挺立，用文學的語言來寫山川風貌，是徐霞客將文學與地學結合起來的最佳例證。既有文學的語言，又有地志的實用價值，堪稱為古今遊記之奇。

---

<sup>14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遊雁蕩山日記〉，《徐霞客遊記》，頁6。

## 第六節 小結

明朝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爲了維護貴賤有等的「階級制度」、「節儉淳厚」的社會，而制定了一套「貴賤有等，各安其位」的規範，重農抑商更是他箝制社會經濟最有力的政策之一，明初的社會情況大致上是實現了一個「貴賤有等、望而知之」的理想。然後嘉靖、隆慶以後，因爲政治情況的廢弛，再加上商品經濟急速發展，基本上明初的規範已無法限制此時的社會狀況。社會上「逾越僭禮」的現象常而有之，因此奢靡風氣瀰漫著整個社會，從明初的儉樸淳美到明末的華侈相高，士人的心態也隨著有所轉變，心學的影響使之擺脫禮教束縛，加以生活上的寬裕，一個追逐時尚、享樂主義的消費社會也隨之而起。

明代中後期社會風氣急遽的改變，不僅在物質生活上有了不同的改變，連在精神生活上的消費也有了重大的轉折，娛樂活動開始相繼而起，旅遊從以前的「玩物喪志」之事變爲生活中必要之事，呈現出享樂的生活狀態。旅遊自古以來本非主流之事，只有在士人不得志之時，或是國家凋敝之際，才會拋下塵俗而遠走山林逃避，但是「以己爲主，山水爲輔」，無法真正用客觀的心情去欣賞美景。直至晚明之時，明人出遊才是真正的個人意志之遊，旅遊的觀念越來越成熟開放，本著從空談性理轉入經世務實，「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寄情於山水之間，以暢遊五嶽爲目標<sup>147</sup>。

在這股旅遊風氣的導引之下，純粹將旅遊視爲休閒活動的文人不在少數，

---

<sup>147</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1。

但真正以旅遊為職志的文人卻不多，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歷或許可視為是從單純的山水娛樂，轉變為有意識地進行地理考察，此二人的遊歷有別於他人的賞玩山水的態度，而是真正將自身投入自然之中，探討大自然的奧秘以及深訪民間，其遊記著作內容多涉及地理實學方面的記載，因此，探討此二人的遊記內容可得知遊記的書寫形式，如何從單純的山水描繪書寫方式，再與地理景觀、人文現象接軌，因此，藉著探討王士性與徐霞客二人的遊記內容可得知晚明文人在旅遊時，所關注的焦點為何，以及遊記書寫方式的改變。

### 第三章 王士性《廣志繹》中的人文地理書寫

遊記的書寫可以有很多的面向，在晚明旅遊風氣興盛的社會中，王士性《廣志繹》是自己親身的遊歷過程和透過敏銳的觀察，紀錄全國十四省的經濟、文化、民俗風情……等，做出了極為精到的分析和論述。從這個角度看來，王士性在地理學上的貢獻，不下徐霞客。

本章欲藉著對王士性其人與著作的討論，來重新建構王士性在地理學上的重要性，以及詳述在人文地理方面的記載。從王士性在人地關係上的辨證，或許我們可窺知王士性所關懷的焦點為何，在文學與地學的交錯關係上，王士性秉持著「人情物理，悲喜順逆」的人地思想，以不同視角的寫作模式，開創了遊記的多元視角，對於遊記的詮釋有了更為寬廣的領域。

#### 第一節 王士性其人

##### 一、生平背景

王士性，字恆叔，號太初，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生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諸生時曾遊歷杭州及越中佳山水，為萬曆五年（1577年）進士。相繼在河南、北京、四川、廣西、雲南、山東、南京等地為官，除福建外，足跡遍及當時的兩京十二省，寫下了許多精采的遊記與記遊詩，結集為《五嶽遊草》十二卷、《廣遊志》兩卷、《廣志繹》六卷<sup>1</sup>。這三本

<sup>1</sup> 本論文所選取版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士性《地理書三種》為主，內容包括王士性所

著作的寫作面向並不相同，其中《廣遊志》和《廣志繹》是王士性晚年時期將其所遊歷和考察的對象加以理論思惟，推衍出人與地之間的關係，相繼寫出的兩部傑出的人文地理之作。《廣遊志》成書時間早於《廣志繹》，《廣遊志》以全國範圍作為區域研究對象，寫成了《廣遊志》，分析各地在自然環境（地脈、形勝、風土）以及人文因素（如少數民族、宗教、方言）的差異。《廣遊志》全書分為：地脈、形勝、風土、夷習、勝概、磯島、陵墓、洞壑、古木、古蹟、碑刻、樓閣、書院、刹宇、蠱毒、仙佛、物產、奇石、溫泉、聲音等篇，先為標目，後為陳述地理概要。《廣志繹》是王士性地理書中，所完成的最後一本書，內容多為地理風貌、人文制度、民俗風土的分析及記載，有別於我們對於遊記的傳統認知。《廣遊志》、《廣志繹》這兩部地理書與《徐霞客遊記》有所不同，是王士性在實地考察之後，對於所取得的材料做一整合性的統整，並加上自己的思維判斷所寫成的地理之作，並非像《徐霞客遊記》日記式的遊記實錄，但在地理學上的貢獻相較於徐霞客來說毫不遜色<sup>2</sup>。

四庫館臣將王士性的著作《五嶽遊草》十二卷、《廣志繹》六卷，列入史部地理類存目：

凡山川險易，民風物產之資，巨細兼載，亦間附以論斷。蓋隨手紀錄，以

---

著《五嶽遊草》十卷、《廣遊志》二卷、《廣志繹》六卷，以及《王恆叔近稿》、《拾遺》、附錄。本書根據浙江臨海市博物館清康熙馮甦刻本點校，又以同館所藏另一刻本—洪氏安雅堂刻本補齊。《廣遊志》不見單獨刻本，故本書歸入《五嶽遊草》中，唯目錄上仍存其名。《五嶽遊草》十卷、《廣志繹》六卷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51 冊，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馮甦刻本，附圖十六幅，《王士性地理書三種》版本中將圖片省略。

<sup>2</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1。有關於王士性的記載可見於：《明史·王士性列傳》223 卷，列傳 111、《明史稿》206 卷、《孤本明人小傳》第 3 卷、《明詩綜》第 53 卷、《明詩紀事》第 12 卷。在方志方面則有：《康熙台州府志·王士性傳》《康熙臨海縣志·王士性傳》、《光緒台州府志·王士性傳》，其內容大部分相類。

資談助。故其體全類說部，未可盡據為考證也<sup>3</sup>。

四庫館臣將之列為史部地理類中，認為王士性著作的內容是地理形勢與民俗風情的記載，其筆法屬於「隨筆」性質，有敘有論，但欠缺實證的客觀精神<sup>4</sup>。其實，四庫館臣對王士性評價是可想而知的，在清初考據之風的學術風氣之下，自然對於王士性人地關係的論點會有所貶抑，四庫館臣認為王士性的著作僅是「隨手紀錄」，並未做到實證實地的考察，「未可盡據為考證也」。考據之風的興起間接地影響王士性的價值與地位，因此我們知道，四庫館臣對於王士性的評價是與當代的學風有關，未必是王士性著作的真實樣貌，必須從文本的爬梳與重新建構，才能還原王士性最真實的樣貌。

現代學者周振鶴重新將王士性的價值作一明確的定位，指出他在地理學上的貢獻，尤其是《廣志繹》一書，精闢地分析了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在中國人文地理的發展上有深遠的影響，後世顧炎武受到王士性的影響頗甚，《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的文字有些多承載自《廣遊志》與《廣志繹》，如在《肇域志》中〈南直隸 蘇州府〉一篇的文字與王士性《廣遊志》〈地脈〉、〈形勝〉、〈風土〉此三節的文字幾乎如出一轍，標題更是直接引用《廣志繹》首卷〈方輿崖略〉為題，由此可看出王士性的人地思想對於後代是有傳承與影響。

## 二、王士性的「遊道」

對於「遊道」，王士性有其自己的一番見解，他將遊分成了三個層次，即：

<sup>3</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048。

<sup>4</sup>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師大國文學報》第42期，2007年12月，頁124。

天遊、神遊、人遊：

一客問王士性曰：子好遊乎？夫遊亦有道耶？余曰：「夫太上天遊，其次神遊，又次人遊，無之而非也。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舉形留，下焉者神為形役。然卑之或玩物，高之亦采真<sup>5</sup>。」

最上者為「形神俱化」的天遊，其次為「神舉形留」的神遊，最下者為「神為形役」的人遊。人遊之所以為最下，是因為必須依賴形軀行動，受到客觀世界的條件限制，但人遊雖然為最下，卻是遊道的起點，若能超越生命的限制，展現了「置身丘壑」的勇氣，消解內心對形體的執著，即可體現精神自由無礙，遊於六合之外的境界<sup>6</sup>。另外，他又認為：「當其意得，形骸可忘，吾我盡喪，吾亦不知何者為玩物，吾亦不知何者為采真<sup>7</sup>。」這似乎是遊道的最高境界，將自身與景物融合為一，已達到「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的境界，何者是真，何者是假，交錯在遊興之中難以分辨。類似這樣的遊道觀，明人費元祿也曾提出相類的觀點，他說：

夫遊道有三，曰天曰神曰人。天遊則形神俱化，神則意往形留，人則抗志絕俗，玩物彩真而已<sup>8</sup>。

費元祿的遊道與王士性極為相像，也是將遊道分為三：天、神、人三種境界，跟王士性相類的是：二人都將遊道分為三種層次，且內容幾無二致，又費元祿

<sup>5</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五嶽遊草·自序〉，《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7。

<sup>6</sup>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興大人文學報》，第三十六期，（2006年3月），頁 317。

<sup>7</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五嶽遊草·自序〉《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9。

<sup>8</sup> 明·費元祿《晁采館清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118，頁 119。

的年輩晚於王士性，因此我們可看出，王士性的遊道觀見解，對後人是有相當的影響性。

此外，王士性在闡明自己本身的遊道後，對於臥遊者提出了批評，他說：

乃以全歲六閱月，奔走塵鞅無休，時為平湖陳生、吳江沈生掩口胡盧我哉！獨此二十二朔中，尚得觀日岱宗，問天太華，嚙雪峨眉，尋真玄嶽，入棧出峽，走齊、梁、燕、趙、隴、蜀、荊、襄之郊，問奇吊古，無冥不搜；望遠登高，無遠不涉。遊情於境外，偷閒於忙中。足下竟當紅塵我耶？青山我耶？且今又當艤，上匡廬，騎黃鶴，醉嶽陽、泛洞庭、彭蠡，而後至蜀，則不佞足跡幾遍天下名山川，差勝兩生閉關掩臥斗室自多耳<sup>9</sup>。

這種「無冥不搜」、「無遠不涉」、「足跡幾遍天下名山川」遊歷精神，道出了遊道的實踐；而「差勝兩生閉關掩臥斗室自多耳」，則指出對於耽溺於臥遊者的貶抑<sup>10</sup>。對於屠隆的臥遊習氣，王士性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正悵不得與足下俱乃歸，不二日而足下以書至，至稱聞道後不復以名山洞府為念，繼之見坐一室即是九州。僕回首昨遊，真所謂肉視屍行，恍然自失也<sup>11</sup>。

對於屠隆「見坐一室即是九州」的臥遊方式，王士性在言辭中充滿了玩笑的口

<sup>9</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尺牘·寄陳伯符〉《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卷下，頁 597。

<sup>10</sup>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頁 317。

<sup>11</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尺牘·與長卿〉，《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卷下，頁 591。

吻，他認為遊就是要身體力行的親身遊覽才算是遊，兩人對於遊道的見解有所差別。

王士性另一層次的遊道思想，是他認為人與自然界是息息相關的，他說：

吾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無不於吾遊寄焉<sup>12</sup>。

這裡的「造化之變」指的是自然環境及變遷，而「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則是意味著環境與人文現象的變化。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之下，他注意到了地理環境影響人類活動甚鉅，人地思想就是由此衍生而出。

王士性的人文地理考察正是他獨到之處，有鑒於自從《漢書·地理志》以來，在地理的記載方面多半注重於疆域政治區域的沿革記載，少有提及文化、經濟、風俗、人地關係論述的研究，究其原因，乃是偏重於文獻的考證與口耳相傳，並無真正的實地考察。王士性認為地理分析必須要「皆身所見聞也，不則寧闕如焉」，而非是「藉耳為口，假筆於書」的寫作態度<sup>13</sup>。如此才能真正對於所見的事物和現象進行分析，做出對人文地理的精闢判斷。

明代雖然旅遊成風，但並非人人都是地理學家，面對同樣的大千世界，但所得的印象與收穫卻並不相同<sup>14</sup>，王士性當時已察覺此點，他在《廣志繹》自序中說：

夫六合無涯，萬期何息，作者以澤，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談玄

<sup>12</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五嶽遊草·自序〉，《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9。

<sup>13</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自序〉，《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38。

<sup>14</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前言〉《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9。

虛者，以三車九轉，而六藝之用衰；綜名實者，尚衡石鑄刑書，而結繩之則遠；攬風雅者，多花間草堂，而道德之旨弱；傳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軌殊<sup>15</sup>。

王士性自認與此四種人不同，他所重視的是地理現象。是如何將所見所聞紀錄下來，是一種求真求實的理念，是在親所見聞之後理論思維的發現，他要留給後世的不僅是紙上漫談而已，而是對於大千世界的真實記載。

### 三、王士性的「遊蹤」

王士性在《五嶽遊草》自述說：「少懷尚子平之志，足跡欲遍五嶽<sup>16</sup>。」好遊之心油然可見，在寫給友人的尺牘中說：「不佞棲遲海曲，無所事事，惟是宇內洞天福地，夢寐不忘<sup>17</sup>。」即使在漂泊失意之時，處於偏僻之處，對於「洞天福地」仍是念念不忘。或是：「數年懶慢，筋骨為驕，一旦風塵作客，磬折樽俎，漏三下，束炬行不休，魂搖搖其非我。此如老婦傅粉，醜態盡出，名利驅人可如是乎<sup>18</sup>？」王士性自述在官場上的應酬、名利爭奪並沒有讓他顯出疲態，此般醜態盡出的樣貌主要是久未出遊而致，有如魂不附體般。可見將「遊」視為是人生要事之一，並非只是以休閒娛樂的心態來面對，也不再是以抒情寫景的筆調來呈現遊記。他在〈五嶽遊草·自序〉中簡單敘述自己的遊蹤：

神州赤縣，五嶽為尊，太玄帝時，作配自今。瑤池寶軸，用秘真形。誰其竊之，負局先生。述五嶽遊。齊、魯、雍、冀，賢聖之鄉。大哉禹功，明德未央，金臺、易水，俠骨生香。梁園、鄴下，藝圃擅場。次大江南

<sup>15</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廣志釋·自序〉《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38。

<sup>16</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五嶽遊草·嵩遊記〉《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1。

<sup>17</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尺牘·寄吳伯與學憲〉《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604。

<sup>18</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尺牘·答忠父〉《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595。

北諸遊。岷汶萬里，其委三吳。再起天目，匯為太湖。蓊氣千年，作帝王都。嗟茲乎邯鄲乎臨淄，今之武林、姑蘇。次吳遊。若夫山川詭幻，兩越為多，天台、雁蕩，余即而家。東海三山，一葦可跂。洞天福地，越得十二。次越遊，青神故壘，白帝舊城。雪銷水漲，一日江陵。瞿塘、劍閣，自昔不守。蜀道雖云難，登天亦何有。次蜀遊。六千大楚，是稱江南。茫茫洞庭，七澤注焉。江、漢好遊，沅、湘習怨。指雲雨兮堪疑，望蒼梧兮不見。次楚遊。粵土疏理，四時多暑。高風揚塵，滇境咸春。碧簦玉筍，幻出桂林。蒼、洱昆華，兼產奇珍。次滇、粵遊。披圖九曲。是為武夷。幔亭雲氣，恍霏微。莽莽寰區，縱余所如。嗜而未食，惟閩荔支。俟將以閩遊終焉<sup>19</sup>。

這是王士性對其自身遊歷的概括，王士性的旅遊以萬曆五年中進士為界約略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進士之前的遊歷，這段期間王士性的遊蹤多半在於浙江一帶，主要有天台、金華、杭州等地。第二階段是王士性中進士後至萬曆二十六年，這段期間以宦遊為主，旅遊範圍遍及全國，這也是王士性旅遊的主要時期。

龔鵬程曾說：「遊，就必須在冒險涉奇之中，才能體驗出超絕流俗的快感，具有一種精神性的價值<sup>20</sup>。」因此自言「遇佳山川則遊」，對遊的態度是秉持著一種熱愛的執著，無論是否艱辛，他說：「余遊則不擇是。當其霜雪慘烈，手足皸瘃，波濤撼空，帆檣半覆，朝畏嵐煙，夜犯虎跡<sup>21</sup>。」儘管面對旅遊環境的險惡之時，王士性仍是抱以執著的態度來面對，並不會因為環境的舒適與否，就放棄旅遊，這是王士性的對旅遊所表現出來的熱愛態度之一。

<sup>19</sup> 明·王士性〈五嶽遊草·自序〉，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9-30。

<sup>20</sup> 龔鵬程《晚明思潮》，〈遊人記遊—晚明小品遊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 397。

<sup>21</sup> 明·王士性〈五嶽遊草·自序〉，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8。

此外，縱使在無所事事之時，對於「洞天福地」之名勝，仍是無法忘懷。《臨海縣志·王士性傳》稱其：

嘗以天地之英華，不能鬱悶而不宣之物，而為山川之人，而為文章，由是慕尚子平為人，有小天下狹九州之概。……公蓋無時不遊，無地不遊，無官不遊<sup>22</sup>。

由此可知，王士性好遊成性，藉著為官之便暢遊五嶽名山，朱國禎曾提到王士性是當時士大夫最善遊者：

近來士大夫所稱善遊者莫如臨海王公士性。公字恒叔，萬曆甲戌進士。五嶽具遍，皆有記，瑰麗可誦。性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雲、貴、廣西、四川皆遍。此四省，非五嶽所麗，而山水尤奇。不親履不嘗。不宦遊，亦不能履也<sup>23</sup>。

在王士性的仕途當中，是以「遊」來豐富自己的人生，從萬曆五年登進士後，利用在各地為官的機會，順道遊覽，除了福建未曾到達外，遊跡遍及明代的二都十二布政使司，若按現今的行政區劃分則是：浙江、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北京、山東、陝西、四川、廣西、廣東、雲南、山西、河北、貴州各省<sup>24</sup>。

<sup>22</sup> 明·王士性〈康熙·臨海縣志王士性傳〉，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358-359。

<sup>23</sup> 明·朱國禎〈己醜館選〉，《湧幢小品》，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7年，卷10，頁9。

<sup>24</sup> 王士性遊歷過的地方有：浙江的金華、縉雲、杭州、天目、太湖、天臺、雁蕩、四明、東湖、普陀、會稽；河南的確山、登封、嵩山、開封、南陽、昆陽、汝州、許昌、鄆城；江蘇的南京、蘇州、陽羨；安徽的休寧、白嶽、九華；江西的廬山；湖北的太和山（今武當山）、秭歸、夷陵；湖南的衡山；北京的西山；山東的孔林、曲阜、泰山；陝西的華山、寶雞；四川

王士性真正的廣泛遊歷是從萬曆五年登進士後開始，尤其是以萬曆九年至萬曆十九年間（1581-1591），為旅遊考察的高峰時期。由此可知，王士性畢生從事旅遊考察活動甚繁，且遊跡廣泛，曾到達雲南邊境之地。再者，王士性不僅是以旅遊為職志，他對社會民生的關懷也表現在他的遊記之上，在《廣志繹》中詳述地理與人文之間的相互關係，記載民情、風俗、經濟、物產，這顯示出王士性的旅遊並非只是隨興的遊覽，而是將遊記的書寫面向以更為多元的視角來呈現，關懷社會民生、與經世致用之學結合，是晚明文人在書寫遊記時新面貌的呈現。

---

的廣元，成都、仁壽、富順、嘉定、峨嵋山、犍為、敘州、瀘州、江津、重慶、長壽、涪州、忠州、夔州、三峽；廣西的桂林；廣東的肇慶七星岩；雲南昆明太華山、九鼎山、大理的點蒼山、賓川雞足山；山西的恆山；河北，貴州等地方。參照：徐建春、梁光軍著，《王士性論稿》，（浙江：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頁17。

## 第二節 地理與人文之間的相互關係

人文與地理的關係一直是建立在互為因果的關係之上，在人類為了求生存與發展的同時，必須不斷地擴大與改造環境，甚或是在現有的地理環境之上，在自身許可的條件之下去增強對地理環境適應的能力，企圖改變地理環境的面貌，因此，人地關係是一種動態上的關聯，地理環境影響人類活動甚廣，諸如各地的風俗、俚語、服飾、飲食、交通工具……等等的不同，皆是與地理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史上，地理學家試圖建構起各自的人地關係理論，如：地理環境決定論、生態適應論……等，早期中國也曾提出人地關係的觀念，如先秦時，《禮記·王制》曾提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穀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sup>25</sup>。」這段話充分顯示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

自然地理環境與人文活動其實是息息相關的，《禮記·中庸》孔穎達疏有言南北地理的差異是直接影響個人性情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南方謂荊陽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柔和，……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剛猛，恒好鬥爭<sup>26</sup>。

此處先將地域分為南北，再從南北不同的氣候環境中，清楚地說明了南北之地

<sup>25</sup> 《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頁247。

<sup>26</sup>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881。

的差異性，造成了居處當地的人性情皆不同，以陰、陽之別來說，不同的地理環境可孕育不同的人格特質，同時也指出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地域特性<sup>27</sup>。

其實人地關係的辨證一直存在於中國各典籍中，在不少的經典中皆有提到地理環境影響人類活動的理論，唐代的劉禹錫也在〈天論〉中主張人地相關，以為『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sup>28</sup>。」劉禹錫的天論固然是站在形而上的角度來看自然與人文的關係，但是其論點皆是認為：自然與人文是建立在相互影響的因果關係之上。

因此，人文與地理環境是無法切割的密切關係，無論是地理對於人性情的影響，或是直接地反映的生活習慣、風俗之上，亦或是在文學作品的風格表現之上，皆受到地理環境極大的影響。梁啟超則以為：「大而經濟、心性、倫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畫、遊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係<sup>29</sup>。」甚至在文學風格的表現上，也有著極大的差異性，如：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各為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蓋文章根於性靈，其

<sup>27</sup> 范宜如〈文學中的人地關係總論—以明代吳中地域為例〉，收入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研究》第四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頁148。

<sup>28</sup>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市：岳麓書社，2003年），頁987。

<sup>29</sup>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中國地理大勢論〉，（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頁708。

受四周社會之影響甚焉<sup>30</sup>。

此段文字乃是梁啓超分析南北文學風格的差異性，北人的性情較為剛烈，慷慨激昂；南人總是寫出放誕纖麗的柔懷之文，這必然是受到後天的地理環境影響所致，塞外的大漠風光與江南的柔媚水鄉，使得北人與南人有了不同的生命情懷與性格，因而寫出了風格迥異的文學形式。無論是在性格或是文學的表現之上，天人之間的關係，都呈現出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的一種和諧模式。

明末之時，王士性對於人地關係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他以一個紀實者的角度來分析人文與自然關係，身所見聞地在實地考察之後，對於所取得的材料做一統整，並加上自己的思維判斷，詳實地分析人文地理的現象，補充方志的缺漏與不足，能夠實地反映社會的民情風俗與生活。王士性以為：「吾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無不於吾遊寄焉<sup>31</sup>。」他認為「造化之變」指的是自然環境及其變遷，「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則是意味著社會、人文現象的變化。以此思想為前提，他特別注意觀察各地的地理環境、民俗風情、宗教文化、物產交通，並將各地的差異做精闢的分析<sup>32</sup>。明人的旅遊多以性靈漫遊為多，遊記書寫亦是以寫景抒情的文字居多，獨以王士性除了紀遊之外，亦並重人文現象的記載，誠是可貴之處。即便「環境決定論」的人地思想已在諸多史籍中被提及，王士性的人地關係理論卻仍是值得探討的。他以旅行者的姿態遊歷四方，將所見所聞紀錄下來，逐一分析地理與人文之間的相互關係，除了紀遊的書寫，也具有史料的價值。

<sup>30</sup>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啓超卷》，〈中國地理大勢論〉，頁 707。

<sup>31</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五嶽遊草·自序〉，《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9。

<sup>32</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前言〉，《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

### 第三節 《廣志繹》的人地關係論述

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各地的民情風俗皆不盡相同，這是與當地的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漢書·地理志》說：「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sup>33</sup>。」風是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而俗是教化結果，阮籍在〈樂論〉中說：「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sup>34</sup>」這就是說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之下產生的文化特徵謂之風，而文化特徵所因襲的習慣、行爲就是俗。

本節以《廣志繹》一書為討論對象，略論王士性在此書中的人地思想，探討氣候、地形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從居住、衣著、言語……等各方面可窺知所在地理環境，再加以王士性身所見聞的旅遊考察，在人文與自然之間做出了精闢的分析。

《廣志繹》寫於《五嶽遊草》、《廣遊志》之後，是王士性晚年時追憶昔日的遊蹤紀錄，將其遊歷心得記錄下來：「追憶行蹤，復有不盡於志者，則又為廣志而繹之，前後共六卷。」書成於萬曆二十五年，未及付梓，作者已辭世，此書內容非常多元化，多記載民情風俗、飲食、地方特色等，析論人類活動與自然間的相互關係，楊體元於〈刻廣志繹序〉一文中曾提到：

其志險易要害，漕河海運，天官地理，五方風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鳥

<sup>33</sup> 《漢書》，〈地理志〉，（台北：鼎文書局，1982年）卷28下，頁1640。

<sup>34</sup> 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樂論〉，頁82。

獸、藥餌方物、早晚燥濕、高卑遠近，各因時地異宜，悉如指掌<sup>35</sup>。

內容多是記載地理面貌、風俗習性、人文制度……等。是書分爲六卷，爲方輿崖略、兩都、江北四省、江南諸省、西南諸省、夷輯。《廣志繹》每卷首皆有一段對此卷的內容做簡要的說明，如〈江北四省〉：「周、宋、齊、魯、晉、衛，自古爲中原之地，是聖賢明德之鄉野，故皆有古昔之遺風焉。入境問俗，恍然接踵遇之，蓋先王之澤遠矣。」又如〈江南諸省〉前對江南之地的說明文字爲：「江南地拓自漢武帝，其初皆楚羈縻也，故楚在春秋、戰國間，其強甲於海內。余嘗至廣右而歎秦皇、漢武之功也<sup>36</sup>。」除了內文中對地理的論述外，在卷前也加入了歷史沿革的說明，兼論風土及其他<sup>37</sup>，不僅是析論人地關係而已，同時也交代了各地的歷史淵源。

## 一、自然環境影響人民生活方式的記載

王士性對於人文地理的關懷表現在他對於氣候、地形、植物的敏感度上，他認爲一個旅行者初到一個陌生之地時，最直接明顯感受到的是氣候、地形以及植物，王士性注意到四川的地形：

川中郡邑，如東川、芒部、烏撒、烏蒙四土府亡論，即重慶、夔府、……皆立在山椒水濱，地無夷曠，城皆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餘州縣一片真土，號稱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蓋岷、峨發脈，

<sup>35</sup> 楊體元《刻廣志繹序》稱王士性其人爲：「性好讀書，清福已具。歐陽子亦曰：物必聚於所好。……先生高才曠致，平生好遊，有五嶽遊草，有廣志繹，皆宦轍所至，耳目所睹記，其書已傳，世多有之。」詳見：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廣志繹》，〈刻廣志繹序〉，頁 234。

<sup>36</sup> 明·王士性著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江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23。

<sup>37</sup>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師大國文學報》，第 42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4。

山巉雜祖，滿眼石壠，抱此土塊於中，實天作之，故稱天府之國云。……  
今新都諸處，飛渠走澮，無尺土無水至者，民不知有荒草，故稱沃野千里。  
又江流清冽可愛，人家橋樑扉戶，俱在水上<sup>38</sup>。

王士性從地形來做判斷，因為地形的關係，多無平坦之處，因此居民多半居住在水上，只有成都一帶一片真土，又有水利之便，故有天府之國之稱，此段文字描寫當地的家居建築、生活習慣，利用當地現有的資源來建造適合環境的居處之地，因時地異宜，將自然環境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地域環境往往是影響人民生活習慣的主要因素，因地制宜或是就地取材從其房屋、穿著、言語等方面可清楚的看到，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記載了許多這類的例子，如：

東南饒魚鹽、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饒漁，西南饒金銀礦、寶石、文貝、琥珀、硃砂、水銀，南饒犀、象、椒、蘇、外國諸幣帛，北饒牛、羊、馬、羸、羗羶，西南川、貴、黔、粵饒榷柁大木。江南饒薪，取火於木，江北饒煤，取火於土。西北山高，陸行而無舟楫，東南澤廣，舟行而鮮車馬。海南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惡其羶，河北人食胡蔥、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sup>39</sup>。

自然環境的差異導致了各地物產的不同，不同的地方產出不同的農作物，人民通

<sup>38</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西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70-372。

<sup>39</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方輿崖略〉，《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39。

常是就地取材為多，且多因地制宜來選擇職業，選擇利於自身的地理環境來發展，王士性認為生活習慣的不同乃因「水土積習」，身處其環境中不自覺，乃因地理環境所致，這是不能勉強而得的。因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影響人們的飲食習慣，進而也顯現在個人的體質、外貌上，王士性曾以晉中人為例來說明

晉中俗儉樸，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棗，故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紅顏白晳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堅勁，而少溼鬱微腫之疾<sup>40</sup>。

這段文字首先說明了山西商人個性質樸節儉，即使是千百金之家，也不會在物質生活上多做花費。其次，分析飲食習慣造成體態的特徵，食物以棗、羊為主，故齒黃體健，而膚色多黯黑則是因其地北風凜冽所致。王士性由地理環境、飲食習慣來推敲人民的體態特徵，足以顯示出地理環境影響了人們的飲食，進而飲食習慣又影響了人的外貌與體型，層層相關的因果關係都說明了人文與地理的密切關係。

另外，王士性又依照地質的特性分析出各地農作物的不同：「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溼，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麥、菽，天造地設，開闢已然，不可強也<sup>41</sup>。」南北方不同的氣候，造成不同的土質而有不同的農作物，對於這樣的自然現象王士性是抱持著不能強求的態度。

<sup>40</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江北四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12。

<sup>41</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兩都〉，《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59。

## 二、依自然環境劃分生活區域

王士性認為風俗習慣的不同，是因為地理環境的不同，因此他將浙江按照風俗習慣的差異分為浙東和浙西兩大地理區域，他先在《廣遊志》一書中點出浙東與浙西這兩大區域奢靡情況的不同：「浙西澤國無山，俗靡而巧近蘇、常，以地原自吳也；浙東負山枕海，其俗樸，自甌越為一區矣<sup>42</sup>。」在《廣志釋》中則是深入討論兩地的不同：

兩浙東西以江為界而風俗因之，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鞶  
悅，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鮮衣怒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東俗敦  
樸，人性儉嗇椎魯，尚穀淳風，重節概，鮮富商大賈。而其俗又自分為三：  
寧、紹盛科名逢掖，其戚裏善借為外營，又傭書舞文，競賈販錐刀之利，  
人大半食於外，金、衢武健負氣善訟，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溫、處山海  
之民，獵山漁海，耕農自食，賈不出門，以視浙西迥乎上國矣<sup>43</sup>。

浙西的生活型態較為奢靡；浙東質樸，少有富商大賈，二地僅隔江而風俗異之。王士性又將浙東分為三個不同的區域，「寧、紹盛科名逢掖」說明瞭寧波、紹興一帶的科舉人才特別多，紹興自古以來就是個文風熾盛的地方，文人倍出，讀書人甚多，從事舉業的人比其他地方為多。王士性的人地分析也似乎呼應了浙江民諺所說：「一百秀才莫歡喜，七個貢生三個舉，四十五個平平過，四十五個窮到底。」這說明了浙江一帶讀書人特別多，想要在科舉考試中出人頭地並不容易。而金、衢一帶之人好善訟，在健訟之風盛行之下，「民間稍失意則訟，訟必求勝，不勝必翻。訟之所爭甚微，而枝蔓相牽，為訟者累十數事不止<sup>44</sup>。」

<sup>42</sup> 明·王士性〈廣遊志·形勝〉，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13。

<sup>43</sup> 明·王士性〈廣志釋·江南諸省〉，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23。

<sup>44</sup> 謝國禎選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427。

故金、衢多出六郡材官之人。而台州、溫州之人由於地處山海之間，因此以山獵海食為生，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圈子。

再者，王士性又依據地理環境和風氣的差異，將兩浙的居民分為澤民、山谷、海濱三類，是依照所居之地的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生活習慣：

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驚惶，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sup>45</sup>。

王士性認為這三類居民各自為俗，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發展出了不同的人文氣息、風俗習慣以及價值觀念，山谷之民尚武風氣最濃，澤國之民尚武風氣最弱，而海濱之民則居其間。從這段引文可看出：在王士性的人地關係的思想中，他將人類的活動差異，皆以地理環境的不同來解釋，是一種地理對文化的直接影響關係，由是可知：當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無法改變時，身處其地的居民自然會改變自身的生活型態，以尋求生活上的舒適，久之則形成了當地的文化特色，而這文化特色則是不可強求而來，是自然所致<sup>46</sup>。

<sup>45</sup> 明·王士性〈廣志釋·江南諸省〉，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324。

<sup>46</sup> 西方曾提出類似地理劃分法的是黑格爾，在其著作《歷史哲學》中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概念，他將世界劃分為高地、平原、濱海三類地區，指出這三類地區的居民由於地理環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性格、習俗等。參見：王造時譯，黑格爾著《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9月），頁94-95。

## 第四節 《廣志繹》的人地關係論述—民情風俗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在人文與地理相互之間的辨證之上，各地民情風俗的不同來自於環境上的差異所致，本節以民情風俗的討論為主，探討《廣志繹》中記載的民情，以釐清地域特性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 一、特殊民情風俗的紀錄

王士性對於某地較為特殊的風俗民情也有所記載，如：浙江有個特殊的社會階級稱為「惰民」：

紹興惰民，謂是勝國勳戚，國初降下之，使不與齊民列。其人止為樂工、為輿夫，給事民間婚喪。婦女賣私窩，侍席行酒與官妓等。其旁業止捕鱔、釣水雞，不敢干他商販。其人非不有身手長大、眉目姣好與產業殷富者，然家雖千金，閭里亦不與之締婚，此種自相為嫁娶，將及萬人，即乞人亦凌虐之，謂我貧民非似爾惰民也。……愚嘗為歎息之，謂人生不幸為惰民子孫，真使英雄無用武之地<sup>47</sup>。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也曾敘述浙江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訛為此稱。其人在里巷間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僧之屬，其妻入大家為

<sup>47</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江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28。

櫛工<sup>48</sup>。

由此二段記載看來，「惰民」其人既非丐，也非貧，由於是不務農、工、商、賈等正當職業，故被視為「遊手遊食」之人。惰民其實有自己的職業，不過多與音樂和色情有關，如男子為樂工、輿夫、給事婚喪嫁娶；女子多為賣藝、賣身、給事行酒張燕。且惰民的身分是為法定的，世代不得更改，因而男不許讀書、不得為官；女不許纏足，不得與良民通婚。至萬曆間，浙江寧波、紹興八府的惰民已將及萬人，形成一個相當具有影響力的社會群體<sup>49</sup>。

王士性特將惰民的分布與特徵記載下來，除了可觀風俗外，更可體驗當時的庶民生活，亦可得知社會群體的分布，如他認為人才的分布也與地理環境有密切的關係：

江北山川彝曠，聲名文物所發洩者不甚偏勝，江南山川盤鬱，其融結偏厚處則科第為多，如浙之餘姚、慈谿，閩之泉州，楚之黃州，蜀之內江、富順，粵之全州、馬平，每甲於他郡邑。然文人學士又不拘於科第處，嘗不擇地而生，即如國初劉伯溫以青田，宋景濂以浦江，方遜志以寧海，王子充以義烏，雖在江南，皆非望邑。其後，李獻吉以北地，何大復以信陽，孫太初以靈武，李于鱗以歷下，盧次楨以濮陽，皆在江北。然世廟以來，則江南彬彬乎盛矣<sup>50</sup>。

對於江南與江北的科舉人數多寡，王士性有其獨到的觀察與分析，他先將科舉人

<sup>48</sup> 明·沈德符〈風俗·丐戶〉，《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卷24，頁624。

<sup>49</sup>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16。

<sup>50</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方輿崖略〉，《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243。

才的分布以長江爲界分爲兩大區域，再來分析科舉人才多寡的成因。在江北、江南的「彝曠」和「盤鬱」的地理環境差別下，也影響到科舉人才的多寡，這或許是當文人因久處於山川美景之中，進而間接影響人格性情，而形成了當地科舉人才繁多之因。地理環境的確是科舉人才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並非是絕對，因此王士性又加以補充說：「然文人學士又不拘於科第處，嘗不擇地而生。」無論是江北或是江南，皆有名人出現，某些地方出現的人物雖非是望邑，但已可看出江南地區已形成一個文人階級的社會群體。

## 二、婦女社會生活的描寫

《廣志繹》書中常有對婦女的著墨，且是以不同的面向來紀錄，這也反映出了明末社會的婦女自我意識已有別於以往，過去深居簡出的生活，出門乘車乘轎，至明末時已敢拋頭露面，出遊取樂，王士性於書中記載：

都人好遊，婦女尤甚，每歲，元旦則拜節。十六過橋走百病，燈光徹夜。元宵燈市，高樓珠翠，鞞擊肩摩。清明踏青，高梁橋盤盒一望如畫圖。三月東嶽誕，則耍松林，每每三五為群，解裙圍松樹圍坐藉草呼盧，雖車馬雜沓過，不顧。歸則高冠大袖，醉舞驢背，間有墜驢臥地不知非家者，至中秋後，遊蹤方息<sup>51</sup>。

此段寫婦女出遊的景象，從元旦拜節、清明踏青、到中秋賞月，且婦女每每三五成群於松樹下圍坐聊天，不顧旁人眼光。

這顯示出明末婦女已擺脫過去傳統的禮教束縛，勇於參與社會活動，甚或是

<sup>51</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兩都〉，《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58。

生產事業，從事事業生產已非男性的專利，女性同樣也可以走出閨房，有自己的工作，如王士性記載到廣東邊緣地區的鄉村有此現象：

永近粵，鄉村稍雜以夷獠之俗。男子衣裙曳地，婦女裙褲反至膝止，露骭跣足，不避穢污，著草履者其上也。首則飾以高髻，耳垂大環，鑄錫成花，滿頭插戴。一路鋪遞皂快、輿夫、馬卒之徒，皆以婦代男為之，致男女混雜戲劇，官不能禁<sup>52</sup>。

在此地男女性的裝扮有異於中原地區，婦女裙褲反至膝上，且不避汗穢地直接以腳著地，所承擔的生產工作如皂快、輿夫、馬卒之徒，皆是婦女代替男性來從事。這一個面向顯示出婦女不再只是在家中從事女紅、相夫教子，進而也可從事社會生產工作，養家活口已非是男性的責任了。這種現象在《徐霞客遊記》中也有提及：「飯後夫至，少二名，以婦人代擔<sup>53</sup>。」婦人可代替男性為挑夫，這種以往被認為是男性該做的粗活工作，在南方社會已不復見<sup>54</sup>。與中原漢民族社會中的婦女比較起來，王士性對此是以一種奇特的眼光來看待，末句以「官不能禁」來做結，顯示出在王士性心中仍以「正統」的中原漢民族來看待異族的生活模式。

謝肇淛也曾描述了明末「女詐為男」的情況：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

<sup>52</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江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53。

<sup>53</sup> 明·徐霞客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6 月）頁 492。

<sup>54</sup> 南方民族中「女勞男逸」的現象其實廣泛存在南方社會中。宋人曾記當地民俗：「余觀深廣之民，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女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墟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為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參見：宋·周去非〈蠻俗門·十妻〉，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 10，頁 429。

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陵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販香為業，恐其無依，詭為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為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為火伴，同臥起三年，不知其為女也<sup>55</sup>。

畢竟在傳統社會中，女子的行動受到一定的限制，於是許多女子便女扮男裝以易於行事。由是可知，明代南方的婦女對於社會活動的參與是很直接的，甚至已可代男職，從事商業或是勞力的工作。

另外一個對婦女著墨的面向是描述婦女被物化的處境，俗稱「養瘦馬」的風俗，廣泛流行於揚州一帶，甚至出現了專有的稱謂—「揚州瘦馬」，王士性記載：

廣陵蓄姬妾家，俗稱養瘦馬，多謂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婦人，而必於廣陵者，其保姆教訓，嚴閨門，習禮法，上者善琴棋歌詠，最上者書畫，次者亦刺繡女工。至於趨侍嫡長，退讓儕輩，極其進退淺深，不失常度，不致慙慙起爭，費男子心神，故納侍者類於廣陵覓之<sup>56</sup>。

「養瘦馬」的風氣盛行於揚州之間，男子想要納妾者，必到揚州一帶尋覓，因為揚州所出的瘦馬既有婦人必備之色，也有琴棋、廚藝之技，而從小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在成人之妾後如何維持家庭的安寧，應對近退之態非常得宜<sup>57</sup>。張岱則是具體地描述了「瘦馬」的販賣過程：

<sup>55</sup>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130，頁 484。

<sup>56</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兩都》，《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271。

<sup>57</sup>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3 月），頁 171。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駟儈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撩撲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不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

58。

張岱此段文字詳述瘦馬交易的流程，貴官公子只要一到揚州城上，稍稍透露娶妾的意思，牙婆駟儈就會咸集其門，如蠅附身，之後將瘦馬一一給貴公子品味一番，再決定是否購買。此種將女性販賣的交易過程充斥在揚州城間，這其實完全是爲了滿足納妾者需求的一種專業生產。沈德符曾描述廣陵姬是被教以「自安卑賤，曲事主母，以故大家妒婦，亦有嚴於他方，寬於揚產者<sup>59</sup>。」即使是大家心中的妒婦，也會對揚州所出產的瘦馬較爲寬恕。這是一種將女性物化的風氣，將女性定位在「功能趨向」中。王士性以「揚州瘦馬」來描寫揚州的特殊風氣，也可看出南京已走入一個消費性社會中，人口的買賣儼然已成常態，不足爲奇了。

從《廣志繹》的記載中可以看到王士性對於婦女社會生活的著墨，是呈現出多元的不同面向，在同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居處於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也有不同

<sup>58</sup> 明·張岱〈揚州瘦馬〉，《陶庵夢憶》，（台北：台灣開明書局，1978年）卷5，頁75。

<sup>59</sup> 明·沈德符〈廣陵姬〉，《萬曆野獲編》，卷23，頁579。

的命運，都市婦女可以在節日中出遊取樂；而在偏遠地區的婦女，卻必須從事生產工作以養家活口，書中對婦女不同生活方式的描寫，極為深刻。

### 三、紀錄西南文化

自古以來，西南之地即常被冠以「蠻」、「夷」等字來稱呼之，不管是在生活習慣、氣候、物產以及飲食上，都迥異於中原之地，以人口組成的多元性和生活型態來說，常被視為蠻荒不毛之地，宋人周去非嘗記載：「蠻夷人物強悍，風俗荒怪，中國姑羈縻之而已。其人往往勁捷，能辛苦，穿皮履試上下山如飛<sup>60</sup>。」王士性在《廣遊志》中也說到：「西南萬里滇中，滇自爲一國<sup>61</sup>。」在王士性的區域劃分的思想中，他將雲南劃分爲另一國，可見是有其考量的，在文化、經濟、民俗風情皆爲不同的情況下，邊境之地的文化與治理，無非形成了一個探奇之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原漢民族對西南蠻夷之族是抱持著畏懼、奇異的眼光來看待，故只能以懷柔羈縻來治理。

王士性在萬曆十八年至二十年（1590-1592）時，曾以按察司副使兵備雲南瀾滄衛，雲南是他遊歷中的最後一站，在雲南爲官的這兩年，是王士性畢生遊歷中最爲特殊的經歷，或許也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有別於江南水鄉澤國的秀麗風景，王士性稱西南之地爲「夷漢雜處」，他在〈西南諸省〉前對其說明爲：

蜀、粵入中國在秦、漢間，而滇、貴之郡縣則自明始也。相去雖數千年，然皆西南一天，為夷漢雜處之地，未盡耀於光明，故以次於江南<sup>62</sup>。

<sup>60</sup> 宋·周去非〈蠻俗門·蠻俗〉，《嶺外代答校注》，卷10，頁413。

<sup>61</sup> 明·王士性〈廣遊志·形勝〉，《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212。

<sup>62</sup> 明·王士性〈廣志釋·西南諸省〉，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368。

在王士性的這段說明文字中可看出：他將西南與江南劃分為兩個不同的地域，雖同樣為大明國土，但對其人口組成稱為「夷」，這是以漢民族的正統觀點來看待未開化地區的文化，是一種開發與未開發的二元劃分。

王士性在書寫西南諸省的地形時，往往是與個人的家鄉—江南來做比較<sup>63</sup>，他說：

江南雖多山，然遇作省會處，咸開大洋，駐立人煙，凝聚氣脈，各有澤藪停蓄諸水，不徑射流。即如川中，山纔離祖，水尚源頭，然猶開成都千里之沃野，水雖無瀦，然全省群流總歸三峽一線，故為西南大省<sup>64</sup>。

此段文字是以江南和四川來做一比較，四川之所以為西南大省是因全省河川的支流，皆匯聚三峽一線，水利之便，故為天府之國、西南大省。王士性在面對異地的景象時，往往還是會以自己的成長經驗來看待異地景觀。

身處異地時，對旅遊者來說最明顯的感受即是文化的不同，面對著完全不同於中土的異地文化，王士性對此有詳細的描寫，如他在記述西南地區的蠱術時，是以一種恐怖、怪異的心理來看之，如：

蠱毒，廣右草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蜥蜴、蝮蛇，食而中之，絞痛吐逆，面目青黃，十指俱黑。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生活魚，食雞則腹生活雞。驗蠱法，吐於水，沉不浮，與嚼豆不腥，含礬不苦，皆是<sup>65</sup>。

<sup>63</sup>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師大國文學報》第42期，2007年12月，頁132。

<sup>64</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西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379。

廣南守為儂智高之後，其地多毒善瘴，流官不敢入，亦不得入。其部下土民有幻術，能變貓狗毒騙人，往往爰書中見之，然止以小事惑人，若用之大敵偷營劫寨，未能也。有自變，亦有能變他人者。此幻術迤西夷方最<sup>66</sup>。

王士性對於「蠱術」的記載非常詳實，從蠱術以昆蟲、動物為材，到對於人體的變化，絞痛吐逆，這是王士性對異地文化的寫實記載，以一種奇異的眼光來看待當地的蠱術文化，或許站在當地居民的立場，蠱術是當地特有且正常的文化，不以為奇，但是在文化上的差異確實是帶給旅遊者不同的異地感受。

除了對西南異文化的著墨以外，《廣志繹》中也對西南的採礦事業有所記載，由於雲南的礦產豐富，因此採礦事業在滇中為甚：

採礦事業惟滇為善。滇中礦硯，自國初開採至今，以代賦稅之缺，未嘗輟也。滇中凡土皆生礦苗。其未成硯者，細民自挖掘之，一日僅足衣食一日之用，於法無禁。其成硯者，某處出礦苗，其硯頭領之，陳之官而準焉，則視硯之大小，召義夫若干人。義夫者，即採礦之人，惟硯頭約束者也。……每日義夫若干人入硯，至暮盡出硯中礦為堆，畫其中為四聚瓜分之：一聚為公費，則一切公私經費，硯頭領之以入簿支銷者也；一聚為硯頭自得之；一聚為義夫平分之。……他省之礦，所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滇中之礦，所謂「積兔在市，過者不顧」也，採礦若

<sup>65</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西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83。

<sup>66</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西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91。

此，以補民間無名之需，荒政之備，未嘗不善<sup>67</sup>。

王士性此段記載了雲南採礦業的淵源歷史、開採的方式，以及工人收入的微薄，若未成「硎者」，則一日所得僅能滿足一日之食，道出了採礦者不平等的待遇及社會效益的不公。

此外，商人爲了追逐利益，甚至遠及西南產木、產礦的地方，而且是以江西商人爲多，只要有村落聚集的地方，皆有江西商人，因而王士性說：「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然爲土人之累亦非鮮也<sup>68</sup>。」因爲江西商人的關係，滇雲地區形成了比較繁榮的居住地，這也顯示出了一種物質文明的對比現象，當商人爲了要謀取利益時，可以遠到西南僑居經商，這是商人爲了追求市場利益而做的選擇，是以市場爲指標的，對於西南未開化之地來說，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上的商業利益，在這利益的導向之下，形成了一種供需的關係，卻也是物質文明與蠻夷之地的對立。

在王士性紀錄西南異文化的文字中，他並沒有對西南的文化做出任何的貶抑與批判，反之是以一個第三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待文化上的差異，詳實的記載下來，或許身在異地時，無論是在飲食或是服裝上的感受，對王士性來說都是一種驚艷與奇異，面對這文化上的差異與衝突，是以一種平等的角度來對待異文化，在文字的紀錄上，王士性並沒有透露出貶抑的文句。

---

<sup>67</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西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85。

<sup>68</sup>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廣志繹·西南諸省〉，《王士性地理書三種》，頁 386。

## 第五節 小結

《廣志繹》一書的內容有別於我們對於傳統遊記的認知，它結合了地學的考據書寫，遊記不再只是單純的隨筆抒發心情、描摹風景，轉而將地理考察也置入遊記之中，詳實紀錄當時的人文現象與生活型態。晚明文人熱衷於旅遊之事，但並非人人皆是地理學家，諸多晚明遊記的關注焦點是在於心情上的抒發，或是對山水景物的描繪，是一種吟風弄月的性靈漫遊，少有兼具考察的紀實性遊記。因此，藉著對《廣志繹》的討論，企圖將晚明的遊記寫作推向一個更為多元的視角，使得遊記的寫作不再僅是文學性的表現，進而可與地理學、實用之學結合起來，甚或是補充史料的闕如。《廣志繹》的寫作的確帶給了讀者不同的閱讀感受，將自然與人文的關係結合起來，是王士性的主要遊記書寫內含。在這真實考察的文字記載之下，讓我們也可重新思辨遊記的定位趨向，不再將遊記以文學性的美感來看待，也可以地理學、地志的面向來看之，這是晚明遊記的一個新氣象，也是在遊記的寫作方式上，值得去重新審思另外一個多元性的視角。

## 第四章《徐霞客遊記》對社會的關懷書寫

遊記的書寫往往有著多元的面向與焦點，對一個旅遊者來說，文字的呈現即是本身在行旅過程中所關懷的事物，晚明文人極為熱衷旅遊之事，在這社會的氛圍之下，人人皆可是旅行家、紀遊者，但是對於每個旅行者來說，體驗世界的感受不同，紀遊書寫也會有不同的呈現。在第三章已經討論過王士性《廣志繹》中人文地理的思想，顯示出在晚明時期，除了文人的性靈漫遊外，王士性的遊歷呈現出了另一種遊歷精神。時隔四十年，徐霞客以壯遊來實現自我的人生理想，他的遊歷過程是以性靈遊，以軀命遊，有別於傳統文人的遊記寫作，徐霞客以日記體的寫作方式，以紀實、分析的筆法，完成遊記。故本章以《徐霞客遊記》為討論中心，以《徐霞客遊記》中對社會、民生、風俗、經濟……等的書寫面向為主軸，試圖勾勒出遊記中另一個對社會關懷的書寫面向，探討徐霞客的遊歷精神，以突顯出徐霞客在遊記文學的地位上，是跳脫傳統的遊記寫作方式，不再僅是對於己身的情緒抒發，借景寓情而已，重新賦予《徐霞客遊記》在晚明遊記中，一個新的時代意義。

### 第一節 徐霞客及其實學思想

徐霞客生長於一個環境優渥的家庭中，雖不是代代為仕宦之家，但也是書香世家的門閥子弟，徐霞客性好讀書、積極進取的樂觀個性，與其家世背景和母親的開明教導有關。因此，本節以探討徐霞客的家世背景以及實學思想為主，透過這二者的討論，試圖勾勒出徐霞客其人的風貌。

## 一、徐霞客的生平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sup>1</sup>，字振之，號霞客，明直隸江陰金風南陽岐人（今馬鎮鎮南陽岐村）。

江陰古稱「暨陽」，又有「延陵古邑」、「春申舊封」之稱，是吳文化的發祥地，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年歷史<sup>2</sup>。江陰地區資本主義的萌芽及其發展，對徐霞客有很大的影響，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也使生長在大江四海邊的徐霞客萌發了「溯流窮源」之志<sup>3</sup>。生長環境對徐霞客的性格養成有很大的影響力。

徐霞客與封建社會中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不同。他生活在科舉考試盛行的時代，有家世背景的人，都追求科舉考試來入仕升官，尤其徐霞客是生長在江南富庶的地區。然而徐霞客並不走仕途官宦之路，也沒有刻意經營產業、累積財富，他卻離開書齋，走向大自然，終其一生以旅遊探險、地理考察為志<sup>4</sup>。

## 二、實學思想的淵源

### （一）東林書院實學思想的啓蒙

徐霞客與東林書院人高攀龍、文震孟、黃道周、陳仁錫、沈應奎、孫慎行等交往甚密，影響了他的思想，也促成了他壯遊的開始。

---

<sup>1</sup> 清刻《遊記》時避乾隆皇帝弘曆諱而改弘為宏。

<sup>2</sup> 江陰是個文明古城，自從戰國春申君起，江陰就已經出現了港口雛形。盛唐時期已經是遠近舳艫相繼，四方市客不絕的重要港口，對日本、朝鮮、東南亞進行通商貿易的重要口岸。宋代就在江陰設置了長江沿線唯一的「市舶司」，專司管理海外商人貿易，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埠。

<sup>3</sup> 朱鈞侃、倪紹祥主編《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頁70。

<sup>4</sup> 朱惠榮著《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月），頁90。

東林黨的主張是知行統一，反對知行合一，堅持心與理有區別，他們提倡悟與行結合的道德學說<sup>5</sup>。徐霞客對山川文物的記述，實事求是的精神應來自於東林黨人的影響。從徐霞客的詩文集中，可看出徐霞客與東林黨人交往密切的關係。徐霞客母親壽辰時，有許多東林書院人寫作詩文為其祝賀，高攀龍（1562-1626）曾作〈題秋圃晨機圖〉詩相贈、孫慎行（1565-1636）、文震孟（1574-1636）作〈題秋圃晨機圖壽徐母王孺人〉，與徐霞客交往甚密的黃道周（1585-1646）更常有書信上的往來。或是陳仁錫（1582-1636）、孫慎行其他東林黨人也時有交往，陳仁錫在〈晴山堂記〉中記錄了晴山堂的建造緣由，也在石刻中替其母親王孺人寫墓誌銘，其中詳述了徐霞客母親的生平、性情等事。

徐霞客與東林書院人的交往並非偶然，徐霞客的家鄉在江蘇省江陰，與無錫的東林書院毗鄰，來往非常方便，儘管他沒有直接參與東林黨反對魏忠賢支流的鬥爭，也並非是東林黨的成員，但是東林黨人的政治思想與處事態度，確實是對徐霞客影響極深，他雖然並沒有表明政治立場，但是在思想感情上是支持東林黨人的作法，這在他自己的遊記中也有提到，在記述江西吉安白鷺洲書院的興衰時，指出此書院被魏忠賢所毀，表達了他對魏忠賢的憤恨與不滿，在〈浙遊日記〉「是院創於宋，至世廟時郡守汪受始擴而大之。熹廟時為魏黨所毀，惟樓閣未盡撤<sup>6</sup>。」在〈隨筆二則〉中寫說「時魏黨專政，下調停旨，而啟元愈猖狂不可制。<sup>7</sup>」他認為魏忠賢的專政是西南地區邊患的主要根源<sup>8</sup>。

<sup>5</sup> 朱鈞侃等著《徐霞客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頁346。

<sup>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江右遊日記〉，頁154。

<sup>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隨筆二則〉，頁1132。

<sup>8</sup> 朱鈞侃等著《徐霞客評傳》，頁347。

## （二）經世致用思想的啓發

經世致用的學問有二顯著的特點：一是躬行實踐，不尚空談；二是格物致知，廣求博學<sup>9</sup>。徐光啓（1562-1633）更是認為：「方今時勢，實須真才，真才必須實學，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sup>10</sup>。」徐光啓以為晚明時局的紊亂情勢，唯有尋求一條經世致用的道路，將空談的虛浮以實際的作為來力挽狂瀾。在晚明的實學思潮中其實已可以看出民主思想的內容，東林黨人是以「利國益民」的思想為政治原則來與魏忠賢抗衡，黃道周也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因此，晚明雖是個旅遊盛行的朝代，遊記的形式也多半是屬於小品文的寫作方式，但是晚明經世致用思潮的興起，也影響了徐霞客寫遊記的形式與內容，《徐霞客遊記》的寫作方式有別於一般小品短文的書寫，而是以日記的形式詳細記載每一天的遊歷路程以及地形風貌，是一本遊記書，也可說是一本地志書寫的地理書籍。

徐霞客與同時代的有名科學家李時珍、徐光啓、方以智等人互相輝映，這並非是偶然的巧合，是時代風氣的導引而有了這些科學考證之作的出現，是經世致用思想的表現，丁文江先生說：

先生（徐霞客）所處之時，當明之末，學者病世儒之陋，捨章句而求實學，故顧亭林、王船山、黃黎州輩，奮然興起，各自成家，遂開有清樸學之門。然霞客先生，生於顧、黃、王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勤，求知之真摯，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然則先生者，其為樸學之真祖歟？又先生生於明季，遊滇之時，天下已亂。觀其小記諸則，述當日政事甚詳，

<sup>9</sup> 朱鈞侃等著《徐霞客評傳》，頁3。

<sup>10</sup> 明·徐光啓〈與胡季仍比部〉，《徐光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卷10，頁472。

知先生非不關心時局者<sup>11</sup>。

丁文江先生指出徐霞客處於明末亂世中，在學者詬病空談之鄙時，轉往尋求實學之道，於是顧炎武、王夫之、黃黎州之人，各成一家之說，於是開啓了清代樸學之門，徐霞客生於顧炎武、王夫之、黃黎州此三人之前，性格求真求知，講求真理，故當之為樸學之祖。再者，丁文江先生提到：徐霞客在西南之遊時，天下已亂，細觀西遊日記，除了詳述遊蹤外，對於朝廷政事的記載，也非常詳細，可以知道徐霞客對於時局也是抱以關心的態度。雖然《徐霞客遊記》是以日記體遊記的形式呈現，但《遊記》的內容多以考察實證為多，可視為是當時代重要的地志書寫鉅作。

徐霞客一生經歷了萬曆、天啓、崇禎三個朝代，他生活的時代是明王朝處於急速變動的大混亂時期，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徐霞客雖非朝中之人，但他透過自身的實踐，研究大自然的奧秘，試圖透過這一條道路，留給社會一個無價的瑰寶，他並非不關心時政，只是他選擇了不抨擊時政的激烈手段，而走向大自然，紀錄這塊土地的一切，以另一種遊歷精神，來實現自我的人生理想。

### 三、交遊關係

丁文江先生在其《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譜》一書談及徐霞客的交遊狀況，剖析極為明白：

先生之交遊大半與文（文震孟）陳（陳仁錫）有關，蓋先生雖出世家，然少年喪父，且為布衣，又「不屑謁豪貴博名高」，即陳眉公亦於天啟

---

<sup>1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重印徐霞客遊記及新著年譜序〉，頁 1282。

甲子後始相識，惟文震孟之祖徵明與先生高曾祖往來，故為世交。陳與先生之岳羅濟之為姻戚，故交甚早，亦甚密。先生友人中，如黃道周、鄭鄮、文安之、鄭之玄、謝德溥、黃景昉，均天啟二年進士。殆皆由於文陳二人之介紹，又因黃道周故，而多識閩人，如張燮、林鈺、何楷、劉履丁（即介紹先生於錢牧齋者）皆漳州人，黃克瓚、張瑞圖、何喬遠、鄭之玄皆泉州人，曾楚卿，莆田人，曹學佺，侯官人，陳函輝亦黃道周弟子，蓋黃為閩中大師，極重先生，先生之叔日升，又為漳州推官。故先生入閩，得遍識當時名士，其餘如楊汝成、何楷，均天啟五年乙丑進士，與日升同榜，劉若宰曾宦於閩，朱大受、方拱乾，皆劉之同年。周延儒與先生足兄仲昭幼年同塾，謬昌期、夏樹芳、許學夷，張育葵皆先生同邑。高攀龍與謬為至友，至於李維楨、范允臨、孫慎行、沈應奎、李流器、姜逢元、陳繼儒、張大復、王思任、米萬鍾皆以詩文書畫負盛名，雖以友自居，而實則先生之前輩也<sup>12</sup>。

丁文江先生將對於徐霞客的交遊狀況記載非常詳實，我們可以看到徐霞客所交往的對象多為當世的耿直之人，陳繼儒在〈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大壽敍〉中，讚譽徐霞客說：「詩文沉雄典麗，而不屑謁豪貴，博名高<sup>13</sup>。」王思任在〈徐氏三可傳〉也稱道：「弘祖頹而黯，揖羞官，口羞阿堵<sup>14</sup>。」由友人的紀錄中我們可以知道，徐霞客的性情耿直不阿，不喜攀附權貴，這或許與他放棄了科舉之路有關，從他與當代文人所互贈的詩文中可知他的交遊廣闊，且多為真性情之交往。與黃道周互相贈答的詩文中，可看見黃道周對徐霞客讚譽有加，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一詩中說道：

江陰徐君杖屨雄，自表五岳之霞客，鳶肩鶴體雙瞳青，汗漫相期屢不失，

<sup>12</sup> 丁文江撰《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28。

<sup>1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敍〉，頁1236。

<sup>1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敍〉，頁1259。

事親至孝猶遠遊，欲乞琅玕解夜織<sup>15</sup>……。

此詩表達對徐霞客的奇情異趣讚美，以及對紛亂世道的感慨，事親至孝，卻仍決定遠遊。被陳仁錫讚譽為兩絕「霞客著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sup>16</sup>。」當徐霞客與世長辭之時，黃道周寫下了〈輓徐霞客〉一詩，感慨徐霞客的逝世令十洲五岳都哀傷揮淚，亦在〈遺奠霞客寓長君書〉中表達自己的情感：「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獨有尊公<sup>17</sup>。」讀來情感真摯，深感二人情誼之深厚。二人更以〈孤雲獨往還〉為題共同賦詩吟詠，這是兩人在崇禎五年時泛舟洞庭時所賦之詩，可見情誼非同一般，徐霞客在〈賦得孤雲獨往還〉一詩中第二首寫道：

為靈並為電，瀾天總是雲；誰能繪霄漢，了不作氤氳？捧日開朝霽，飛霞散夕曛。此中無一繫，何處著紛紛？<sup>18</sup>

此首詩寫出黃道周在政治環境中不得志之慨。黃道周是朝中重臣，徐霞客只是一介周遊天際的旅人，二人卻私交甚篤，從他們的書信來往中不難發現黃道周重視徐霞客這位友人，與徐霞客的交往過程中才能真正得到心靈上真誠的慰藉與支持。徐霞客對黃道周的評價極高，他曾說：「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為館閣第一，文章為國朝第一，人品為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見，亦不易求<sup>19</sup>。」徐霞客認為黃道周無倫是在文學成就上，或是人格品德，皆是直承周、孔，為古今第一，但是黃道周不見，也不易求得。文

<sup>1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61。

<sup>1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62。徐霞客極為珍惜黃道周所贈與的〈七言古詩一首贈徐霞客〉，因此請了許多名士為之作題跋，如陳仁錫、文震孟、項煜、鄭鄴。

<sup>1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85。

<sup>1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51。

<sup>1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滇遊日記七〉，頁879。

震孟曾寫〈寄徐霞客書〉，信中感慨功名事業只是夢幻泡影，不能同徐霞客五岳之遊。他認為徐霞客將遊歷過程著成遊記以導後遊，以傳千秋，此壯舉文震孟是深感佩服的。

從互贈的詩文內容看來，可知徐霞客與朋友之間的友情是以誠相待，項煜曾說：「霞客遊滿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sup>20</sup>。」吳國華在〈徐霞客壙誌銘〉曾說：「霞客之生平，磊落英奇，目空萬卷，少應試不得志，即肆志玄覽，盡發先世藏書，並鬻未見書，縑緇充棟，叩如探囊，稱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sup>21</sup>。」或許是因為年少並未走上科舉之路，影響了他的性情，故所結識之友人也多半是不慕榮利之人。

#### 四、友人紀錄及評價

陳函輝在〈霞客徐先生墓誌銘〉寫說：「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sup>22</sup>。」惟不喜與權貴交往，所結交之友多為耿直之人為多，陳繼儒、黃道周、陳人錫、許學夷……等，皆為徐霞客之友，且常有書信上的往返。其友人對徐霞客的評論多是以「奇」概括之。如陳繼儒在〈壽江陰徐太君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中提到第一次看到徐霞客時的印象：

余嘗纂奇男子傳數卷，每恨今人去古人太遠，為慨歎久之。今年王畸海先生攜一客見訪，墨顴雲齒，長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寢處山澤間儀，而實內腴，多膽骨。與之談，磊落嵯峨，皆奇遊險絕事，其足跡半錯天

<sup>2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163。

<sup>2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1。

<sup>2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霞客徐先生墓誌銘〉，頁 1197。

下矣。客乃弘祖徐君也<sup>23</sup>。

這是陳繼儒初識徐霞客時的第一印象，陳繼儒以為徐霞客不僅相貌不凡，所完成的壯遊之舉更是令人稱許，陳繼儒說：「徐君不借遊符，不絜伴侶，不避蟲蛇豺虎，聞奇必探，見險必截，其騰蹕轉側之處，皆漁樵猿鳥之所不窺<sup>24</sup>。」

黃道周與徐霞客是至交，黃道周將徐霞客比喻為天下「駿馬」，且是癖愛山水的「畸人」在贈與徐霞客的一首詩中寫到：「天下駿馬騎不得，風髻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鎗瀉汗煮白石。江陰徐君杖屨雄，自表五岳之霞客。<sup>25</sup>」黃道周讚揚徐霞客是杖屨雄健，走遍天下。

在徐霞客逝世之後，錢謙益在〈徐霞客傳〉中對於徐霞客的壯遊記實如下：

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襪被，不治裝，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攀援下上，懸度縋級，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峯巖為牀席，以溪澗為飲沐，以山魅、木容、王孫、獮父為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時與之論山經，辯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鞏悅為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為記，如甲乙之薄，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sup>2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頁 1235。

<sup>2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頁 1235。

<sup>2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七言古詩一首贈徐霞客〉，頁 1161。

萬卷劫灰，一身旅泊，一意拋棄世事，皈心空門，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唯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為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聞其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為世間真文字，萬萬不可改換竄易，失卻本來面目也<sup>26</sup>。

錢謙益曾寫信給徐仲昭，高度評價徐霞客為千古奇人，其遊記乃是世間之「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因此囑咐徐霞客之族兄徐仲昭儘快刻印《徐霞客遊記》「仁兄當急為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千萬不可將此書「泯滅不傳」。另外，錢謙益也請當時刻書家毛晉將此書出版刊刻，在〈囑毛子晉刻遊記書〉中說：「幸為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sup>27</sup>。」潘耒認為一些文人雖易言遊，但卻不能真正的領會山水之意，他舉出了幾個例子來說明遊的真諦：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言易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祕；無閑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群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遊也<sup>28</sup>。

他以為遊必須達到置身事外、棄絕百事，近遊、淺遊都只是隨性走走，無法深入；群遊又人聲雜沓，無法專心，且要有廣大的胸襟才能領會山水之意，因此

<sup>2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199。

<sup>2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囑毛子晉刻遊記書〉，頁 1187。

<sup>2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囑毛子晉刻遊記書〉，頁 1268。

他認為文人雖稱遊，但卻無法達到真正遊的境界，惟有徐霞客能達到此地步。

又說：

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回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矣，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遠挂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憊，行誤不悔。暝則寢樹石之間，飲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sup>29</sup>！

潘耒認為徐霞客性靈之遊、軀命之遊，縱使身處危險之地，也不改其心，不悔其志，亙古以來，僅此一人而已。接著潘耒說明了徐霞客遊歷的目的是「無所為而為」的動機，與先賢遊歷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為？夫惟無所為而為，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來去自如，無所不達意<sup>30</sup>。

徐霞客的遊歷無任何的目的，故他能夠專心一致，來去自如，他並非是爲了什麼目的來遊玩，只是秉持著對大自然的熱愛而投身其中。

<sup>2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囑毛子晉刻遊記書〉，頁 1268。

<sup>3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囑毛子晉刻遊記書〉，頁 1269。

奚又溥形容徐霞客的筆意像柳宗元，其敘事方式像龍門，龍門即指司馬遷，但他認為徐霞客之遊勝過於柳宗元與司馬遷，因為其目的性不同，所表現出來的遊記形式也有所區別，他在《徐霞客遊記·序》說：

霞客徐先生記遊十卷，蓋古今一大奇著作也。其筆意似子厚，其敘事類龍門，故其狀山也，峯巒起伏，隱躍毫端；壯其水也，源流曲折，軒騰紙上……凡自吳而楚、而兩越、而黔、而滇，一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歷之，後人以心會之，無不豁然於耳目間也，不誠自古及今未有之奇書也哉！是非先生之人之奇，不能有此遊之奇，而非先生之遊之奇，亦不能成此書之奇也。夫司馬柳州以遊為文者也，然子厚永州記遊諸作，不過借一邱一壑，以自寫其胸中塊壘奇崛之思，非遊之大觀也。子長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於江、淮，遊亦壯矣，要以助發其精神，鼓盪其奇氣，為文章用。故史記一書，帙宏雄邁，獨絕千古，而記遊之文顧闕焉。先生之遊，過於子長，先生之才之氣，直與子長埒，而即發之於記遊，則其得山川風雨之助者，固應與子長之史記並垂不朽，豈僅補桑經酈註之所未備也耶？<sup>31</sup>

奚又溥認為徐霞客的遊記是古今之奇作，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不過是借著山水景色來抒發己身之悲；而司馬子長雖也曾壯遊，但其壯遊目的並非在於山水景物之類，而奚又溥認為徐霞客之遊過於子長，與史記應同樣立於不朽之地，而非僅僅只是補桑欽水經、酈道元水經注之不足而已。這或許可解釋為時代風氣使然，韓愈曾說柳宗元筆意似「司馬子長」，而奚又溥也說徐霞客其「筆意似子

<sup>3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囑毛子晉刻遊記書〉，頁 1269-1270。

厚」，這樣一脈相承下來，雖然筆意類似，但其描寫景色的敘述風格卻是隨著朝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在經歷魏晉南北朝「山水方滋」後，文風轉變為子厚的自然生動寫實的筆觸，但仍離不開借景抒情的窠臼中。

明末之際，在講求實學風潮的影響之下，徐霞客所寫遊記的文風轉變為直寫自然山水為主，跳脫出以自我為本位的主觀式書寫方式，這是明末環境的使然，卻也是《徐霞客遊記》的價值所在。龔鵬程曾說：司馬遷式的遊，有遊歷而無遊記；柳宗元式的遊，有遊記而志不在遊。兩者均不是因為認同遊的價值，故為遊而遊。因此，從遊歷的型態和遊記形式的演變看來，到了徐霞客時，遊已從不得已的、異常的、感傷的狀態，轉變成了對新世界的探索，也從以遊來實現人生的價值，變成遊的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徐霞客之遊，旨在由旅遊以觀天地之大觀，別無其他目的<sup>32</sup>。

綜觀徐霞客此生，他的旅行不為任何目的，不為官廳，不為宗教，以近三十年的時間完成這一部鉅作，兼具了山水之美與地理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徐霞客遊記》的評述說：

宏祖耽奇嗜僻，刻意遠遊；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摹寫；遊記之夥，遂莫過於斯編。雖足跡所經，排日記載，未嘗有意於為文，然以耳目所親見聞較確；且黔滇荒遠，輿志多疏，此書於川脈絡剖析深明，尤為有資考證；是亦山經之別乘，輿記之外篇矣。存茲一體，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也<sup>33</sup>。

<sup>32</sup> 龔鵬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89。

<sup>33</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909。

四庫館臣認為徐霞客抱以探奇的心態，刻意遠遊，描摹景物精細生動。再者，對於黔滇偏遠之地，歷來疏於記載，《徐霞客遊記》對黔滇則有詳實的紀錄，可補方志之不足，可見得對徐霞客的評價極高，也提出了徐霞客遊歷的價值，以及對地理學的貢獻。

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中說：「其萬里獨行，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謫仙訪元丹夢遊天姥，杜拾遺經木皮嶺諸山佳者居要<sup>34</sup>。」肯定徐霞客堅定的毅力以及訪奇搜勝的決心。潘耒〈徐霞客遊記·序〉：「及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sup>35</sup>。」潘耒對往昔名人遊記皆不以為然，但是在讀了《徐霞客遊記》之後，則自嘆不如。徐霞客之遊，除了名山遊之外，更深入西南蠻荒之地，這已非純然是為了山川之美而遊，更多的是搜奇訪勝的決心與毅力，徐霞客之壯遊，確實是古今罕見之舉。

---

<sup>3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197。

<sup>3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268。

## 第二節 徐霞客的遊蹤

徐霞客的旅遊方式不是一般意義上文人墨士之遊，如謝靈運、李白式的「寄情山水」以及「遊山玩水」，也不是受朝廷派遣肩負政治或宗教使命之遊，如張騫、玄奘式長途跋涉有目的性之遊。徐霞客是純粹出自於個人喜好與科學考察緊密相結合的科學旅遊、探險旅遊<sup>36</sup>，潘耒稱徐霞客的旅遊是「置身事外，棄絕百事」之遊<sup>37</sup>。而徐霞客的旅行考察大約可分為兩種形式：有方之遊與萬里西遊。

早期的遊歷徐霞客只是「欲問其名山大川」，並無完整的規劃與準備，只是純粹滿足個人慾望與好奇心，多為名山之遊，遊記雖有紀錄山川地貌，但多以記載遊蹤過程為主，少有涉及史料紀錄。晚期的萬里西遊是徐霞客此生最重要的一段遊歷，耗時四年，遠赴西南邊境探奇，此時期的遊記記載豐富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史料文獻，是徐霞客此生壯遊中最精采的部份。

### 一、早期的名山之遊

徐霞客早年的遊記內容，多以訪勝搜奇為主，文學性高於科學性，不像後來的遊記，更多注意的是對山川地貌和水道源流的研討，但從中仍可體現他對於大自然的敏銳且深刻的觀察<sup>38</sup>。

1625年徐霞客母親王孺人去世，在這之前的遊歷是屬於短程的旅遊，少則十天半月，多則不超過三月，秉持著「父母在，不遠遊」的儒家精神，其母王

<sup>36</sup> 朱鈞侃等編《徐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98。

<sup>3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268。

<sup>38</sup> 黃坤《徐霞客遊記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頁10。

孺人卻是勉勵徐霞客男兒志在四方。陳函輝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銘〉中記載：

欲問其於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戀戀菽水溫清，不敢請。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語稱：『遊必有方』，不過稽遠近，計歲月，往返如期，豈令兒以藩中雉、轅下駒坐因為？」遂為製遠遊冠，以壯其行色。而霞客蹇衛芒鞋，探幽凌險，以四大付之八寰，自此遂無停轍矣<sup>39</sup>。

若無母親王孺人的思想開明與勉勵，徐霞客不會去旅遊，更不會有《徐霞客遊記》流傳於世，母親思想的開明也是促成了徐霞客能夠遍遊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陳函輝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銘〉中說：

萬曆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sup>40</sup>。

是年徐霞客二十二歲，由是可知徐霞客之遊始於太湖之遊，此次出遊並未有遊記的記載，雖為近遊，卻是揭開了徐霞客旅遊生涯的序幕。

萬曆三十七年，徐霞客二十四歲，陳函輝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銘〉說：「上泰岱，拜孔林謁孟廟三千故里，嶧山吊枯桐，皆在己酉<sup>41</sup>。」此行歷齊、魯、京師、冀、山東泰山、曲阜孔廟、鄒縣孟廟為旅遊重點，是徐霞客首次北遊，也是首次遠遊。1607年至1632年這一時期徐霞客的出遊的區域大致是江南和中原，每次出遊多在春、秋氣候宜人的季節，每次出遊時間少則十天半月，一般

<sup>3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霞客徐先生墓志銘〉，頁1191-1192。

<sup>4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霞客徐先生墓志銘〉，頁1192。

<sup>4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霞客徐先生墓志銘〉，頁1192。

爲三個月，是時斷時續的「有方之遊」、「定方而往」、如期而返，每次旅遊時間較短，所到之處離家不遠，交通較爲便利。這一個時期，他遊歷了家鄉附近風景優美的太湖，浙江的天台山、雁蕩山、落迦山，安徽的黃山和江西的廬山；還遊歷了山東的泰山，河南的嵩山，陝西的華山。這一時期的出遊，主要是搜奇訪勝，遊歷名山大川，欣賞性重於地理考察，但是也已經注重地理景觀的考察和探索，並訂正了一些沿襲已久的看法，探索了一些對自然現象規律的認識。

1632 年至 1636 年四年之間，徐霞客遊蹤十分頻繁，每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野外度過的。他曾再遊浙江的天台山、雁蕩山，山西北部的五臺山和北岳恒山，二次到福建，三訪漳州，最遠的到廣東的羅浮山，這一時期的旅行已經從搜奇訪勝到探奧絕奇的地理考察階段。如在遊歷黃山時，經過目測後認爲黃山最高峰是蓮花峰而非天都峰，當他登上蓮花峰頂時發現「即天都亦俯首矣<sup>42</sup>」，由此可判斷蓮花峰才是最高峰。或是在遊雁蕩山時曾按照志書的記，欲探雁湖和龍湫瀑布源頭之所在，之後證明了雁湖與大龍湫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種種考證之事，說明徐霞客之遊並非只是單純的性靈之遊，訪奇之心是支持他不計程遊歷重要動力之一。1632 年重遊天台、雁蕩山時，與陳函輝的一席談話，可視爲徐霞客日後西南之遊旅行考察最重要的思想轉折：

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記載以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為崑崙海外之遊<sup>43</sup>。

<sup>4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遊黃山日記〉，頁 32。

<sup>4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致陳繼儒書〉，頁 1194。

徐霞客認為前人所寫的方志，多以抄襲附會居多，而且對長江、黃河以及崑崙等山脈的記載，只是侷限於一方而已，未能窮盡源頭，於是興起了西南遠遊的念頭。西南之遊發端於此，決策於此。徐霞客的旅行考察已經從名山訪勝轉向了探討地理之學，故我們可視為 1632 年至 1636 年這四年間的遊歷，是從徐霞客從性靈慢遊過渡到具體實踐壯遊的重要時期。

## 二、晚期的西南之遊

徐霞客計畫西南之遊已久，在啓程去福建時已表明自己決心遠遊的心志：

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然蜀中、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sup>44</sup>。

徐霞客說自己的旅遊目標志在四川峨嵋、廣西桂林，以及太華、恆嶽諸山，但是由於這些地方過遠，顧及母親年老之故，未能遠遊。因此在母親去世後，徐霞客即決定西遊之行，在〈致陳繼儒書〉中表明自己西遊之決心：

弘祖將決策西遊，從牂牁夜郎以極磽門鐵橋之外，其地皆豺嗥鼯嘯，魑魅縱橫之區，往返難以時計，死生不能自保。嘗恨上無以窮天文之杳渺，下無以研性命之深微，中無以砥世俗之分沓……「窺其山川絕勝，以地屬殊方，人非俗習，惴惴歛屐去<sup>45</sup>。

由徐霞客此段話可知，當時的西南邊境是蠻荒之地，而徐霞客卻毅然決然的起

<sup>4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遊九鯉湖日記〉，頁 33。

<sup>4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致陳繼儒書〉，頁 1147-1148。

身西遊，他也提到了當地的風俗習慣與地理環境有別於中原地區，是個未知的世界。崇禎九年秋（1636年）迄於崇禎十二年夏（1640年6月），出發時徐霞客51歲，返鄉時55歲，歷時近四年。這一時期是徐霞客一生旅遊考察中最輝煌、最富有成就的時期，考察目的真正有了科學意義，考察內容也更為廣泛，對溶岩地貌區做了詳細、全面的考察，作出了傑出的成就；對河流水系、山脈走向、火山地熱進行研究，形成了他的地理思想和方法。同時，對於民俗民生、工商經濟、邊疆治亂之類的社會狀況作了精闢的紀錄。徐霞客計畫西遊已久，在西南之行首篇〈浙遊日記〉中即說：「余久擬西遊，遷延兩載，老病將至，必難再遲<sup>46</sup>。」西南地區是當時所稱的蠻荒之地，指的是浙西、贛南、湘西、桂、黔、滇、川滇、川西等地，這裡的人口較少，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分布，且多為瘴癘之氣雲霧瀰漫，經濟、交通不發達，因此徐霞客在晚年完成這一萬里西遊，是研究晚明西南邊陲地帶風俗、人文、地貌最完整的文獻資料<sup>47</sup>。

徐霞客晚年的西南之遊是他旅遊生涯中最豐富、充實、最具成就的全盛時期，西南之行的遊記篇數約佔總遊記篇數二分之一，其中〈滇遊日記〉十三篇，約二十五萬餘字，另有〈盤江考〉、〈溯江紀源〉以及應官方聘請所修訂的〈雞足山志〉此三篇地理考察之作。晚年的西南之行，是徐霞客從單純尋幽訪勝的漫遊階段，拓展到敏銳觀察、窮根究底的觀察紀錄，著重西南邊陲地區的經濟、社會、人文、氣象、民俗……等的詳實記載，或許是徐霞客的好奇心驅使，在柔媚的江南成長之下，西南的蠻荒之地彷彿是另外一個未知的世界，加上當時對於邊境之地的開發仍未重視，往來不甚便利，鮮少有人提及，徐霞客秉持著訪奇的心態，決然而行，一探西南邊境之秘地。

<sup>4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浙遊日記〉，頁93。

<sup>47</sup> 朱鈞侃、倪紹祥主編《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74。

徐霞客出遊從萬曆三十五年開始外出旅遊，直到逝世前一年崇禎十三年，共計三十五年，換言之，徐霞客從青年開始，壯年、晚年，皆是在旅遊中度過。根據筆者統計，加以參照《徐霞客先生年譜》、《徐霞客評傳》、《徐學概論》等書，統計出徐霞客的旅遊有 24 次，列舉代表性的遊歷，其餘以表格呈現於附錄<sup>48</sup>：

萬曆 35 年，始泛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1607 年初秋徐霞客與許學夷坐船從家鄉到無錫遊惠山，再泛舟太湖，遊蘇州洞庭東、西山，訪靈威丈人遺址，遊無錫惠山和太湖，雖為近遊，但卻是揭開了徐霞客旅遊生涯的序幕。萬曆 37 年，據陳函輝所寫的〈徐霞客墓誌銘〉說：「上泰岱，拜孔林謁孟廟三千故里，嶧山吊枯桐，皆在己酉<sup>49</sup>。」此行歷齊、魯、京師、冀、山東泰山、曲阜孔廟、鄒縣孟廟為旅遊重點，從遠河北上，原路返回，這是徐霞客首次北遊，也是首次遠遊。

萬曆 41 年，此遊與江陰迎福寺僧蓮舟先由水路到杭州，經蕭山到紹興訪仲昭，再至寧波渡海遊落伽山，再經寧海到天台、雁蕩。此遊重點為浙東落伽山（普陀山）、天台山（一遊天台）、雁蕩山（一遊雁蕩）。遊落伽山無日記，天台、雁蕩有日記，也是現存徐霞客最早的遊記。泰昌元年，與族叔徐芳若同遊九鯉湖、石竹山，此遊經歷浙閩，為二度遊閩。

天啓四年，霞客 39 歲，其母 80 歲，為支持霞客遠遊，與霞客再次同遊宜

<sup>48</sup> 朱鈞侃、倪紹祥主編《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92-97。

<sup>4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霞客徐先生墓志銘〉，頁 1192。

興諸洞。崇禎三年，應族叔徐日升之邀，再赴漳州，遊覽了閩北羅蓋山和永安桃源洞。有《閩遊日記後》留傳，是為霞客四度入閩。崇禎五年，先去南京候罷官南歸的黃道周，與黃道周同遊南京、鎮江金嶼焦山，再遊句容茅山華陽洞，隨後與黃道周同赴蘇州，與陳仁錫共遊太湖洞庭山。黃陳均有詩序。崇禎九年到崇禎十三年，前後歷時四年，是徐霞客出遊時間最長，成果最豐富，也是他最後一次出遊，其遊歷了浙、贛、湘、桂、黔、滇諸省。最後由麗江土司木增派人送到黃岡，再由黃岡侯知縣派人將其送到家，歸途歷時約半年。

在徐霞客五十四年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完成他遊歷的步伐，先從近程的景點、名山五岳，先從心領神會的漫遊，再到西南邊境蠻荒之地的壯遊，從江海、湖泊到峽谷飛瀑，這樣一步步的向險惡的環境邁進、探求，支持徐霞客的動力是一顆求真的好奇心，在探索山水之美之餘，也進而尋求自己的生命價值，也留給後世寶貴的地理文獻資料。晚明士人之遊，從吟風弄月的性靈漫遊，到了徐霞客的考察壯遊，這一個遊歷過程的轉變，徐霞客遊歷的精神在於：他遊出了傳統文人的不得志之情，也開拓晚明旅遊風氣的另外一種遊歷精神，無論是從旅遊的本質或是意義上來看，徐霞客代表了晚明旅遊風氣的新氣象。

### 第三節 徐霞客遊記的社會史實書寫

對於《徐霞客遊記》來說，遊記所寫的內容涉及廣泛，不僅僅是純粹個人的遊玩書寫記錄，其中包含有許多的史料文獻記載，可幫助我們了解明末時的社會真況與史實，透過遊記的紀載史實是最真切而無誤的，因為遊記的寫成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可視為是耳聞目睹的第一手史料，對於史書的記載可補不足，亦可還原事件的真實性。故本節欲透過探討《徐霞客遊記》對社會民情的書寫，來看徐霞客對當代的社會是如何記載及關心，這與小品遊記性靈書寫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 一、官民之爭

明末政治腐敗、吏治黑暗，軍備廢弛，時正值徐霞客在西南遊歷，面對這一切的社會動亂，土司蹂躪百姓的狀況，感慨甚深，且又聽說黃道周因與崇禎皇帝面折廷爭而被削職，於是他有了以下的感慨：

是日始聞黃石翁去年七月召對大廷，與皇上面折廷諍，後遂削江西郡幕。項水心以受書帕，亦降幕。劉同升、趙士春亦以上疏降幕。翰苑中正人一空。<sup>50</sup>

黃道周因病請求歸休，將離京時，他上疏指出：「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以致於造成了士庶離心、天下騷然，黃道周建議崇禎帝必須「退

<sup>5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徐霞客遊記》，頁 1027。

小人，任賢士」，但卻無奈崇禎皇帝以「濫舉逞臆」之罪將其消籍為民，因此徐霞客得知此消息時感嘆「翰苑中正人一空」，正是明末王朝腐敗的寫照<sup>51</sup>。

在《徐霞客遊記》的記載中，其中有部份的內容真實地反映了明末的社會生活狀況，在中國封建社會逐漸沒落之際，徐霞客在其遊記中揭露了上層政治的腐敗以及下層社會的人民困苦與制度上的弊病，並且真實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狀況，晚明的社會經濟力雖達到高峰，但統治者的荒淫無道卻使得生活在底層的人民痛苦不堪，因此導致了民變頻繁，農民起義抗爭不斷，這些史事在明末的農民戰爭中皆有記載，但對於南方農民起義的記載較少，《徐霞客遊記》在〈楚遊日記〉中記載在衡陽湖廣農民起義的事件：

是夜二鼓，聞城上遙吶聲，明晨知盜穴西城，幾被偷入，得巡者喊救集眾，始散去<sup>52</sup>。高粱原為寧遠南界、藍山西界，而地屬於藍，亦高山瑤也，為盜賊淵藪。二月間出永州，殺東安縣捕官及殺掠冷水灣博野橋諸處，皆此輩也。出入皆由牛頭江，必假宿於韭菜原蟠龍洞而經九疑峒焉。其黨約七八十人，有馬二三十匹，創銳羅幟甚備，內有才蓄髮者數人，僧

<sup>51</sup>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55〈列傳〉143，(台北：鼎文書局，1991年5月)，頁 6592-6593。黃道周於崇禎五年正月遘疾求去，瀕行時上疏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誣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誣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露后，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為此，崇禎皇帝不憚，怒斥黃道周貶為民。

<sup>5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8。

兩三人，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韭菜原中人人能言之，而余導者亦云然<sup>53</sup>。  
抵逆旅，始知上午有盜百四十人，自上鄉來，由司東至龍村，取徑道向  
東，謂土人無恐，爾不足擾也<sup>54</sup>。

從以上有關於農民起義的材料看來，徐霞客筆下的農民起義是以小規模形式的活動，其組成份子除了貧苦的農民外，另有寺廟僧侶、木材商人參加。

對於晚明民變的記載，在史書中皆可看到，但《徐霞客遊記》的可貴之處在於是他親身經歷而記錄下來的，是第一手資料，而對於史書中所記載的所謂「亂民」及激起民變的原因，徐霞客在遊記中如實的表現出來，而非是像史書記載的暴民，他寫道：

方拽囊就道，忽北路言，大盜二百餘人自北來。主人俱奔，襁負奔避後山，余與顧僕復攜囊藏適所遊穴中，以此處路幽莫覺，且有後穴可他走也。余伏穴中，令顧僕從穴旁窺之。初奔走紛紛，已而路寂無人。久之，復有自北而南者，乃下問之，曰：「賊從章橋之上，過外嶺西向黃茅矣。」乃下巖南行，則自北南來者甚眾，而北去者猶蹢躅不前也。途人相告，即梅前司渡河百四十名之夥，南至天都石坪行劫，……（次日，徐霞客）詢之土人，昨流賊自章橋北小徑，止於村西大山叢木中，經宿而去。想亦有所闕而不敢動也<sup>55</sup>。

上文中所記載的農民寧願露宿在大山叢木中，也不願擾民，徐霞客命顧僕於旁

<sup>5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39。

<sup>5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47。

<sup>5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50-252。

觀之，自己伏於穴中，靜觀盜賊之去向。可見在遊記中所記載的盜賊，有不少是善良的百姓，淪為流寇，或許是生活所逼迫。

## 二、土司制度的弊端

明代推行土司制度時，即有兩大弊端，並伴隨著明朝統治的逐漸衰弱而愈益突出，一是階級矛盾日益加劇，明代的土司制度並沒有改變土司統治土民的狀況，而朝廷的統治又加諸其上，使得當地少數民族要承受來自兩方面的統治和剝削。在西南落後生產的方式下，土民視代受著農奴主和奴隸主的人身佔有的殘酷剝削，土司貪縱淫虐，百姓致死不敢貳。另一方面則是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明初為了加強對西南的統治，朝廷大量向雲貴等地移民屯戍，加之道路的開拓，給西南帶來了發展的契機；但落後的土司制度，卻對中原先進經濟文化的傳入和地區的發展，造成極大的障礙。土司制度的前提是保留原有的統治秩序，在西南落後的生產方式之下，土司統治大多是具有人身奴役的農奴和奴隸制度，土司世其土，即世其民。主僕之分，百世不移。這種制度，大大阻礙了封建經濟因素的成長和發展，延滯了社會發展的進程<sup>56</sup>。

明代土司，常因承襲問題，鬧成絕大的爭亂。蓋土司常有多妻、嫡庶之爭，為其亂源；又兼婦女可得承襲，為禍更大。明季官吏多於事前不加節制，及土司爭襲亂成之後，又常不顧法律，亂加爭剿，養成土司目無法紀之風，加以流官常受土司賄錢、幫同造亂，所以有明一代，土司制度最為紊亂<sup>57</sup>。明朝政府為了籠絡少數民族的上層份子，在西南邊境實行流土分治，既有朝廷派駐的流官，也有世襲的土司，他們對內實行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對外實行掠奪與擴張，為

<sup>56</sup> 張顯清、林金樹著《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頁915-917。

<sup>57</sup> 余貽潭《明代土司制度》，（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頁8。土司制度的設立導因於：西南邊境小民族甚多，其中以獠、猺為最大，漢人歷來視為化外蠻夷，不屑以中原禮制政俗統治，乃有所謂土司土官者管轄之。自唐宋以下，以元朝為初期，至明季其制度完全成立。

了奪權或擴大勢力，可以自相殘殺，甚至常發生逆倫血案。徐霞客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陲考察中，在日記明確提出土司制是造成人民生活貧困的根本原因<sup>58</sup>。簡而言之，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爲了統治複雜的西南地區，所採取的一種制度，但隨著土司的日漸龐大，導致了動亂的局面，也反映了明末政治的腐敗和墮落。

徐霞客在〈黔遊日記〉中對於土司制度有詳實的記載：

獨山土官，昔為蒙詔，四年前觀燈，為其子所弑；母趨救，亦弑之。乃託言殺一頭目，誤傷其父，竟無問者。今現為土司，可恨也<sup>59</sup>。

文中提到土司逆倫血親的案件，徐霞客對此感到頗爲憤恨不平，弑母傷父者竟可爲土司，是徐霞客感到可恨之處。此外，在〈隨筆二則〉中有一則普名勝事蹟的隨筆記載，這則隨筆對雲南土司普名勝這股反動的勢力做了詳實的記述：

普名勝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為亂三鄉、維摩間。萬曆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寧州祿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初猶屯阿迷境，後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sup>60</sup>。

阿迷州土司普名勝叛亂，震動全鎮，殘破諸土司，使得民不聊生，影響人民生活甚鉅，普名勝猖獗一時，造成的惡果極爲嚴重，因此徐霞客在隨筆中做出了

<sup>58</sup> 鄭祖安、蔣明宏主編《徐霞客與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5月），頁287。

<sup>5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626。

<sup>6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隨筆二則〉，《徐霞客遊記》，頁1132。

評論：「自臨安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者，輒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sup>61</sup>。」由此可知，土司的叛亂所到之處，無不造成破壞，這完全是統治者「以夷制夷」的錯誤政策，上位者與土司相互利用、倚重各自的權利，形成了階級矛盾日益加劇，以及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徐霞客此段對於土司的記載是親所見聞，爲此他也感嘆：「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彝也！」<sup>62</sup>」充分流露出對時事的關心以及對朝廷的痛心，徐霞客雖以遊記爲名，但內容涉及時事、政治的史料，是觀察晚明社會重要的史料之一。

### 三、社會民情書寫

有別於晚明文人的遊記寫作方式，《徐霞客遊記》以日記體的形式詳述其遊歷過程，遊記內容多涉及的是親眼所見的景象，這與晚明文人的小品遊記寫作形式截然不同，小品遊記的寫作不外乎是主觀的心情描寫，對於景物的記載是其次，漫漫之遊是其特性，晚明小品文家只是專心、熱情地去遊玩、遊賞，其遊記內容少有涉及文獻與史料的記載問題，他們在乎的是遊玩時的興致，如袁宏道獨愛以審美的眼光來寫景物，遊記偏重於審美性，獨抒性靈的風格也恰如其分的反映的遊記上，在袁宏道〈滿井遊記〉中，寫其悠然遊玩於滿井的情形：「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靚面，而髻鬟之始掠也<sup>63</sup>。」遊記中善用譬喻手法，試圖描繪出一幅微美的畫像，雖以遊記爲名，但實際上所寫的是心領神會的情感。

<sup>6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隨筆二則〉，《徐霞客遊記》，頁 1133。

<sup>6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隨筆二則〉，《徐霞客遊記》，頁 1133。

<sup>63</sup>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滿井遊記〉，《袁宏道集箋校》，卷 17，頁 681。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徐霞客遊記》有一段評論是說：「黔滇荒遠，輿志多疏，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sup>64</sup>。」在四庫館臣的眼中看來，《徐霞客遊記》對於當時被視為偏遠的黔滇之地有詳實的記載，遊記中對於風土民情的記載多集中於西南之遊時，可見對於徐霞客來說，他以一個比較新奇的心情來記錄西南的生活紀實，長期生活在柔媚風光的江南，黔滇對他來說似乎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度，在每種事物都是新奇的情況之下，自然對於當地的生活情況會更特別去書寫。

### （一）對各地物產的紀錄

在徐霞客的遊記中，首先反映了各個地理環境不同所形成的職業特點，居民的職業選擇，與當地的產物來源有相互因果的關係，浙江臨安楮塢村多產楮樹，居民的職業也多和楮樹有關，因而「家家以楮為業<sup>65</sup>」的情況普遍可見。又如衡山縣以北地區產煤，徐霞客記載：「界北諸山皆出煤，攸人用煤不用柴，鄉人爭輸入市，不絕於路<sup>66</sup>。」衡山縣以北盛產煤礦，當地居民以煤為燒炊原料，也以煤為收入來源。又如衡山縣處於湘江上游，每年二三月大魚溯江而上產卵，故「土人俱於城東江岸以布兜圍其沫，養為魚苗，以大扁販至各地，皆其地所產也<sup>67</sup>。」無論是以楮為業，或是煤礦、魚苗，這些都可說明了生產的項目與生產習俗，與自然環境有密切的關係，這也呼應了王士性主張的人地關係論，只是徐霞客並未將這些現象提升到理論的層面，僅以紀實的筆法寫出。

<sup>64</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1909。

<sup>6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浙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00。

<sup>6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00。

<sup>6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99。

此外，在遊記中還記載了祈雨的風俗，農業的生產受到天候的影響很大，甚至天候可以決定整天的豐收與否。於是，在一個迷信的基礎之上，認為風雨由上天所主宰，故在久旱或久雨之時，即有祈雨的儀式出現，也就是愈旱即移街的情況：

因出觀街子，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來鳳山麓。是日因旱，斷屠祈雨，移街子於城中；旱即移街，諸鄉村皆然<sup>68</sup>。

在《遊記》中所寫的雲南祈雨風俗，是禁止屠殺牲口，於是把市場移往他處，貶抑商業交流，求天憫人以施雨，這反映了中國普天蒼生與重農抑商的思想概念<sup>69</sup>。

## （二）服飾風俗

食衣住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在《徐霞客遊記》中，徐霞客以一種比較新奇的心態來記錄，這種心態與王士性紀錄西南之地時，有相似之處。如在西南偏遠地區，服飾是用來區別貴賤的標誌，「廣西土酋、土官多戴氈帽，惟外州人寓彼者，束髮以網。」而婦人則是「胸前垂紅絲帶二條者，則酋目之婦也。」以胸前的紅絲帶來表示已婚身分。另外也提到男女著鞋的不同：

男子著木屐，木片為底，端絆皮二條，交於巨趾間，婦人則無不跣者，首用白布五六尺盤之，以巨結綴額端為美觀，亦間有用青布、花布者……交人則披髮垂後，並無布束。間有籠氈帽於發外者，髮仍下垂，反多穿

<sup>6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99。

<sup>69</sup> 朱鈞侃、倪紹祥主編《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頁 494。

長褶而足則俱跣<sup>70</sup>。

可見明代廣西服飾體現出官民分化、性別分化、民族分化。其中男子著木屐，婦女無不跣足，是對其地炎熱生態環境的適應。婦女頭髮用白布、青布或花布五六尺盤頭以巨結綴額端，是爲了把自己打扮漂亮的需要。酋目之婦胸前垂紅絲帶二條，土酋、土官多戴氊帽，是爲了顯示自己高貴的地位和身份。而漢人戴巾，交人披發垂後都是爲了表明自己的族別，體現民族的習慣和風尚<sup>71</sup>。

### （三）居住習慣

此外，住宅以及建築習慣，多與當地的氣候、環境有關係。在西南地區由於經濟落後，多住茅舍，居住環境與徐霞客所處的江南之地有所差異，因此徐霞客特以記錄下來，如他所言：

蓋一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濕薪以為爨，爨北即所置幾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傍火隱几<sup>72</sup>。

由此段的敘述可知，西南地區的建築多半簡陋，且常常人畜同處一室，在榻前則放柴薪以炊飯，與床榻僅只隔一火。經濟的因素造成偏遠之地環境的簡陋，但也可以看出當地居民因地制宜的巧思，呈現出與自然合諧共處的一面。

在廣西地方，徐霞客也見到了不少的干欄式建築，「四山迴合，中有茅巢三

<sup>7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523。

<sup>71</sup> 尉富国〈從徐霞客遊記看明末廣西飲食、服飾、居居民俗〉，《廣西地方志》，（2004 年）第 1 期，頁 59。

<sup>7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715。

架，登巢而炊<sup>73</sup>。」或是「登一茅架，其家宰豬割雞獻神而後食，切魚膾復如前<sup>74</sup>。」這裡的茅巢與茅架所指的就是干欄式建築，干欄式建築廣泛分布於廣西西北部，與其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有關，這種建築的形式是適應當地的氣候環境，原因是當地炎熱多雨，地氣上蒸，土多潮溼，人居樓上，可以避暑防潮，其次，南方多毒蛇猛獸，居於樓上，便於防禦，水平空間，豎向空間幾個方向均可隨宜調整，此類建築形式對地形有高度適應性，很適合該地的自然環境與地形<sup>75</sup>。

---

<sup>7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483。

<sup>7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518。

<sup>75</sup> 尉富国〈從徐霞客遊記看明末廣西飲食、服飾、居住民俗〉，《廣西地方志》，2004 年第 1 期，頁 59。

## 第四節 小結

徐霞客以認真、紀實的態度寫成六十萬餘言的遊記，他的旅遊過程呈現出晚明文人的另一種遊歷精神，楊名時（1661-1737）稱徐霞客的寫作態度嚴謹、認真：

念其平生胼胝竭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餘年，其所記遊跡，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為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sup>76</sup>。

楊名時讀《徐霞客遊記》時，認為《徐霞客遊記》以日記體的形式記載遊蹤，寫來鑿鑿有詞，描摹景物，多以寫實筆調紀錄，與柳宗元、蘇東坡的山水遊記比較起來，徐霞客不以言情為主，也並非將不得志之情寄託於山水之間，純粹是因為訪奇搜勝的好奇心驅使，尤其是對於西南偏遠之地的文獻記載，紀錄官民之爭、土司制度的紊亂，或是石灰岩地形……等，這些都是記載西南地區重要的文獻，可補史書之闕如。

因此，我們可將《徐霞客遊記》視為是一部多元內容的遊記寫作，兼具文學與地學的寫作性質，日記體的遊記寫作方式，雖然不是創新的寫作方式，但是他擴大了前人的寫作範圍，除了遊蹤的書寫外，以直述自然的筆調，寫出山水遊記，不僅有文學作品的美感，也兼具了史實的記載，以及在地理學上的貢獻，堪稱是一部多元的遊記作品。

<sup>7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271。

## 第五章 結論

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即有旅遊意識，遠古時候的旅遊以商旅、行旅為主；南北朝時期的文人爲了避政治之禍，而寄情於山水，開始有了山水意識的產生。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則表示山水遊記正式走向成熟的階段。到了明代，旅遊已經從原本的不得志、感傷寄託，轉化而成個人的意志活動，晚明文人的旅遊是自發性的，帶著個人的山水審美觀，以心來領會山水之美，而不帶感傷、政治的抒懷。加上消費性社會的逐漸形成，爲晚明的旅遊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因而造就了旅遊風氣的熾盛。

在這個急遽變動的社會中，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是社會風氣方面，與前朝皆呈現出不同的多元面向。雖然政治因素壓縮了晚明文人們的仕途發展空間，但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肯定自我的價值，以旅遊來說，即是晚明文人實踐自我價值的最好表現。

在旅遊風氣的漸盛之下，遊記的結集也隨之增多，如前所述，公安三袁的性靈遊記書寫，寫出旅遊時的真、俗、趣，呈現庶民文化的熱鬧氣氛；竟陵派則以幽深孤峭的意境爲主，擅長寫景之意象，以靜謐筆調帶出深幽之感。再如張岱、王思任、李流芳、李日華……等人，也都有遊記作品的結集，各家寫作面向各不相同。而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記寫作面向，則是以考察、紀實爲依歸。徐霞客日記體的形式寫下他的所見所聞及遊蹤，內容以地理考察、紀錄風俗民情爲主，實是一部文學遊記兼論地理學的著作，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是一種新

的寫作面向。再者，王士性藉著為官之便，宦遊各地，將旅遊後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進而再推衍出人文與地理之間的相互因果關係，王士性認為自然界的一切變化與人類的活動是息息相關，秉持著這個理念，《廣志繹》所寫多是人文活動的現象，以及分析自然與人文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是王士性在遊歷之餘，以分析紀實的態度寫下《廣志繹》一書。

從徐霞客和王士性的遊記寫作來看，經世致用的思潮影響了遊記的內容，遊記的寫作不再是以抒情為主，而是趨向於實用、紀實的層面，這與晚明性靈小品遊記的寫作面向，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亦可得知在這社會的氛圍之下，遊記的寫作所呈現的是一個多元化的視角，而非只是單一的抒情性靈寫作。

因此，本論文所要呈現的，希冀藉著對於遊記的探討，以釐清晚明文人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遊記究竟呈現出怎樣的多元視角？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記，啟發了山水遊記寫作的多元面向，不再僅是侷限於傳統文人的寓景抒情、政治寄託，除了文學作品的美感之外，另有科學實證的紀錄，多元內容以及實地寫作，詳實地呈現在王士性與徐霞客的遊記中。

在晚明社會多元化與現代性的氛圍，自然山水帶給晚明文人是一種客觀的審美，從抒情、寫景、意境的刻意營造，到考察壯遊、紀實的遊記書寫，朝著經世致用的寫作趨向邁進。這些不同的遊記書寫面向的確帶給了讀者不同的感受，體現了旅遊在實質上的價值與意義。文學遊記兼論地理的寫作，在晚明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也開創了遊記書寫的一個新氣象。

## 附錄一

表一：王士性遊蹤年表

時間	年齡	行跡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1	三月七日生於浙江臨海東南鄉蘭道。
隆慶三年 (1569)	23	府縣試屢入優等，學使林撥入省城天真書院。
萬曆元年 (1573)	27	成舉人。
萬曆二年 (1574)	28	禮部試不第，歸遊金華諸山。
萬曆四年 (1576)	30	七月，遊縉雲、麗水、青田。
萬曆五年 (1577)	31	成進士。冬，假歸。
萬曆六年 (1578)	32	年初赴京，經杭州，遊西湖，作〈遊武林湖山六記〉。至京謁選，得河南確山知縣。四月赴任。
萬曆九年 (1581)	35	確山三年秩滿，例得假，六月縱遊河南各地，並入嵩山，經三十五日，又回確山任。有〈嵩遊記〉、〈遊梁記〉。
萬曆十一年 (1583)	37	內征禮科給事中，由確山赴京。
萬曆十二年 (1584)	38	集確山任期內所作詩文為《朗陵稿》。

萬曆十三年 (1585)	39	母林氏卒，回鄉守制。
萬曆十四年 (1586)	40	七月，遊永嘉，歸遊雁蕩。九月遊奉化、鄞縣、普陀、餘姚、紹興、桐廬。(至此浙江之遊已遍，後連綴爲〈越遊志〉、〈入天台山志〉、〈遊雁蕩記〉、〈台中山水可由者記〉)。是年將在京所作詩文及奏疏分別編爲〈燕市稿〉、〈掖垣稿〉。
萬曆十五年 (1587)	41	四月遊吳，經杭州、嘉興、入太湖，至蘇州、鎮江、南京，渡江遊九華、白嶽而歸。作〈吳遊記行〉、〈留都述跡〉、〈白嶽遊記〉等。十二月起復北上。
萬曆十六年 (1588)	42	北上，正月遊孔林，二月登泰山，作〈謁闕里記〉、〈岱遊記〉、〈茶城遊白雲洞〉。回京復任禮科給事中。清明遊西山，作〈西山遊記〉。六月奉命典試四川，由河北、河南，陝西入川，途入華山，作〈西征歷〉、〈華遊記〉。七月抵成都，試事畢，遊峨嵋山，作〈遊峨嵋山記〉。九月離成都，順長江東下，至江陵登陸，有〈入蜀記〉三篇。十月抵襄陽，遊武當山，作〈太和山遊記〉。繼遊恒山，有〈恒遊記〉。途中得調川北參議命，不復入都，假歸。
萬曆十七年 (1589)	43	赴川北任。四月，順途遊江西，有〈廬山遊記〉。途中奉命改廣西參議，乃由漢陽入湘。端午過洞庭，有〈楚江識行〉、〈衡遊記〉。九月遊桂林諸勝，作〈桂海志續〉、〈遊七星岩記〉。是年，編入川所作及有關入川之詩文爲〈入蜀稿〉。

萬曆十九年 (1591)	45	進雲南副使，備兵瀾滄。春入滇，遊昆明諸勝，作〈泛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峰記〉。九月遊九鼎山，繼至點蒼山，十二月遊雞足山，有〈遊雲南九鼎山記〉、〈點蒼山記〉、〈遊雞足山記〉。《五嶽遊草》於是年成書。
萬曆二十年 (1592)	46	雲南任滿，秋返鄉。
萬曆二十一年 (1593)	47	改所居「清溪小隱」為白鷗庄，作《白鷗庄記》。得晉山東參政命，赴任。冬，至所轄東平、兗州等地行荒。
萬曆二十二年 (1594)	48	調河南提學副使，未赴，旋改吏科給事中。年底至次年初在家。
萬曆二十三年 (1595)	49	晉太僕寺少卿，復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以不當辭而辭，外改南京鴻臚寺少卿。冬南下，例假返鄉。
萬曆二十四年 (1596)	50	在南京鴻臚寺少卿任。閑曹無事，撰《廣志繹》。
萬曆二十五年 (1597)	51	秋，《廣志繹》成書。冬，得晉南鴻臚寺卿命，例假返鄉。
萬曆二十六年 (1598)	52	正月回南京，舟次鎮江，病不能進，以二月十日卒於鎮江。歸葬臨海西鄉雙港水晶坦。

表格內容取材於：徐建春、梁光軍著：《王士性論稿》，浙江：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頁18-21。

表二：友人與徐霞客相互贈答之詩及書信來往

作者	篇名	內容
許學夷	同徐振之登惠山	與徐霞客同登惠山時所記
陳仁錫	送黃石齋偕徐霞客遊洞庭時早禱	描寫送別黃道周與徐霞客同遊洞庭
黃道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七言古詩一首贈徐霞客</li> <li>2.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li> <li>3. 讀遊記知名山幽勝無奇不有不覺手舞足蹈欣賞無已</li> <li>4. 五言古風四首</li> <li>5. 輓徐霞客</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對徐霞客的奇情異趣讚美以及對紛亂世道的感慨，被陳仁錫讚譽為兩絕，「霞客著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li> <li>2. 崇禎五年黃道周與徐霞客同遊太湖、登洞庭，並同以孤、雲、獨、往、還五字作詩唱和。</li> <li>3. 描寫黃道周因讀了徐霞客之遊記而欣然愉悅。</li> <li>4. 內容多寫對政事時弊的議論，多鞭撻指斥。</li> <li>5. 黃道周欽佩徐霞客旅遊探險的壯舉，感慨徐霞客的逝世令十洲五岳都哀傷揮淚。</li> </ol>
唐泰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等二十篇	與徐霞客相互贈詩之作
文震孟	寄徐霞客書	信中文震孟感慨功名事業只是夢幻泡影，不能同徐霞客五岳之遊。他認為徐霞客將遊歷過程著成遊記以導後遊，以傳千秋，此壯舉文震孟

		是深感佩服的。
陳繼儒	答徐霞客	陳繼儒聞知徐霞客將西遊所寫之信
錢謙益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叮嚀徐霞客寫下遊記並留下霞客精神。

表二：徐霞客遊歷年表

次數	年齡	出遊時間	省份／景點	遊歷概況
1	22	萬曆 35 年 (1607)	南直隸／太湖、洞庭山、無錫惠山	始泛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徐霞客叔岳、江陰詩人許學夷〈雨夜宿徐振之齋中〉和〈同徐振之登惠山〉中分別有「砌蛩鳴漸曉，庭樹響先秋」和「宿雨溪流急，扁舟向晚移」詩句，知其出遊時為秋季，遊伴為許學夷。1607 年初秋徐霞客與叔岳許學夷坐船從家鄉到無錫遊惠山，再泛舟太湖，遊蘇州洞庭東、西山，訪靈威丈人遺址，遊無錫惠山和太湖，雖為近遊，但卻是揭開了徐霞客旅遊生涯的序幕。
2	24	萬曆 37 年 (1609)	山東／泰山、孔廟、孟廟、嶧山，首次北遊	據陳函輝所寫的〈徐霞客墓誌銘〉說：「上泰岱，拜孔林謁孟廟三千故里，嶧山吊枯桐，皆在己酉。」此行歷齊、魯、京師、冀、山東泰山、

				曲阜孔廟、鄒縣孟廟為旅遊重點，從遠河北上，原路返回，這是徐霞客首次北遊，也是首次遠遊。
3	28	萬曆 41 年 (1613)	浙江／落伽山、天台山、雁蕩山、西陵	此遊與江陰迎福寺僧蓮舟先由水路到杭州，經蕭山到紹興訪仲昭，再至寧波渡海遊落伽山，再經寧海到天台、雁蕩。此遊重點為浙東落伽山(普陀山)、天台山(一遊天台)、雁蕩山(一遊雁蕩)。遊落伽山無日記，天台、雁蕩有日記，也是現存徐霞客最早的遊記。
4	30	萬曆 42~43 年 (1614~1615)	南直隸／金陵	近遊金陵、揚州、鎮江等地。
5	31	萬曆 44 年 (1616)	南直隸／白嶽山、黃山 福建／武夷山 浙江／大禹陵、蘭亭、 西湖	徐霞客攜奴僕偕潯陽叔翁經水路到杭州，到休寧抵白岳山(九華山)遊黃山(首遊黃山)，再經徽州、金華，經江西廣信府及鉛山到福建崇安遊武夷山，返途遊紹興的大禹陵、蘭亭及杭州的西湖。此遊歷浙、皖、贛、閩四省。
6	32	萬曆 45 年 (1617)	南直隸／宜興善卷洞、 張公洞	據陳志：丁巳家居，亦入善卷張公諸洞。可知徐霞客在此年近遊宜興善卷洞、張公洞。

7	33	萬曆 46 年 (1618)	江西／廬山 南直隸／再遊黃山、 白嶽山	與族兄雷門、堂姪白夫同行，由家鄉長江水路西上九江廬山，再遊白岳山（二遊），最後登黃山（二遊）。
8	35	泰昌元年 (1620)	福建／九鯉湖、石竹山	夏，與族叔徐芳若閩遊九鯉湖、石竹山，此遊經歷浙閩，為二度遊閩。
9	38	天啓三年 (1623)	河南／嵩山 陝西／華山 湖廣／太白山	春，由家鄉循運河北上，經徐州西折到開封、鄭州，遊嵩山，再遊太華山（華山）、太白山（武當山），由漢水、長江返歸。此遊歷豫、陝、鄂三省，重點是嵩山、太華山、太白山。陳志、錢傳說：「霞客遊太白山後曾有峨嵋之行，因奢崇明叛而『峨遊未暢』或『抵峨嵋，屬奢酋阻岳，乃返』。」徐霞客也在《遊嵩山日記》中說：「久擬歷襄、鄖、捫太華，由劍閣連雲棧為峨嵋先導。」
10	39	天啓四年 (1624)	南直隸／荆溪、句曲、 松江	為支持霞客遠遊，與霞客再次同遊宜興諸洞。
11	39	天啓四年 (1624)		夏，松江及鄰近之遊。此遊在王崎海的介紹下結識陳繼儒，請陳為母作壽文，陳落款時為此年五月小暑，並請當地名人做《秋圃晨機圖》，及為圖賦詩作文。

12	41	天啓四年 (1626)		夏，與雷門訪張大復，請作《小香山梅花堂記》
13	43	崇禎元年 (1628)	福建／遊玉華洞、漳州、漳浦	春，從家鄉經水路到杭州，再到漳州，訪族叔徐日升，又到漳浦首訪黃道周，後又到廣東羅浮山拜訪鄭鄭，並請當地名流如：何楷、張燮、曹學佺等為《秋圃晨機圖》題辭。朱惠榮先生道：  「這次徐霞客還遊了贛南南安府、贛州府。」這次出遊的重點為閩地漳州（三度遊閩）訪徐日升、黃道周，廣東羅浮山是閩遊的延伸。
14	43	崇禎元年 (1628)	廣東／羅浮山	再到青浦（今上海青浦）佘山專訪陳繼儒，並與陳同訪施紹莘。
15	44	崇禎二年 (1629)	北直隸／北京、盤山、 崆峒山	三度北遊，歷京師訪陳仁錫，因陳言遊盤山、崆峒山，還可能到山海關，俯窺瀛勃，在京師還訪黃景昉，請為《秋圃晨機圖》題辭。
16	45	崇禎三年 (1630)		訪鄭鄭於常州，追北上任職的黃道周於丹陽。陳仁錫赴南京任職。在丹陽黃道周題七言詩一首贈與徐霞客，在場陳仁錫作跋，丹陽返常州再請鄭鄭作跋。

17	45	崇禎三年 (1630)	福建／漳州、羅蓋山、 桃源洞	應族叔徐日升之邀，再赴漳州，遊覽了閩北羅蓋山和永安桃源洞。有《閩遊日記後》留傳，是為霞客四度入閩。
18	46	崇禎四年 (1631)		赴蘇州，訪文震孟、項煜，請文震孟、項煜為黃道周所贈七言古詩題跋。
19	46	崇禎四年 (1631)	南直隸／青浦佘山	與族兄徐應震再赴青浦佘山，訪陳繼儒和施紹莘。
20	47	崇禎五年 (1632)	浙江／再遊天台山、雁 蕩山	與族兄徐仲昭再度遊浙，由天台山（二遊）、雁蕩山（二遊），在臨海小寒山訪陳涵輝。有記。
21	47	崇禎五年 (1632)	浙江／再遊天台山、雁 蕩山	先去南京候罷官南歸的黃道周，與黃道周同遊南京、鎮江金嶼焦山，再遊句容茅山華陽洞，隨後與黃道周同赴蘇州，與陳仁錫共遊太湖洞庭山。黃陳均有詩序。
22	48	崇禎六年 (1633)	山西／五台山、恆山	北上京師，西行遊山西五台山、恆山，再返京師後南歸。此時在南京拜會謝德溥，請為題詩。是為第四次北遊。
23	48	崇禎六年 (1633)		五度遊閩。赴漳州（第三次），在漳浦訪黃道周，黃道周為徐題〈分鬪十六韻〉、〈七言絕句〉、〈五言古風四

				首》，據劉國城考證黃道周贈詩認為黃與徐同遊大峰山和丹霞山。
24	51~55	崇禎九年秋~ 崇禎十三年夏 (1636~1640)	浙江／餘航、杭州、蘭溪 江西／麻姑山、嵩華山 湖廣／柳子厚祠、衡山、麻葉洞 廣西／獨山巖、周泊隘、龍隱巖 貴州／白雲山、古佛洞、碧雲洞 雲南／太華山、盤江、金沙江、雞足山	前後歷時四年，是徐霞客出遊時間最長，成果最豐富，也是他最後一次出遊，其遊歷了浙、贛、湘、桂、黔、滇諸省。最後由麗江土司木增派人送到黃岡，再由黃岡侯知縣派人將其送回家，歸途歷時約半年。

以上資料取材於丁文江先生所撰《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加以參考陳忠和先生發表於興大人文學報〈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興大中文學報》，36期(2006年3月)，頁12-13。

## 參考書目

### 一、文集

- 三國·阮籍著 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
- 北魏·酈道元撰 陳橋驛點校《水經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
- 宋·周去非 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王士性《五嶽遊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明·王士性 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
- 明·王士性《五嶽遊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台北：偉文圖書，1977年9月）
- 明·王思任《遊喚》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7年）
-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7年）
-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 明·何景明《何文肅公文集》，（台北：偉文圖書，1976年）
- 明·宋應星 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 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三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5年）
-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2月）
- 明·李濂《嵩渚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
- 明·李豫亨《推篷寤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5

年)

明·李贄《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明·金幼孜《金文靖公集》，收入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0年)

明·徐光啓《徐光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年7月)

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

明·徐弘祖著 丁文江編校《丁校本徐霞客遊記》，(台北，鼎文書局，1974年)

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長沙：商務印書館印行，1939年)

明·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台北：偉文圖書，1976年)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台北：偉文圖書，1976年)

明·袁中道《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1985年)

明·張岱《陶庵夢憶》，(台北：台灣開明書局，1978年)

明·張瀚《松窗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

明·費元祿《晁采館清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5年)

明·黃汝亨《天目遊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6年)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明·楊循吉《燈窗末藝》，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

明·鄒迪光《鬱儀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

明·趙寬《素軒記》，收入《弘治吳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明·蔡汝楠《自知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
- 明·謝肇淛《小草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
-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5年)
-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台北：源流文化公司印行，1983年)
- 明·譚元春《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 明·鍾惺《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月)
- 明·顧起元，《懶真草堂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3月)
- 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
- 清·葉夢珠《閎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
- 清·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收入《涵芬樓秘笈》第二輯，(北京：北京圖書，2000年)

## 二、專著

-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中國地理大勢論〉，(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 丁文江撰《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1月)
-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明清與近代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
-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1輯—第14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7年)
- 尹恭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評述》(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1年5月)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

王子今《中國古代行旅生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5月)

王造時譯，黑格爾著，《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9月)

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4月)

朱惠榮《徐霞客與徐霞客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朱惠榮譯注《徐霞客遊記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朱鈞侃、倪紹祥主編《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朱鈞侃、潘鳳英、顧永芝著《徐霞客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2月)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沈祖祥《旅遊文化概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余貽潭《明代土司制度》，(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8月)

周群《袁宏道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周寧霞《徐霞客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月)

季羨林《明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唐錫仁《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7月）
- 徐林《明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
- 徐建春、梁光軍《王士性論稿》，（浙江：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
- 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出版社，1994年）
-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7月）
- 梅新林 俞樟樺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4年12月）
- 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
- 陳少棠《晚明小品論析》（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5月）
- 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9月）
- 陳書良、鄭憲春《中國小品文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12月）
-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10月）
-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3月）
-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 章必功《中國旅遊史》，（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 黃汴著 楊正泰校注《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月）
- 賈鴻雁《中國遊記文獻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5年7月）
- 劉天華《旅遊美學》，（台北，地景出版社，1993年9月）
- 劉虎如選注《徐霞客遊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 劉純《旅遊心理學》，（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
- 劉國城著《徐霞客評傳》，（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1986年）
- 劉翠溶 石守謙主編《經濟史、都市文化與消費文化：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

-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 鄭祖安、蔣明宏主編《徐霞客與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
- 盧永康校注《徐霞客散文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錢杭、承載合著《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台北：南天書局，1998年6月）
- 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
- 謝國禎《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
- 譚其驤編《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91年10月）
- 龔鵬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8月）
- 龔鵬程《遊的精神文化史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 三、期刊論文

- 方麗娜〈徐霞客遊記之文學特色研究〉，《臺南師院學報》第26期（1993年6月），頁139-158。
-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第3期（2000年9月），頁1-44。
- 王文進〈中國自然山水文學的三部曲—以南朝「山水詩」到「徐霞客遊記」的觀察〉，《中外文學》，第26卷6期，1997年11月，頁75-82。
- 守白〈明末奇人徐霞客〉，《華文世界》第20期（1980年7月），頁50-53。
- 余方德〈徐霞客的最後足跡〉，《歷史月刊》第184期（2003年5月），頁20-27。
-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5年），頁72-78。
- 林麗月〈明代禁奢令初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1994年6月），頁57-84。
- 林麗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1991

年6月),頁215-234。

范宜如〈文學中的人地關係總論—以明代吳中地域為例〉,收入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研究》第四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頁147-167。

范宜如〈王士性紀遊書寫初探:以《廣志繹》、《五嶽遊草》為討論對象〉,《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8年7月),頁301-317。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師大國文學報》(2007年12月),第42期,頁121-151

皋于厚〈明清小說風俗描寫的人文意蘊〉《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4期,頁220-227。

祝秀俠〈千古奇人徐霞客〉,《中國文選》第106期(1976年2月),頁80-88。

尉富国〈從徐霞客遊記看明末廣西飲食、服飾、居住民俗〉,《廣西地方志》,(2004年),第1期,頁57-62。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第4期,(1994年),頁60-63。

張勇〈理論與經驗透出的文化傳統—王士性與徐霞客旅行的比較研究〉,《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4年9月),頁89-97。

敖紅〈淺論王士性的旅遊審美觀〉,《內蒙古大學人文學院旅遊學系》第9期(2004年),頁239-241。

許建崑〈文學大眾化與大眾文學化—重構明代文學史論述的主軸〉,南華大學文學系編《明清文學與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5月1日舉辦。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以我觀物」的審美感應模式〉,《靜宜語文論叢》第1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1-12。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中「遊貴有言」的審美表現理念〉,《興大人文學報》第

35 卷上，(2005 年 6 月)，頁 297-332。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興大人文學報》，第 36 期，(2006 年 3 月)，頁 283-324。

陳建勤〈明清江南地區的文人遊風〉，《旅遊科學》，(2000 年)第 4 期，頁 43-46。

陳建勤〈風尚·環境·文士—明清江南遊風熾盛原因初探〉，《浙江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3 期第 28 卷，頁 15-19。

陳建勤〈論「游道」—明清文士旅游觀研究之一〉，《旅游學刊》，(2000 年)，第 4 期，頁 64-68。

陳勝崑〈徐霞客在好山好水間做學問〉，《綜合月刊》第 158 期(1982 年 1 月)，頁 152-156。

傅貴〈千古奇人—徐霞客〉，《歷史月刊》第 62 期(1993 年 3 月)，頁 105-109。

華振之〈談徐霞客和他的遊記〉，《新文藝》第 202 期(1973 年 1 月)，頁 77-104。

楊森、陳賚福〈王士性對自然地理學的貢獻〉，《台州師專學報》第 17 卷 第 4 期(1995 年 9 月)，頁 75-78。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年)頁 190-208。

滕新才〈明朝中後期旅游熱初探〉，《北方論叢》(1997 年)，第 3 期，頁 17-21。

蕭之華〈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談徐宏祖及其「徐霞客遊記」〉《文藝月刊》第 246 期 (1989 年 12 月)，頁 66-72。

蕭璠〈徐霞客旅遊途中所見到的環境破壞〉，《歷史月刊》第 22 期(1989 年 11 月)，頁 106-110。

#### 四、學位論文

王怡文《晚明旅遊小品文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呂麗粉《徐霞客遊記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初征《《徐霞客游記》中的地理文化意蘊》，(瀋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洪正君《袁中郎山水遊記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

孫艷梅《旅游地學視野下的徐霞客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張百裕《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及其敘事表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張志帆《論張岱遊記中人文精神之體現》，(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6年。

張晉光《徐霞客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成就考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張嘉昕《明人的旅遊生活》，(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碩士論文)，1999年

張嘉昕《明人的旅遊生活》，(台北：文化大學史學所碩士論文)，1999年。

曹姝《論徐霞客寺廟審美觀及其現實意義》，(貴陽：貴州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7年。

梁秀鴻《徐霞客游記之文學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5月。

陳千代《晚明袁宏道山水遊記小品語言藝術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美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5年。

陳淑卿《徐霞客遊記研究—以文獻觀察為重點》(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3年。

陳萬益《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1997年。

曾淑娟《張岱小品中的旅遊休閒》，(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

黃明莉《明代江南的遊觀生活與社會心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史研所碩士論文)，2002年。

黃雅雯《袁中道溪遊生活研究—以《遊居柿錄》為例》，(台北：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

黃慧音《王季重歷遊書寫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1年。

楊林軍《徐霞客與麗江地方文化研究》，(昆明：雲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簡郁昕《性靈與山水的邂逅—袁中郎遊記小品研究》，(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2006年。

蘇美璇《晚明文人旅遊生活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